



拥抱世界的港湾 连接天下的彩虹

越

国的乱

龙川县

后，赵佗广

编民。此后到南

不断析土分县来看，

叫新丰江水库。水域

高水位116.7米，湖区

季葱绿，生态优良，与西双

莫腰带上的东三奇”。河源、

“河源”之名，与河源县三河之源有关，康熙帝古南《元

和朝县志》：“河源，本汉龙川县之，源于北源两县，

“河源”之

县志》载：

北三百里有三

和经济文化得“河源”之得名，与河源是三

不断增多。《县志》载：“河源，本汉龙川

县的林地，”李惠

北三百里有三河之源，故名也。

秦始皇三十三年，龙川建县，其后南越国建立

到发展，从氏族社会成为秦、汉帝国的郡县编

龙川建地人与事记载极少，但从古龙川县不断

越国建立后，赵佗广推文字，“以诗礼

的郡县编民。此后到南朝齐永明元年的

县不断析土分县来看，这一带的社

推文字，”“礼化其民”，岭南社会

齐永明元年的700年间，典籍

带的社会、经济不断发

河源创城记

客家古城

海之河源

ISSN 1003-7373



9 771003 737248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171/D
定价：¥30 HK\$40 NT\$128 \$20

河源创城记 / 6

千年河源，历史悠久的客家古城 / 10

万绿湖：南国秀水，民生重器 / 14

晚清河源契约华工史 / 18

民国时期，河源那些留洋的前辈 / 22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河源 / 26



广东侨联工作

经济科技品牌

侨创

南粤

汇集侨资侨才侨智，凝聚侨情侨心侨力，共享机遇，共创多赢，服务经济建设，推进社会发展。



伴我乘槎过海洋

文◎刘迪生

粤东河源，东江与新丰江交汇之地。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本汉龙川县之地，齐于此置河源县，以县东、北有三河之源，故名也。”三河，即连平河、忠信河、新丰河。

河源故城位于新丰河、东江交汇处，两水成“丫”字状。粤语“丫”“槎”同音，于是有了“槎城”的别名。其实，那历史的深处，河源因其三面环水，乃海陆货物集散地，可谓商贾蜂拥，樯櫓如云，筏（槎）满两江，俨然东方“水上威尼斯”。更是客家“过番”出海、浪迹天涯的第一个驿站。清代李汝珍的奇书巨著《镜花缘》，可见一斑。

河源，水城，槎城，海外赤子殷殷眷注之城。呵——

松石道人辞故乡，笔底情深系于唐。

百花仙子来幽梦，伴我乘槎过海洋。

河源，每一次踏上你的土地，看东江碧水、新丰扬波、远山含翠、万岛浓绿……总是情不能已，免不了约一二好友于幽林山水亭阁处，把酒凌虚，抚膺拂栏，浩叹今古。

新丰江，新安江；千岛湖，万绿湖——东方大地上的姐妹“江湖”，双眼回眸流波转，惊艳多少风尘人！

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对河源、东江来说，倒不是如此：非“仙”非“龙”，而是人——主政者坚实朴厚的脚窝，给这凡庸的山水，装点了一抹靓丽的彩色。

进入新世纪，东方大国因加入WTO，经济成就突飞猛进，举世瞩目，但对自然环境的伤害，也是触目惊心，广东主政者作出了“腾笼换鸟”的重大决策。也正是这时（2007年4月），陈建华被任命为河源市委书记。

陈建华在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领导带领下前往河源上任，下高速进入河源时，看到一群施工队伍在高

速出口环岛内施工，看工程场面，似将在这里建一栋高楼大厦。他当即停车，指令立即停止施工。

“你是谁？管得着么？”

“我是河源市委书记！”

当时他的任职命令，还在省委组织部领导的公文包里，还没宣布呢。

陈建华，东江纵队后代，曾在谢非身边工作16年。是家严的庭训还是谢非的濡染？他的人生旨趣似乎复制着东方古老“好官”的“官箴”。他这次履新，就已有准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河源下辖五县一区，其中五个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如何让老百姓脱贫？陈建华已有考虑。

珠三角“腾笼换鸟”，他则一马当先，“进笼抓鸟”，不遗余力地引进“中兴”等高新产业。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陈建华上任伊始，为保护河源山林水土作出了三大决策：停止桉树种植、停止木柴加工、停止环湖公路建设。旋即关停470个小矿开采，这样一来，断了多少人的财路？红道黑道，其中不乏权贵们的切身利益。

陈建华面对软硬说项，铁面无私。我印象中的谦谦君子，竟然是个如此的“狠人”，真让我刮目相看了！

他与河源人民一起保住了万绿湖水的清丽，保住了东江水的水质，保障了下游4000万人——包括香港的饮水安全，并以青山绿水的得天独“惠”，享受着环保经济的巨大滚滚财源，“农夫山泉”100多亿元的水经济，也只不过是其中的涓涓细流了。

徜徉于河源街头，泛舟于万绿湖上，和本地人聊起网名叫“华哥”的“河源网红”，他们会笑得甜甜的：“呀？华哥？四廉棍（认死理）！好喂！”

一方为政千载名，千部残卷一盏灯。

苏堤白堤西湖柳，风里杨花香到今！

目 录

Contents



独家策划

5 海之河源

《华夏》编委会

名誉主任：李 丰

主任：戴文威

副主任：邵 慧 刘迪生

编委：柯广宁 钟敏仪

总编辑：刘迪生

副总编辑：钟敏仪

总编辑助理：赵阳欢

社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0—148号
省侨联大厦6楼602室

邮编：510620

电话：020-38879808

邮箱：gdqlhx@163.com

侨海时政

63 广东侨联纪事 / 粤乔宣

67 28家海外华文媒体记者
荟萃广东侨乡 / 祝顺祥

侨路拾贝

72 穿越尘封的往事
——恩平拉美华侨华人展览馆
参访有感 / 楼亚沙

75 从广东侨乡“行”，看中国
世界“行” / 陈 林

77 跨越时空与山海，邂逅千古梁先生 / 王淑华

80 梦中又见父亲 / 黄璋尊

风雅颂歌

82 美心美壶 / 陈子光

84 东华禅寺的五十六座篆刻美石 / 左 夫

86 《媒体上的古巴家书》：民间家书
整理出版并走向大众的典范 / 张 丁

89 秋水长天 平川无垠
——蔡秋川《陌上暖阳》序 / 黄国钦

91 《走出印度：加拿大客家人访谈录》：
客家人二次移民的悲欢离合 / 马 克

92 文章千古事 / 王国猛

93 陈寅恪故居 / 郝 俊

6 河源创城记 / 凌 丽

10 千年河源，历史悠久的客家古城 / 梅幻之

14 万绿湖：南国秀水，民生重器 / 巫丽香

18 晚清河源契约华工史 / 凌 丽

22 民国时期，河源那些留洋的前辈 / 兰 皖

26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河源 / 李育棠

31 省港大营救：那一年的龙川老隆
群星闪耀 / 李育棠

36 徐惠仪：徒步六百里，护千名孤儿
避烽火 / 周 焕

41 黄麟书：广东现代教育奠基人 / 兰 皖

46 谋国之忠不居人后
——记和平籍著名爱国人士徐傅霖 / 周 焕

51 黄石华：全球客家精神领袖 / 周 焕

55 忆银梅初级中学的创立 / 谢任民

59 美丽侨乡黄塘镇 / 利 东

61 异国他乡多磨难 赤子归根爱国情 / 罗国超

国内统一刊号：CN44-1171/D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7373

广告经营许可证：440000100021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印刷装帧：广州市岭美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定价：¥30 HK\$40 NT\$128 \$20



《华夏》公众号



《华夏》电子书橱

海之河源

策划◎《华夏》编辑部

河源故城位于新丰河、东江交汇处，两水成“丫”字状。粤语“丫”“槎”同音，于是有了“槎城”的别名。其实，那历史的深处，河源因其三面环水，乃海陆货物集散地，可谓商贾蜂拥，檣櫓如云，筏（槎）满两江，俨然东方“水上威尼斯”。河源更是客家人“过番”、浪迹天涯的第一个驿站。

河源俯瞰图

河源创城记

文◎凌 丽

河源之得名，与河源是三河之源有关。唐朝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河源，本汉龙川县之地，齐于此置河源县，以县东、北三百里有三河之源，故名也。”

哪三河之源？一般认为是连平河、忠信河、新丰河。宋朝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新丰江在河源县北，湍碛险峻，通灌田一千一百二十顷，流五百五十里入县界，号新丰江。”

河源战国时属楚，秦、汉、三国、晋时期均属古龙川县地，归南海郡管辖。南朝齐永明元年(483)，析龙川地置河源、新丰二县，仍属南海郡。初建县的河源，疆域甚大，包括今和平、连平、新丰、龙门、博罗等县部分或大部分地区，河源东北境内，有连绵九县的九连山脉，水资源极为丰富。新丰、连平、忠信诸水汇成新丰江，其东、北之境为河源之水源地。



龟峰塔，位于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东南方向龟峰山上的一座古塔，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

连平河又称连平水，发源于连平元善镇黄牛石山麓，往西南流经元善、溪山、隆街，至隆街镇塘河口汇入新丰江。连平河全长71公里，大小支流18条，流经连平县城。

忠信河源于和平县热水镇白叶嶂，南流经忠信镇，于东源县良田坝注入船塘河，忠信河长65公里，流域面积622平方公里。

新丰江是珠江水系东江的一条支流，在广东省中部，发源于新丰县小正镇七星岭亚婆石，流经新丰县、连平县、东源县，于河源市区汇入东江，全长163公里，集水面积为5813平方公里；因源出新丰县得名。

另外，《旧唐书》卷四十一《岭南道》中记载：“河源，隋县。循江，一名河源水，自虔州粤都县流入。”河源地名的由来，或亦与此有关。河源水，古时又称循江、湟水、龙江，即今东江。东江流域面积3.53万平方公里，其中约90%即3.18万平方公里在广东境内，而河源境内的东江流域面积达1.37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市面积的87.3%。

为避盗扰 上城被弃

河源县城有两座城，一个是上城，一个是下城。

建县之初，县治在上城。虽然隶属的州郡府时有变化，但上城成为将近1000年历史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宋代以前，河源的城是垒土而成的，城很矮，普通人皆可腾跃而上。护城河并无水源。有司曾从红朱门筑壘开堑，东起

高风坑，西至佛迹潭，以排闸蓄水。没有水源的河易枯竭，何姓左丞凿了今双下坝的巨石引了一道渠，但渠流不长，且浅，易堵塞，不用拉起裤管就能过。这样的城形同虚设，强盗不时来河源城里打家劫舍。贼寇们走了，“遗民”依槎水而居，是为三郭——上、中、下三郭，因以为县。现在的上角、下角，即原来的上郭、下郭。郭，外城之墙，造郭以守民。

到了元末改朝换代之时，大军往来，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上城的城墙塌了，房子也烧了。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河源有乱军首领李满林率兵据城作乱，东莞人何真率义兵前来将其平定。明洪武元年（1368），本地土豪曹文昌、黄彬，汲州土豪廖仁等聚众作乱，自称元帅，被征南将军廖永忠剿灭。

从战乱中恢复喘息的河源人，开始战后建设。天下初定，到处仍有贼寇，也需要筑城防寇。但是，城墙并不是那么容易修的，没有完好、坚固、高大的城墙保护，强盗跑到上城来抢劫，人们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威胁。

明洪武二年（1369），县丞钟镒于中、下郭间滨江地建筑下城，以避盗扰，以上城为河源守御军堡。洪武二十八年（1395），守御千户高闻、百户曹贵始建下城城墙，墙高1丈2尺。

那时，河源县的县治，开始迁往下城，徙建于城西寿春寺。

为避盗扰而建的下城，历经了几次维护、增高。明弘治五年（1492），签事袁庆祥认为城墙太矮，核准县城城墙增高3尺，为1丈5尺，城周450丈，北、东、南为门，上有炮楼，池深7尺。明嘉靖



河源双城一气图，载同治《河源县志》



上城东门

三十三年（1554），有盗贼潜入县库，签事尤瑛复修城高3尺，计城墙高1丈8尺。

自元末至明隆庆年间的200多年里，上城已成荒山野岭，蒿莱遍地，鸟兽横行，人迹罕至，肥一点的地都被人开垦造田，瘦地成了乱葬岗。

为避水患 重建上城

下城地低，每有大雨、暴雨，就汪洋如海，城中庐舍被淹，水患频繁，百姓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明成化年间，河源同知黄冕在一次洪水后写了一篇文章，大意是：槎江平时看起来那么温顺而浅，似乎一苇可航，谁知道久雨积涝之后，竟然惊现汹涌巨浪，河源城与低地几乎遭灭顶，只看得到周边嵯峨的山，“东埔废春耕，黄宫息弦歌”。

黄冕之后，明嘉靖年间惠州知府李玘，到河源视察后写了首五律诗慨叹道：“晓发河源县，阴云白半城。遥看

楠树色，忽听鹧鸪声。地下常忧水，山穷易弄兵。山穷易弄兵。”第三联“地下常忧水，山穷易弄兵”，点出河源城面临的两大忧患。

明隆庆五年（1571）初夏，下城遭遇大洪水。五月初一，一日一夜的时间，河水暴涨3丈。人们本该使用舟楫逃离洪水，可是祸不单行，明代特有的“狼兵”（起源于明朝中期，是当时壮族土司组建的地方武装）抢船，人们之前以防船被“狼兵”抢走，就把船藏得远远的，于是在发洪水时，人们就没办法用船了，有100多人死于这场洪水，城中有姓邝和姓曹两个家庭家破人亡。洪水退后，城里发生瘟疫，又死了100多人。

河源县令林大黼向惠州府报告后，领了400石米赈灾。县里有存粮大户的，林大黼让他们用平时的价格，将米粮卖给灾民。这样，很多灾民都吃上了饭。

下城不安全，地势低，时不时就遭水灾，这让人怎么生活？能不能有一个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可以居住？为使百姓不屡遭洪水之苦，居家有所，必须从长计议，以求一劳永逸。

很多人想起了那个废弃了200多年的上城，包括“槎城之魁”李焘的父亲李学颜。

李学颜与教官莫文泰、瑶官谢成学、监生邝京寿、长老邱凤等为首倡，向县令建议迁城，得到180余人的积极响应。人心齐，泰山移。林大黼见如此，又向惠州府报告，申请迁徙县治，获批。兵备副使王化考察200年前的旧城基后，带着邑人斩荆棘、驱野兽，又占卜风水，建治于上城西隅，“枕桂山以抱两江，以

下城为案”，但百姓一直没搬进去住。因为人们灾后非常穷困，一时不能迁居，而且又有所恃，都拖着没搬。

明万历十年（1582），河源城又发大水。这次水灾比11年前的大洪水危害更烈，蓝溪、义合的山洪汹涌，甚至使一座山都移动了30余丈，溪谷填塞，良田千余顷被淹，上、中、下三郭泡在水里的房屋，不下千间。

此时，分守岭东道的胡时化听说河源遭受特大水灾，过来视察，看见人们生活困苦，心下恻然，上报总督两广军务兼广东巡抚陈瑞，陈瑞给饷200金赈灾，让河源县令汤民仰率民众赶紧迁入新城上城。李学颜因之前“石狮李屋”已基本建好，年底时率先迁入上城。其他民众见到邑绅带头，也都跟着一块迁入新城。之前不愿迁入的民众，经过大洪水后，后悔当初未早做打算，于是纷纷在上城建房。

经过半年的完善后，历时12年断断续续的建设，历经几任县令，上城建城终于完工。1583年1月29日，春节刚过，县衙正式迁入上城。随后，民众陆陆续续迁入。

那天，李焘站在上城东门城楼上，看着崭新的城墙与上城，感慨万千。李焘写了一首《登城东楼有怀》：“五色云呈考卜初，经营三纪竟何如。道旁谁定千年策，湖里空浮万顷余。纵目东楼天作画，乞灵西桂草为庐。聊将一堵兴闻里，先子成城意不虚。”

从此，河源县上城、下城并峙。上城为公署、仓库、监狱及义学肄业重地，下城则为学宫、万寿宫庆贺重地。✎

千年河源，历史悠久的客家古城

文◎梅幻之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龙川建县，其后南越国建立，赵佗广推文字，“以诗礼化其民”，岭南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发展，从氏族社会成为秦、汉帝国的郡县编民。此后到南朝齐永明元年（483）的近700年间，典籍上对今属河源的古龙川辖地人与事记载极少，但从古龙川县不断析土分县来看，这一带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口不断增多。

汉初龙川人口不足万户

1994年，在湖南郴州国庆中路3号墓，



龙川县佗城镇南越王庙内的赵佗像

发现了一枚“龙川长印”这使得不少考古学者对此产生兴趣。然而这个墓葬的随葬品的种类不多，数量也较少，似乎与县官的身份不大相符。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枚“龙川长印”为滑石质，印面呈方形，长3.2厘米、宽2.9厘米，印刻篆隶体，背面有覆瓦形纽。墓为带道的土坑竖穴，墓坑长3.8米、宽4米。随葬品有小铁刀、陶器罐、盒、鼎等。随葬品的种类不多，数量也较少，似乎与秦末汉初县令“大员”的身份不大相符。

有学者以这枚印为证，说明南海郡的龙川当时为长沙国属地。湖南省博物馆的曹学群认为，无论从《史记·南越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还是从岭南秦汉考古发现，以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等看，汉初长沙国不可能越过阳山关而领有龙川这一块孤悬南越国腹地的“飞地”，更何况龙川是南越王赵佗的兴王之地。

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邱立诚认为，郴州出土的这枚“龙川长印”并不能论定龙川曾是长沙国属地，恰恰相反，这进一步证明长沙王吴芮曾虚封一位“龙川长”。曾任龙川令的赵佗，决不会将龙川行政长官一职

从“令”降为“长”，而这位“龙川长”因从未到任，他的墓葬随葬品与其身份不那么相称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邱立诚分析，秦汉时县官有“令”和“长”之别，“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五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这枚印或许说明，龙川当时县治百姓人口户数实际不足万户。

嘉应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刘向明认为，长沙王吴芮虚封了一位龙川长，可见当时龙川设县已有一定影响，或许说明初置的龙川县，多为驻守的军队。

马王堆帛书暗藏着连平的秘密

秦汉时期的今连平县，因在边界，先后为南海郡龙川县、桂阳郡浈阳县辖地。

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2年，将岭南三郡（象郡、桂林、南海）“虚封”给长沙王吴芮，为南越王赵佗树了个劲敌。这使得南越王赵佗一直对长沙国深感不安，同时，也对长沙国背后的汉王朝时刻戒备。

这可从1977年马王堆三号墓（利豨墓）出土的两幅地图上窥见端倪。

其一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据学者研究，该图应为屠睢楼船军远征南越时的军用地形测绘图，所绘区域大致为今湖南、广东两省及广西部分地区，其主区在长沙国，邻区在南越国，此图一大特点是河流绘得十分详细，有两国境内大小河流30余条。专家认为，这些河流大都分布在西汉与南越国交界带，在突出标示长沙国防守区内山川形势的同时，尽可能把敌方可能发动进攻的路线——珠

江水系加以标示。南越国与长沙国隔着高山峻岭，“车道不通”，军队物资运输高度依赖水路。同时，南越军队“习于水斗，便于用舟”，要防范南越国大军，必须对水路严加防范。

另一幅被专家命名为“驻军图”的地图显示，汉军预备队和加强部队都设在桂阳郡九嶷山一带，此处距南越国北界、连江上游的阳山关不足百里。通过地图可以发现，长沙国南面防区并不按照岭南地理的自然形势区分，而是嵌入南岭山脉南麓，同相邻的南越国形成犬牙交错状，如一把尖刀插入南越国，时刻威胁着南越国的安危。今属河源的连平县，时属马王堆帛书地图上的“桂阳县”，是长沙国属地。有专家曾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当时连平地区既是汉朝防范南越的桥头堡，又是长沙国与南越国商贸往来的关市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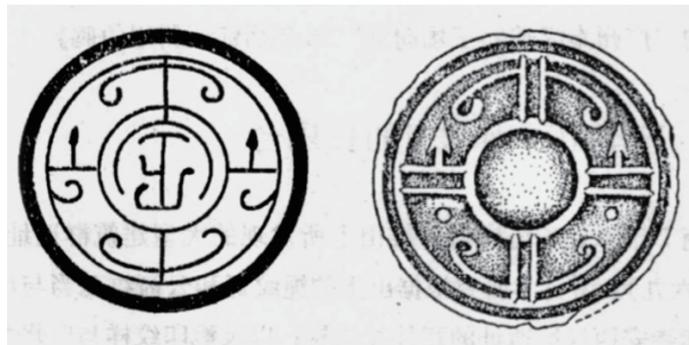
余天炽等著述的《古南越国史》认为，南越国北界，应西起今广西三江、龙胜县南境，经兴关严关，东南折向恭城、贺县，再折向广东连山、阳山、乐昌、南雄等县北境，又南折向连平，再沿和平、蕉岭等县南境，再经福建永定、平和、漳浦而东达于海。

龙川不断析土置县

秦时南海郡设番禺、四会、博罗、龙川四县。南越国时期，粤东北境内再设揭阳县。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将南越地重新划分为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终两汉之世，粤东北境内再未增加县级



龙川县制作的佗城古城变迁图



五华长乐台的箭纹瓦当

建置。

西汉以后，“百越”或“百粤”渐渐从文献中消失，《后汉书》中已无百越传记，“须待今日越南，十世纪中脱离中国领土范畴独立的时代”。汉越杂处后，百越民族已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华风日盛”。

东汉末年，中原动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岭南地区人口快速增长。东汉中期，南海郡(在番禺、四会、博罗、龙川、揭阳、中宿六县基础上增设增城县)总户数从西汉末的19613户增加到71477户，人口增加到25万人以上，与此相应，龙川县的人口数量也有了较大增长。

何以见得古龙川县的人口有较大增长？因为它在不断地析土分县。在封建时期，把一个县分成两个或更多的新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多增田赋。龙川析县，说明该县已是一个民政事务繁杂、税收事务繁重的大县。

西晋时期，揭阳县一度被废，其地并入龙川县。从东晋始，在龙川县的东北和东南地区，不断地析出新县，如海阳(今潮州市东)、潮阳(今潮州市西北)、海丰(今海丰县)、兴宁等县。

东晋时期，粤东北境内的行政建置首次大规模增加，县级建置一下从秦时的2个(龙川、

博罗)增加到8个：龙川、博罗、欣乐(析博罗置)、雷乡(析龙川置)、兴宁、海丰、怀安和义招(即今大埔)。

公元483年河源建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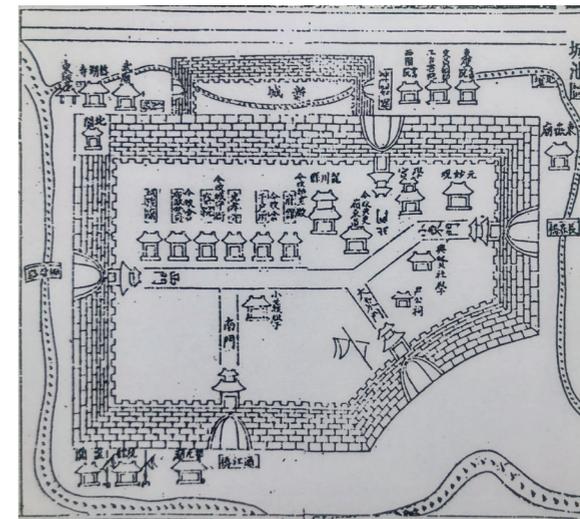
从秦置龙川县起，到南朝齐永明元年(483)河源建县止，河源有697年属南海郡龙川县管辖。清雍正《广东通志·沿革》卷五云：“河源地，晋、宋时，属南海郡之龙川县。”

南朝齐永明元年(483)，龙川析置新丰、河源。《南齐书·郡志》卷十四罗列了南海郡管辖的各县，有：番禺、熙安、博罗、增城、龙川、西平、绥宁、新丰、罗阳、高要、安远、河源。河源地名，从此出现。

源城区至今仍流传着一句俗语：“先有曹古莫，后有河源城。”这说明了河源置县之前，已经是有一定人口规模的聚落。

河源设县于山水会聚之处，地处粤东北，是东江重镇，多为山地丘陵，形胜壮丽，桂山西镇，东抱土原。初建县的河源，疆域甚大，包括今和平、连平、新丰、龙门、博罗等县部分或大部分地区，唐朝至明朝约1000年间，河源县的范围无大的变化。后来析地，分新丰(后改名休吉)，又分石城，后来石城又并回河源，不久又析长宁、连平、和平，又割博罗以补其缺。这样一来，河源县四境封城，犬牙相错。

五代后，河源多属惠州辖管。清朝，河源仍隶属惠州。清乾隆《河源县志》说，惠州是岭东首郡，所属州县，只有河源



龙川城池图(清嘉庆《龙川县志》)

得中央之地，南北相距百余里，东西约300里，临水坐山，邻境州县环绕，居中擅胜，风气淳良，非各属所及。因为地理位置的“居中擅胜”，以及水运的发达，广府、潮汕、客家以及中原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客家地区的语言体系、民俗民风、建筑风格，积淀了河源独有的文化特色。

而秦朝时那个幅员甚广的“百粤轩轳”龙川，2000多年来，因为不断析土分地，面积是越来越小了。明万历年任龙川县令的文学家孙云翼在《默化堂题名记》里说：“我朝太祖定天下，复龙川为县”，县令之下，有县丞、主簿、县尉等官吏。至洪武十五年(1382)，取消了县丞之职，龙川幅员，也不复旧观。令他尤其心中耿耿的，是正德时设和平县，狠狠地划割了境内四分之一的土地。“龙之削也甚矣！仅当大县之一乡。”到了清嘉庆年间，《龙川县志》修纂者掩卷慨叹道：“在昔幅员之广，不啻数倍于今。”

万绿湖：南国秀水，民生重器

文◎巫丽香

万绿湖是华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也叫新丰江水库。水域面积370平方公里，蓄水量139亿立方米，最高水位116.7米，湖区内有360多个岛屿、4479公顷的林地，四季葱绿，生态优良，与西双版纳、鼎湖山并称为地球北回归线“沙漠腰带上的东三奇”。水质长期保持国家Ⅰ类水标准，先后获得“中国优质饮用水资源开发基地”、“中国好水”水源地、“中国天然氧吧”等荣誉称号。

作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的重要水源地，万绿湖每年以70亿立方米的净水输入东江，是700多万香港同胞的生命之水，也是东江下游粤港澳大湾区东部城市4000多万居民的重要饮用水源地，被誉为广东的“生命水”“政治水”“生态水”。

新丰江水电站建设

河源万绿湖和浙江千岛湖是一对姐妹湖，它们都是20世纪中国建设水电站而形成的人工湖，都是承载着国计民生的水利重器，凝结着一方百姓无私高尚的家国大爱。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抗美援朝战事正酣，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要求，积极组织力量编制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上马的国家电力水利工程，包括新丰江、新安江、三门峡、古田溪等新中国首批大型水电站。无一例外，它们都寄托着

数代中国人让落后的农业大国实现工业化的渴望。此外，通过水库调洪，也可以减少沿河流域的洪涝灾害。1958年7月15日，新丰江水电站在距离河源城区上游6公里处的亚婆山峡谷开工建设。怀着支持新中国建设的巨大热情，由国家水利电力部新丰江水利工程建设局职工、解放军部队工兵以及大量从广州、惠阳、佛山、韶关、汕头等地区号召而来的群众组成的建设队伍，夜以继日地在河源亚婆山峡谷工地奋战，最高峰时日投入劳力达2.7万人。

从1958年7月15日开工到1960年10月第一台机组发电，新丰江水电站施工期两年零三个月，是中国已建同类型、同规模的水电工程中速度最快的一个。在当年水电站建设经验极其匮乏、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条件下，建设者们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改流”的英雄气概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硬是徒手建起一座顶高105米、顶宽5米、



1959年1月22日，《大公报》关于新丰江水电站电力输广州的报道

坝长440米的雄伟大坝，涌现出了肖强、黄慎容等舍身抗击围堰洪水的优秀共产党员。竣工前，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亲笔题写了“新丰江水电站”六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至今屹立了半个多世纪的新丰江水电站大坝，成功经受住6.1级地震和无数次小地震的考验，仍是一座安全并发挥着重要的洪涝调节作用的大坝。

流淌着 10.6 万群众的家国大爱

新丰江水电站大坝拦截了东江最大的支流新丰江，高峡出平湖，由此形成新丰江水库。水库覆盖新丰江沿岸8个公社11个乡镇389个村庄，涉及原河源县、连平县、新丰县、龙门县等地区，为此，需外迁群众10.6万人，其中约8万人在河源安置，其余2.6万人迁至原惠阳、韶关等地区。移民实行“先搬迁后安置”的方针，到了安置地后，先寄住在当地的学校、祠堂等场所，再自己动手建设新房，之后又遭遇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移民群众在落居地经历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们始终无怨无悔，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日久他乡是故乡，如今移民群众早已在安置地开枝散叶，安居乐业。他们无私奉献、爱国爱家的精神值得人们永远致敬和铭记。

在新丰江水电站完工的第四个年头，也就是1964年，为解决香港水荒问题，周恩来亲自批示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水入港。地处东江中上游的河源再次承担起重要使命，保护新丰江水库，保障香港民生。为了护育水库，

20世纪60年代，广大河源群众将造林劳动红旗插上了1600平方公里的库区山头。1963—1967年，河源群众共在新丰江水库库区种下20.2万亩的杉、松等林木，创造了两个月造出万亩“红旗山”和万亩“革命山”的广东林业奇迹。正是当年广大群众的劳动付出，才有了今天涵养万绿湖的榛莽森林。

寄托数代国家领导人的殷殷关切

新丰江水电站建设半个多世纪以来，陶铸、习仲勋等众多国家领导人都考察过新丰江水库，心系民生，问计环保，走访关爱移民群众。

从开工建设到蓄水发电，时任陶铸，多次到新丰江水库考察。1964年秋天，在汕头考察工作的陶铸，返程时再次来到新丰江库区调研。陶铸指出：“新丰江水库是个大宝库，要大力发展林业。有了林业银行，就不愁搞不好库区的发展。”对于河源县汇报的库区移民群众生产生活问



1959年5月2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左一）到新丰江工地视察

题，他回答说：“库区医疗、教育、通电、通信等问题由省卫生厅、教育厅等部门来帮助解决。”他还提出了建设移民新村的美好期望：“在交通便利环境开阔的地方设点，建三室或四室一厅，青砖白瓦玻璃窗。”在陶铸考察新丰江库区后，广东省每年给负责库区移民生产的新丰江林业管理局划拨移民造林补助款80万元、大米指标5万担，还增派了20多名大中专生到库区担任林业技术员、医护人员。正是这些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年轻人，和6万库区移民一起，掀起了20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新丰江库区造林运动。

1978年7月，主政广东仅三个月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便深入惠阳、梅县、汕头“东三区”调研。在河源，习仲勋考察了新丰江水库，惦记群众温饱问题的他指出，要结合东江流域良好的地理环境，搞好粮食生产。1997年12月，在中国南北大动脉京九铁路通车之际，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考察铁路沿线的革命老区，并来到河源，他深入新丰



新丰江水电站（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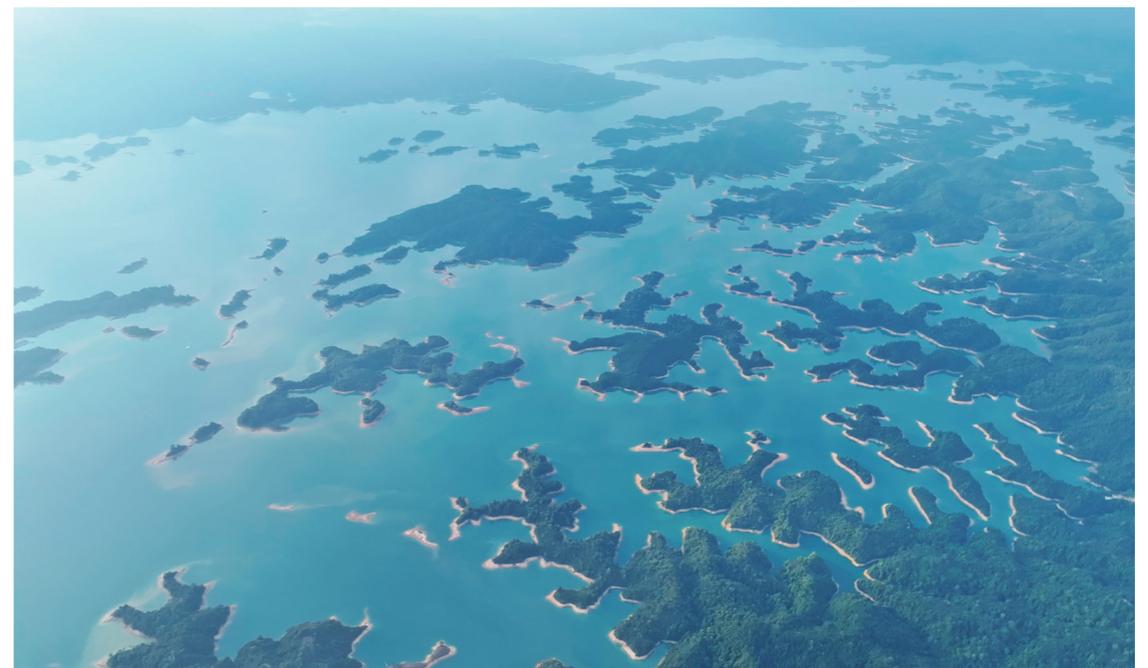
江水库移民家中，亲切询问移民群众脱贫致富的情况。此外，梁灵光、罗天、刘田夫等广东革命老前辈都曾考察过新丰江水库，对河源地方生产和群众生活寄予殷切期望。

守好一湖碧水，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新丰江水库建设60多年来，河源以高度的社会担当和大局意识，勇挑“为粤港澳大湾区守好一湖碧水”的政治责任，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湖水。从1995年起，广东省和河源市历时5年将库区近6万群众再次集体外迁，使移民安置问题得以圆满解决。为了避免工业污染，河源先后推掉了500多个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工业项目落户，涉及投资总额近千亿元。对外开放旅游以来，万绿湖旅游坚持“库内游库外住”，禁止湖区周边发展工业，落实最严格的环保措施。这些默默护水行动的背后，饱含数代河源人民勒紧裤腰带、不怕过苦日子的环保坚守，牺牲小我

成就大我，坚持对生态文明观的生动践行。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今天，万绿湖旅游区以其优美的自然生态吸引着四方来客，也间接带动了湖区6个移民镇的经济。除此之外，“点水成金”的百亿级水饮料及食品



万绿湖

产业已初具规模。2022年，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在万绿湖湖区的半江镇设立了广东省唯一的生态文明建设教学实践点。

万物生长的资源王国

2018年国庆节，万绿湖桃花水母受到了央视的追捧，新闻节目版块“江山如此多娇”对它进行了现场直播。自2003年桃花水母在万绿湖发现以来，这群来自5.5亿年前的小精灵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在同一处水湾出现。因为万绿湖水水质长年保持国家Ⅰ类水标准，且水温恒定在19℃~23℃，所以对水质极其挑剔的桃花水母才会在这里“择良枝而栖”。

万绿湖地处亚热带季风区，受温暖的东南季风影响，一年四季温和多雨，森林覆盖率达78%。植被青绿、环境优

美的湖岛，是一座万物生长的资源王国。湖区拥有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灵猫在内的动物种类200多种；水杉、桫欏等植物种类1000多种；鲈鱼、桂花鱼、白七（翘嘴鲌）等鱼类70多种，是华南地区开展气象水文地质、动植物研究的重要科普基地，先后被评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

万绿湖不仅是人们泛舟湖上信风而行的亲水胜地，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秀典范。它凝结着河源人民建设国家、守护家园的家国大爱，展现了河源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成果。一湖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着不竭动能的瑶池水，一片闪耀着熠熠人文光芒的山中之海，是河源的宝贵财富，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宝贵财富。🌿

晚清河源契约华工史

文◎凌 丽

在清末民初那动荡不安的时代，为了生计，或因政权更迭，不少客家前辈再度离乡背井，离开了祖辈定居之处，漂洋过海，到南洋，到美加，到雪梨（清末悉尼的译名）……他们前往国外的途径有几种：或求助于“水客”自费购买船票前往投亲靠友，或受巴色会带领，沿海岸线长途步行，或被诱拐“卖猪仔”，坐到闷罐子船里远途出行，卖身做工。这些华工刻苦勤奋，又聪明会算，对其移居地的社会经济繁荣贡献厥功至伟，功不可没。

经过数代人的打拼，取得成就后的华侨念念不忘乡梓，他们出钱出力，反哺故乡。

千百年前，客家先人为逃避战乱，拖家带口，困顿颠颠地从中原出发，来到闽粤赣等战火蔓延不至的山区，安家落户，十年成一聚落，百年成一村镇，繁衍生息，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与民俗。

宋、明以来，有零星客家人移民到爪哇、暹罗、苏门答腊等地。16世纪，紫金县龙窝古竹一带曾有农民沿着海岸线步行到越南、斯里兰卡等国。到了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的清代，尤其是清末民初，中国发生了一场人数众多的海外移民潮，或说“华工潮”、苦力贸易潮。

河源、龙川、紫金、连平、和平等地的许多民众，怎么也想不到，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中的黑奴制度被废除之后，和自己竟然有着这么直接的影响。

江桂华的“猪仔”遭遇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初二，清政府驻日本横滨总领事馆门外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送我转屋卡啊，送我转卡。”一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华人步履蹒跚地闯进门，喊着人们听不懂的话。

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急忙上前问：“你是谁？有话慢慢说。”

“有船么？送我转卡咯。”华人说。

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法子，工作人员终于明白，他说的是“送我回家”。

“我是河源人，我叫江桂华。”该华人说。

原来，江桂华在河源时，有个从外地来的人跟他说：“跟我去金山吧，那里遍地黄金，很容易赚钱。”

穷得叮当响的江桂华仿佛看到了花旗国金灿灿的金山。于是，带了几件破旧的换洗衣服，便跟着此人到了一间洋行，才进门，哐当一声，门落了闸，满脸是笑的“引路人”霎时变了一副面孔，几个凶汉扯着铁链过来，往他脖子上一套，他就动弹不得了。江桂华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凶汉推搡着他进了个小木棚，里面还有几个乡民，其中有个人是他认识的，两人相视无言。过了不久，“引路人”拿了几张契约过来，让他们在上面签字。江桂华好歹认

识几个字，才发现自己被卖了，卖往他根本没听说过的地方做苦工。从此，江桂华便成了所谓的“契约华工”，也就是“猪仔”。

江桂华和大批的契约华工一起，10~12人一间，住在棚顶极低、地面铺竹、只有卧身之地的木棚里，有的人身上连一件衣服都没有。

他们被赶到了船上，住在黑暗潮湿污浊的船舱中。在摇晃、封闭、污浊的船舱中过了一两天之后，不少人患上了皮肤病、痢疾等，江桂华因年轻体壮，暂未得病。有人病得奄奄一息，便有两人从甲板上下来，把人抬走，直接扔进海里。

江桂华的所有幻想在这一刻全都破灭了：再这样下去，不病死喂鱼，也要到岸上做牛做马累死。一天，趁着看守不注

意，江桂华躲到货物后面，躲过监视，偷偷上了岸。凭着灵活的身手，他跑出几条街外，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清政府在日本的驻外机构。

几乎在同一时期，同样被骗出洋的河源顺天人士梁海山，找到在横滨的大清总领事馆，哭诉了自己被拐骗的经过，也是请求遣送回乡。

百年后，2000年出版的《河源县志》记载：“本县早期出洋人中，七成以上是被‘卖猪仔’出去的。”

出洋务工：悲惨的“猪仔”卖身

在晚清和民国初年，河源像江桂华等被诱骗卖身做苦工的人确实很多。

1862年9月，美国总统林肯发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长达400年的黑人奴隶贸易宣布废除，而这个时候，又是西方工业革命初兴，对原材料有着迫切的需求，他们需要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并开发矿产、修筑铁路等。受此影响，全球出现了用工荒。人口大国——中国的众多勤劳的农民，就这样进入了“国际视野”。

喜欢看港产片的市民，应该还记得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里有个镜头，是有华人散发传单，招收贫苦民众前往“金山”“掘金”。这时期的华工，通常是被“卖猪仔”过去的。



华工的船舱生活

为什么把人叫做“猪仔”呢？

徐珂《清稗类钞·棍骗类·贩猪仔》中说：“猪仔，内地人民被拐出洋，略卖为奴，使供一切苦役，以若辈蠢如鹿豕，因以猪仔名之。”

如果有人想要逃跑，就会被恶狗追上，被“主人”枪杀。《清稗类钞》曾有记载：“‘猪仔’，实不如牛马。每日晨起，用铁链横锁，牵连就役，每日只给一面包及香蕉二条。监以黑奴，稍不如法，箠楚交下。夜则严闭斗室，桎其手足于榻，使不得转侧。更豢恶犬数十头，如有逃者，即放犬追之，嗅气寻觅，百无一免。获则毙之以手枪，甚且泡以沸汤，焚以烈火，惨不可言。光绪某年，秘鲁有一寮主尤凶恶，曾杀华工至千数百人，积颅骨如山阜，植花木其上，以作景观。”

徐珂说，南洋群岛多有坏人勾结地方恶棍（1994年版的《紫金县志》及2000年版的《河源县志》中均称之为“猪仔头”）诱惑壮丁，见到贫困的青壮年，就巧言令色地告诉他们出洋有多好，又能务工，又能经商。被这些看不见的前景诱惑了的人，跟着恶棍进了挂着某某洋行之类冠冕堂皇牌子的“猪仔馆”之后，如同进了魔窟，失去人身自由，



船上密密麻麻的华工

人被锁链锁上，然后“囚之于木笼，笼中一人或二人，日给饘粥二次”。“每人都要在卖身契约上打指模，贴相片，编上号码，各自挂在胸前，称为契约华工，运往东南亚各国。”

华工实为奴工血泪斑斑

在这种残酷的情况下，即使有可能会死，奴工也要想方设法逃跑。清光绪元年（1875）三月十五日，永安（今紫金）一个名叫赖胜的奴工，侥幸逃了出来，向清朝官府禀称：“我华人被洋人诱实作奴做工，不分日夜，管工乱打。捱苦不过，逃走在外。”

原河源县一个名叫张石连的，也将自身遭遇告知官府。他于清咸丰八年（1858）到了古巴，被卖到一个菜园，供“司头”做工，签了8年的契约，8年满后，“又要我再做4年。4年又满，仍送我出走路馆，修街5年”。17年苦工做完，张石连已经年老体衰，他向清朝官府求救，情愿回乡当乞丐。

咸丰年间，河源县到南洋谋生的人中，大约有七成以上是被“卖猪仔”去的，其大多是从事采矿、修路、砍伐木材、开垦种植园等重体力劳动。黄村镇的程德恒、程兆祯父子，就是被当地的“猪仔头”程燕传、程佩余将他们“卖猪仔”到今印尼采矿的。

有关数据统计，像赖胜、张石连这样的19世纪中叶被运往东南亚的华工人数，超过200万人。

华工血泪斑斑。为解救同胞，粤、闽等地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1858年8月12日，美国“猪仔”屯船上的87名华工在被押往澳门途中曾趁机起事，“猪仔头”被杀，

屯船被毁。广州各界商行亦纷纷联名给英国领事馆写信，揭露外国人贩子掠夺良家子弟、卖民为奴的罪恶行径。广州各界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使外国殖民者胆战心惊。

促成清政府劝阻华人出洋务工

迫于压力，清政府派人前往南洋调查、谈判。同时，清政府开始禁止诱骗华人出洋。这个规定的下达，和两个被骗出洋的河源华工——江桂华、梁海山有关。

接到江、梁两人的“报案”后，清末成立的民政部发现，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了，因此，查处华工被虐情事，“据此查荷属文岛等处虐待华工，前经本部咨行闽粤督抚查禁在案，兹准前因再行咨行贵督转饬各府州县，传谕商会、善堂认真劝谕、设法禁阻，以重民生”。

民政部还照会沪道移商务总会：“请烦查照劝谕商民，禁阻出洋，以免受骗。望切施行。”

1914年左右，各国殖民政府终于废除契约劳工制。

马来西亚华工多是龙川人

咸丰年间，龙川县也有一些民众被“卖猪仔”到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以务农种植为主。

据基督教巴色会历史记载：“1882年，英属北婆罗洲渣打公司派华特爵士到香港西营盘巴色会客家礼拜堂，谒见黎力基牧师商议招募移民来本洲垦殖。第一批应募而来的华工，清一色都是广东省龙川

县人。他们在古达老山垦殖开荒，种植谷物、蔬菜、生果、咖啡、椰子、橡胶树等。1886年，第二批客家华工南来古达开发，约为300余人。第三批由渣打公司招募来的客家人，约有六七百人，于1913年3月间抵达亚庇。”

此三批华工均在广东省五华、龙川、紫金、河源、东莞、宝安、清远、花县等县招募，且均为巴色会信徒。抵达沙巴后，他们先后在古达、山打根、吧巴、保佛、丹南、亚庇、下南南、孟家达、打里卜等地垦荒。这些客家人，勇敢刚毅，披荆斩棘，胼手胝足开拓本州。

最早旅居古达的客家人，当推一罗姓龙川县人。后有杨丙星于1887年由香港乘木船经60多天抵达山打根，2年后定居古达。好南地区的客家人，亦以籍隶属广东龙川者为数最多，龙川客家人中，又以杨姓为多。斗湖客家人以宝安人居首，次为东莞、惠阳、河源、龙川、五华、紫金等县。

在岁月的长河中，晚清华工的命运如同漂浮的孤舟，历经风雨，终见彩虹。他们背负着家国情怀，在异国他乡辛勤耕耘，用汗水和智慧浇灌出了属于自己的天地。逐渐在异国他乡站稳了脚跟的华工，在事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和认可，也为自己的祖国赢得了荣誉。然而，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和魂，始终保持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思念。在成功之后，华工纷纷回到祖国，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回馈社会，反哺故乡，积极参与家乡的公益事业，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民国时期，河源那些留洋的前辈

文◎兰 皖

“欲救吾国，宜养吾民；欲养吾民，宜兴教育！”

这声振聋发聩的呐喊，发自德国19世纪的一位哲学家，由清光绪岁贡、河源邻县——归善人士陈廷泰，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其著作《游学纪闻》中喊了出来。

彼时，洋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清政府摇摇欲坠，士民忧心如焚，时常思考救国良策。

陈廷泰等26人在1902年由两广总督陶模咨送至日本，旨在开眼看世界，学习德、日等国重视教育之做法，外国的做法给他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于是壮志之士，知非游学各国不可。赢粮厚者，或翱翔于英俄之都；取材美者，或联翩于德美之府；乐德邻者，或星聚于扶桑之岛。”欧榭甲发表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议报》的文章如此评说。

河源虽然地处山区，却是广东交通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距离省府不远，广东得风气之先，河源亦能同时感受到。民国期间，原河源县、龙川、紫金、连平、和平等地，都有学生获得留洋学习机会，且学成多有归国。他们倾其所学，是当地文明进步的有力推动者。

最早留学日本的徐傅霖和彭子馨

“欧风自西来，震撼近世纪。众学趋大同，

专门竞绝技。惜哉乡先生，屹然严壁垒。”民国尚未纪元的清末，和平下车镇的留日学生徐傅霖给龙川车田人彭子馨写诗，感叹经过欧风美雨之“洗礼”，闭塞的“乡先生”还固守成规，“交口诋新法，伏案研故纸”，对变法维新十分抵制。

徐傅霖与他年长5岁的彭子馨，“求学渡扶桑，唯我与君始”。

彭子馨（另有资料写“彭祖馨”）是龙川县最早的留学生，清末被录为秀才时，不过十三四岁。后于广东政法学堂毕业，转赴日本留学，在京都政法大学攻读法律，与徐傅霖同学。回国后，他改名彭天铎，在广州做律师30余年。1939年，广州陷于日寇之手，彭子馨归乡做律师。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广州开设了律师事务所。1947年，他当选龙川“国大”代表。

徐傅霖和彭子馨同学之谊甚深，彭子馨的学业较徐傅霖先完成，徐傅霖作诗“今日学成归，九万看鹏徙。恨不随君行，为君执鞭弭。立马鳌山巅，凭吊赵佗址”。“呜呼君去矣！”他慨叹自己一个人在日本，“海外叹孤鸿”（《龙川文史》第5辑）。另外还有一位比他们更早出国留学日本的同乡，名叫彭赤霞。所以徐傅霖在诗末称“赋诗再赠君，并询赤霞氏”。

徐傅霖生于光绪五年（1879），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秀才，补廪生而拔贡，不久随兄长入循州丰湖书院，又改入京师法

政专门学堂学习法律，获优等毕业后，赴日本留学，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日本留学期间，提倡民族主义，孙中山慕其名，数次来访。中国同盟会一成立，徐傅霖便加入了。

后来，徐傅霖学成归国，在反袁（世凯）复辟、推动法制、坚持共和、反对帝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声誉日隆。抗日战争期间，他抗战救亡，严拒日本人的出仕聘请，曾与蒋介石竞选中华民国副总统。他是中华民国第一届、第三届国会众议院议员，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曾任南方护法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部部长等；著有《中国法制史》《刑事诉讼法》《梦岩诗文集》等。

徐傅霖的学识、风度、人品，堪称河源人的典范。他的塑像，现仍矗立在客家文化公园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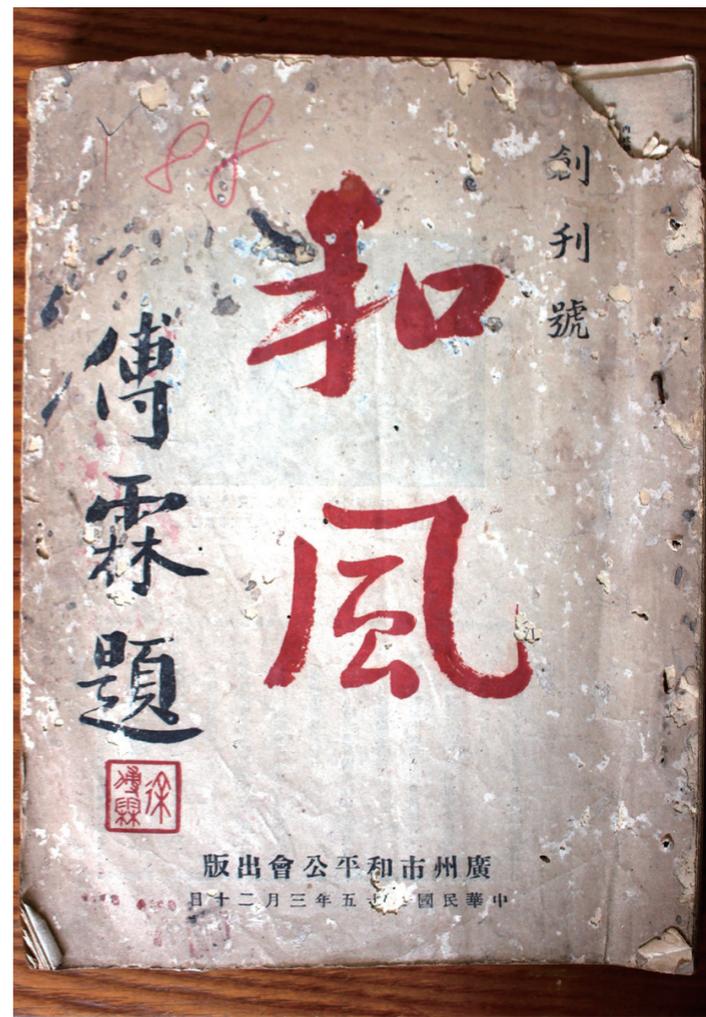
龙川留洋者众多

龙川一向为人口大县，今日之龙川，尤为河源市县区中人口最多之县，有近百万人口，而且非常重视教育。清光绪末年以前，私塾遍布龙川。民国初，私塾与学校兼备。

龙川乡贤黄麟书两次接掌广东省教育厅，关怀桑梓教育，设省立老隆师范；后张蔚文主县政，实施肃塾整校计划，

拨庙产祖尝充裕学校经费，推行小学会考，扩增各区中学。龙川县立一中在县城，龙川二中在铁场，龙川三中（金安）在鹤市，龙川四中在车田，龙川五中在贝岭，龙川六中在赤冈，商业学校设在老隆。同时设立各区民众教育馆，专责推动文化事业，从此奠下文教发展基础。

曾任龙川县县长的张蔚文，字豹如，三区金鱼乡人，曾留学日本。任县长后，



徐傅霖为《和風》杂志创刊号题字”

整顿文化教育，疏治练江河道，后任海丰县县长。

在《龙川文史》第五辑《龙川县籍留学生名录》中，其“编者按”云：“截至解放前止，龙川出国留学学生三四十人。”

这些留学生中，有的留在广州等地，而心系乡梓，如黄麟书、黄强、黄榕增、曾宪文等，在教育和医学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参与家乡的建设；有的回到龙川身体力行，为桑梓建设贡献力量，如方硕梅等。方硕梅于1929年赴美专攻土木工程，学习了5年，获得硕士学位。他归国后，推动了粤东的公路大桥建设。抗战期间，他与工程技术人员、修路工人夜以继日抢修公路与桥梁，保证了公路军运、民运畅通。1941年，广东省教育厅委派他回乡任龙川县立第一中学校长。为避日军轰炸，学生们被疏散到车田镇上课。方硕梅任职后，在城北增建校舍。他筹措巨款，亲自设计，监督施工，8个月即建成4座新型校舍。抗战胜利后，方硕梅被任命为广州圣心中学校长，离开了家乡。

河源县的留学生们

1912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河源县鲤鱼乡人李子先公费留学美国，成为河源县第一个留学生。李子先可谓革命元老，虽然留下的资料不多，但他的影响挺大。钟渭卿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在河源发起剪辫子运动，他带头剪去了那根“猪尾巴”，结果暴露出革命党人的身份，遭清政府通缉。逃往广州后，是李子先介绍他到陈炯明部的第六军第四旅任营长的。后来，钟渭卿升为团长，驻防广州市德政路，负责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警卫工作。

河源县第一位女留学生是徐蕙仪，她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生于河源上角，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1934年到日本留学，1936年毕业。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归国至广州。广州沦陷后，她回到河源教学，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妇女儿童工作，曾任广东惠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广东儿童教养院院长、广东省临时参议员，长期热心教育、慈善事业和妇女运动。1947年移居香港，曾任香港河源同乡会会长。

河源县另一位比较出名的留学生，叫李悦义。1947年，他在河源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竞选时，向全县民众散发的一份传单，将自己45年的人生都讲述了一遍，以期民众支持。后来，他高票当选“国大”代表。

李悦义生于1903年，幼年随父去广州读书，1923年于广东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随后就读大学，获国立中山大学第一届法学士、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硕士、法国帝雄大学法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他在欧洲游历了7年，到过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波兰、比利时、捷克、西班牙等国，非洲、南洋等地也去了不少，他留心当地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情况，所获资料及见识甚丰。他还撰写了《欧洲民主政治之趋势》《经济政策》《社会学大纲》《审计学》《审计制度》《中央预算制度》等著作，内容丰富，为士林珍视。1949年，他迁居台湾。

河源县学校的师资——留学归国的教员

虽说民国期间总是动荡不安，战火不断，但河源县的师资力量却很强大，考有前清科举功名的老师大有人在，新式学堂如国立广

东师范学校、国立中山大学、两广政法学堂等著名高校毕业生也不少，留学归来的老师也不罕见。

1927年，29岁担任河源县立师范学校教员的浙江平阳人颜筠，便是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

留法法学博士王鸿焘，文昌县人，由省教育厅直接委任为河源县立中学校长，任期1年，为1931年2月至1932年1月。

目前可查到的连平、紫金留学生不多，连平有谢静生，字宗琛，号志清，陂头镇人，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后在日本虎山步兵士官专科学校留学。抗日战争时期任国军少将处长参谋、少将局长等职。1946年当选“国大”代表。

紫金县的刘尔题，于1920年赴法国里昂大学学习，归国后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又任国立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广西大学等院校教授多年，是“国大”代表。1947年被国民政府委任为海南农林试验场场长。曾是紫金县参议会议长、省参议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紫金县政协第一、第二届副主席，县科协副主席，因对紫金历史、人文、农业、交通等诸方面都所知甚多，有“紫金通”之美誉。

“凤毛麟角”者才能公费出洋

陈济棠治粤期间（1929—1936年），国内局势动荡，军阀混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治、经济、教育等鞭长莫及，地方政府相对独立。陈济棠开始发展教育，

并着力使用公费派遣成绩极优异学生留学东洋、西洋。

1935年，广东省考选第二批国外留学公费生，分别派赴东西洋各国并习各种专门学术，专门在6月4日至6日进行考试。

西洋留学公费生10名：毛织（英国）1名，造船（英国）1名，兵器制造（德国）1名，军事化学（德国）1名，飞机制造（美国）1名，建筑工程（美国）1名，昆虫学（美国）1名，水利工程（荷兰）1名，渔业水产（加拿大）1名；东洋留学公费生亦是10名，学习纺织、窑业、渔业水产、蚕业、体育童军、家事技术等。

这一年的报考，有性别限制，除“家事”为限粤籍女生报考外，其余仅限粤籍男生报考。考些什么呢？普通科目有：党义、国文、本国（历）史地（理）。外国语，留学英美加三国的均考英语，留学德国、荷兰的则考德语，留学东洋的考日语；科目有：作文、翻译、会话。此外，还要考专门科目，按所报专业考试，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体育原理、运动技术、生理卫生、家事常识、教育概论等。初试录取后，由广东省教育厅送南京教育部复试。留学年限为3～5年，学费全由省府出，襄助出国和回国的路费、服装费，每月给予美金75元或日币70元。这样，生于普通之家而天资聪颖、学业优秀的学生，就可以免除后顾之忧，专心读书，读成回国报效。

民国时期，除了公费留洋，也有自费留学的。自费留学的留学生，河源市现辖范围内，仍以龙川人居多。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河源

文◎李育棠

1939年初到1940年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它是侨居南洋各地的惠属侨胞为支持国内抗战而成立的蜚声海外的抗战团体）来到了河源，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推动河源地区各级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东团的建立及其活动，推动了东江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为中共东江地方各级组织的发展壮大、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河源西部地区（简称河西区）党组织是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第五分团前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时建立起来的。

东团到船塘发展党组织

1939年1月，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惠阳淡水成立，叶锋任团长，刘宣任副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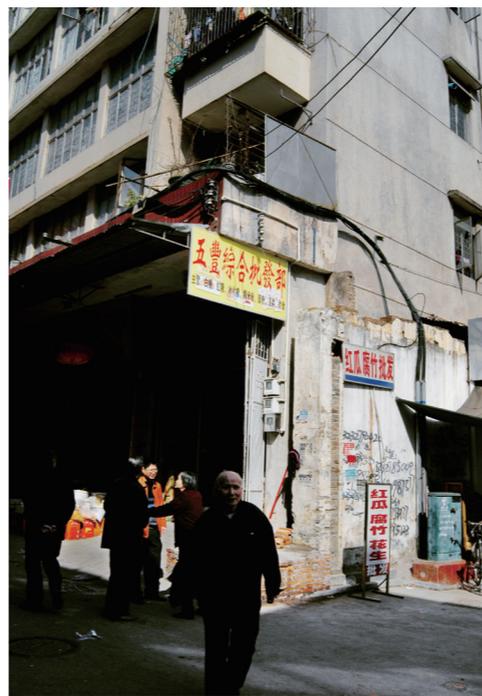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团长叶锋（左）和副团长刘宣（右）

总团之下先后组建了7个分团和2个队。第五分团（后改称河源队）组建于同年4月，由朱公拔任分团长（后由刘宣接任），该分团33人。同时建立了党支部，张桂芳任书记，何淑英、邹清容为委员（3人均均为女性）。4月下旬，东团第五分团到达河源，先是住在上城江家祠堂，不久后搬至太平街1号，与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队）合署办公。他们在县城以文艺演出、召集群众大会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和共产党“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东团第五分团先后到船塘、泥金、黄村等地开展宣传活动，其后进入河西地区，以船塘为主要活动基地。

船塘地理位置特殊，位于河源市东源县北部地区，东江河西岸，新丰江上游，与连平、和平、龙川3县18镇毗邻，是河源西北部及相邻各县边境民众经贸交流的重要圩镇。

1939年，东团第五分团选择船塘作为活动基地，正是看中了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这对在整个河西区及相邻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都具有积极意义。他们在船塘、三河举办民众夜校，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秘密发展党组织。

到达船塘后，东团第五分团首先争取了开明人士、国民党船塘区分部书记欧阳超廷及当地进步青年欧阳潭、欧阳培的支持，推荐、安排了东团的叶茂、黄凤珍、张育民、梁秋云、黄文等人在老围村的焕文小学任教，并以焕文小学为据点，在河西一带广泛开展活动。



河源市源城区太平街1号——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东江区队及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第五分团在河源活动的旧址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首先吸收了欧阳潭、欧阳景南、欧阳梅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暑假，有两名中共党员回到船塘，给东团第五分团带来了新生力量，他们是欧阳涛（龙川一中学生，1939年3月入党）、欧阳忠（老隆师范学生，1939年5月入党）。党组织介绍他们与东团党组织联系，协助东团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同年7月，欧阳忠先后介绍欧阳梧、欧阳年、欧阳璞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组织关系转到东团。从此，党组织就在船塘一带扎下了根并逐步壮大。

1939年10月，船塘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叶茂任党支部书记，委员张育民、黄凤珍（3人均均为东团成员）和欧阳潭，上属龙川中心县委领导，下辖老围、赤

岭、井塘、新寨、畚寮等党小组。随着党组织的壮大和革命斗争的发展，1940年1月，蓝能区委分设蓝溪、能溪两个区委。蓝溪区委书记李振华（也称李作新）；能溪区委书记刘成章（兼）。同时，调整了河源县工委领导成员，陈柏昌任工委书记，驻地为蓝溪梅龙凹头，仍属东江特委领导，下辖蓝溪区委（蓝溪区委下辖6个支部）、能溪区委（能溪区委下辖5个支部）和崇伊中学支部，党员100余人。

1940年3月，中共船塘中心支部调整领导成员，张其初任党支部书记，组织委员欧阳年，宣传委员欧阳潭，妇女委员黄凤珍（女），青年委员欧阳梧。中心支部仍属中共龙川中心县委领导，下辖畚寮、新寨、老围、赤岭4个支部。5月，中共船塘中心支部改建为中共船塘区委，张其初任区委书记，组织委员欧阳年，宣传委员欧阳潭，委员黄凤珍（女）、欧阳梧，下辖畚寮、新寨、老围、赤岭、大湖三角和忠信支部，仍属龙川中心县委领导。

1938年底至1939年底，仅一年时间，河源县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吸收发展党员200多人，先后建立了18个支部、2个区委，并建立了县一级领导机构，完全改变了土地革命战争失败后河源没有中共基层组织的情况。中共河源地方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迅速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各种形式的民众抗日团体，为后来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确立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东团龙和队宣传画

呼吁全县民众团结起来抗战到底

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东团第五分团的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但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发出《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限制和打击共产党的活动，先是把矛头对准抗先队，然后打击东团。1939年初任国民党河源县县长的吴式钧，公开制造舆论说“共产党是异党，抗先队和东团就是共产党”。吴式钧在河源县城发起一次“国民精神总动员”宣誓运动，强调“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军队（国民党军队），一个领袖（蒋介石）”，诋毁抗先队和东团。抗先队东江办事处主任林耀族拒绝参加该项宣誓运动，遭到当局责难与警告。抗先队与东团通过散发传单、街头演讲，揭露国民党阴谋，指出这样的做法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和进步，呼吁全县同胞、一切爱国人士团结起来抗战到底。

1940年春，东江国民党当局逮捕了东团博罗队队长李翼等23人，押往韶关监狱。押至河源时，东团第五分团（河源队）发动一些群众围攻国民党警察，高呼“反对无理迫害抗日青年”等口号。当押送东团博罗队成员的车队到达灯塔车站时，灯塔区署官员、中共地下党员曾端祥等人煮好茶水迎候。李翼

以博罗队队长的身份被请到区署，受到曾端祥及进步人士的热情接待。车站往来乘客和附近群众见这些被押解的“罪犯”受到区署官员接待而大惑不解，曾端祥借此机会宣传说，这些人是爱国华侨，回国来参加抗日救亡的，但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了。这些话激发了群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后来国民党河源县政府虽然知道了此事，但没抓到曾端祥的把柄，只好不了了之。

1940年初，抗先队东江办事处和其下属的基层抗先队组织被查封，东团第五分团（河源队）也要被强制解散。于是，上级党组织采取了应变措施：一是停止发展，巩固组织，派方定到河源队任副队长，协助队长刘宣加强对全队的领导，抓好党务工作。二是分散隐蔽，将那些开展地方党工作的东团成员划归地方党领导，将叶茂、梁秋云、黄凤珍等人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在船塘、三河一带隐蔽下来，其余同志调离河源。同时，另派张其初以小学教员身份到船塘，接替叶茂任船塘党组织的领导。三是不公开使用东团名称，转入隐蔽的斗争。

1940年2月，国民党河源县当局派出人力搜捕在船塘、三河一带教书的东团成员。这个情报被获知后，党组织立即安排这些同志撤离。

东团在龙川

东团到河源县的同时，也到了龙川。1939年初，以徐希哲（龙川人）为领队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龙川队七八人来到了龙川佗城。此时，龙川正遭受日机的狂轰滥炸，民不聊生。

徐希哲，原名亚松，曾就读于龙川一中，

大革命失败“清党”时，他与进步青年郑文成前往广州，后转往香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全面抗战前夕，徐希哲参加了香港惠阳青年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东团成立后不久，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回东江任河源、龙川两县指导员兼东团龙川队的领队，从事上层统战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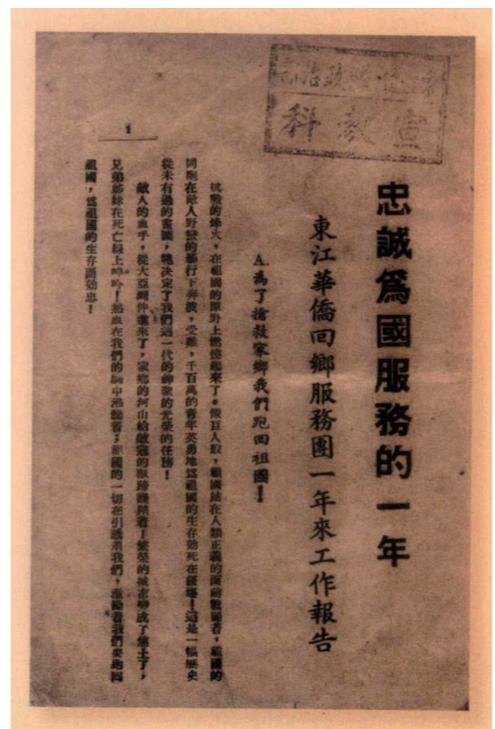
回到佗城后，因人熟地熟，徐希哲很快就与中共龙川县委领导黄慈宽取得了联系，增补了队员，推荐队员邹清容任队长。徐希哲遵照东团团员入团资格（如具有宣传、组织、军事、救护等能力）和入团手续（如就地征求——必须有救亡团体或本团团员2人的介绍，经办事处会议审查认可方可入团），积极在龙川开展建团工作。当时东团是公开合法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

有一定的活动经费。1939年3月底，龙川队扩大为东团第六分团。不久，徐希哲离开东团赴香港，由邹清容任团长，方云生任副团长，团员亦由原来的十多人增至近30人，团部驻龙川县城，下设民运、宣传、财务3个组，分为2个队：一队活动于县城及附近乡村，队长由当地抗先队队长张其初兼任；二队活动于鹤市地区，队长由当地抗先队队长方云生兼任。

东团第六分团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当地各机关团体组织歌咏班、音乐会，提高民众对抗战的认识，协助当地各小学组织儿童团，开办民众夜校，联合各界举行座谈会等。这些活动，都是在龙川党组织的积极参与、发动乃至领导下进行的。龙川县委除派出党员骨干参加并任其团、队的领导职务外，还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展党组织的指示，积极动员和选派一批先进青年到东团工作、锻炼，通过考察，从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

各队中的党员几乎都以当地同志为主，熟悉本地区情况，每到一乡村或圩镇，便有目的地去做那些殷实人家、开明绅士、富裕商贾等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贝岭队得到了区长李敬业的支持，为该队解决了驻地、图书阅览室、游击训练班课堂及训练场地等问题。其他各队通过办墙报、漫画、演讲、表演节目，教抗战歌曲，办书报室、妇女儿童识字班、成人夜校，甚至给农民帮耕、施医赠药等，使龙川民众及各阶层人士深受感动，甚得民心。

但国民党龙川县当局指责东团队员不是华侨，而是共产党派来的“危险分子”，指责李敬业“姑息养奸”，国民党龙川县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工作报告封面及第一页（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藏）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龙和队队部旧址——茶壶耳屋

县长邓鸿芹向广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密报东团“行动亦不纯正”。1939年冬，龙川县城、鹤市、贝岭几个队相继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刁难。他们被迫到乡下去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此时，东团第六分团团长方云生率部分队员离开龙川，与东团和平分团合并为“龙和队”，常驻和平县。1940年春，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逮捕了东团博罗队员23人后，龙和队被迫解散。

东团在连平

连平县也与河源、龙川二县同步开展相关工作。1939年11月下旬，颜硕民在紫金古竹接受了东江特委宣传部部长饶彰风下达的率东团龙和队到连平开展工作的任务。饶彰风说，连平的忠信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据点，目前是空白点（没有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这里可以通江西、韶关。在忠信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交通据点就可与韶关、和平、江西连成一片，加强东江特委与粤北省委的联系。忠信要在半年内建立党组织。

1940年1月底，颜硕民带领龙和队20多名队员，从龙川老隆出发，一路步行经灯塔、顺天到达忠信，队部驻公路边上的茶壶耳（现油溪镇）。春节后，黄中强等来到忠信大塘村，

参加了龙和队的支部领导（颜硕民任书记），任宣传委员。

龙和队开办民众夜校、妇女识字班、儿童识字班，教唱救亡歌曲，办墙报、黑板报，演街头剧等。当时活动开展得比较出色的是在茶壶耳屋举办的儿童识字班和大塘小学附近的民众夜校及大湖弘毅小学的农民夜校。这些人员每到一处都争取和团结当地的进步教师、学生以及社会进步人士。与群众紧密联系，访贫问苦，帮助耕作，免费治病，在与群众学习、劳动和生活的接触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龙和队在连平忠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的同时，还秘密发展党组织。连平县第一名中共党员吴泓生，就是龙和队发展的。当时，吴泓生是大塘小学校长，龙和队一到大塘，他就组织学校师生安排龙和队队员的食宿问题，还经常邀请队员给学生讲政治课，宣传抗战，一起和龙和队办夜校。吴泓生的表现和政治倾向引起队部领导的关注，决定对他进行重点培养，不久他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1940年初，国民党在东江各地打击和破坏东团的事件接连发生。为保存实力，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损失，适应斗争形势需要，龙和队根据上级“化整为零、隐蔽活动”的指示，于7月奉命撤离忠信大塘，返回紫金古竹。✎

省港大营救： 那一年的龙川老隆群星闪耀

文◎李育棠

80多年前，香港沦陷，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胡绳、千家驹、廖沫沙、胡风、丁聪……300多名困居港九的文化名人及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帮助下，穿过日军封锁线，沿东江溯流而上，经由龙川老隆——“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重要中转站，转移到安全的大后方。这些日后在文化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文化名人的到来，让龙川老隆载入中共红色史册。

港九沦陷，“群星”搁浅

1941年12月7日（当地时间），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澳门相继沦陷。20日，省政府成立抢运港侨委员会，先拨40万元救济费，抢运香港难民，其中就包括滞留香港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800多人，处境极其危险。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等人要不惜代价组织营救。

廖承志、连贯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立即部署营救工作，决定趁侵占香港的日军立足未稳，且对香港情况还不甚熟悉，以及大批难

民逃离香港之机，以最快速度帮助滞港人士迅速转移。

趁着这个有利时机，廖承志、连贯和张文彬、梁广、尹林平等商量后作出周密部署：一、设法与文化、民主人士取得联系；二、撤退营救工作分水陆两路同时进行。除少数人取道五邑、广州的西线撤离外，大部分人将被秘密护送到港九游击基地，再转移到惠（阳）东（莞）宝（安）根据地，最后护送到大后方。同时明确从九龙到惠州的安全护送工作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前身）负责，从惠州到老隆由前东特委负责，从老隆到韶关由后东特委负责，到韶关后，



从香港营救脱险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张友渔、茅盾、高士其、千家驹、胡绳等

则由粤北省委和乔冠华具体安排他们转移到桂林、武汉或苏北抗日根据地。

具体安排是这样的：文化人士抵达老隆后，设两条营送线：一线是老隆—兴梅—大埔—闽西南，胡一声（驻兴梅）负责沿途随行等工作；另一线是老隆—曲江（韶关）—衡阳—桂林（后往重庆），由乔冠华（驻韶关）统筹安排，两条线均由连贯（驻老隆）负总责。

老隆此时成了营救与护送文化名人脱险的重要转运站。作为营救负责人之一，连贯就住在龙川福建会馆，精心安排指挥民主和文化进步人士的大转移行动。

连贯必须在老隆建立一个联络站，乔冠华则去韶关建立联络站，因在韶关的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的参谋处处长赵一肩和他是留德同学，可以利用这层关系。

连贯后来撰文回忆说，当时，粤汉铁路不通，文化人士从惠州向大后方转移，只有先走水路到老隆，再乘汽车到韶关，然后才能从韶关乘火车经衡阳到桂林、重庆。老隆

和韶关这两个中转站地处国统区，已在东江游击队活动范围之外，因此需要加强领导，组织当地地下党做好接应护送工作。经研究，决定由廖承志一人赴重庆向南方局周恩来汇报香港沦陷后的工作情况，连贯和乔冠华则留下来组织转送工作。

1942年除夕，打扮成“阔佬”的茅盾夫妇、廖沫沙、韩幽桐等抵达惠州。这是当年“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中第一批从沦陷于日军的香港抵达惠州的文化名人。此后，大批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陆续到来，按计划被一路从惠州经东江水路护送到老隆。

1942年1月下旬，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从惠州乘船到达龙川县的重镇老隆，指挥香港文化名人营救大行动。因逆水，船从惠州到老隆走了8天，而从老隆到惠州顺水，一天就能到达。

老隆地处交通要冲，是东江航道的终点，往西可到韶关，经湖南转往广西、四川；往东可经兴宁、梅县、大埔转往皖南、苏北。

因此，众多自香港逃离到抗战大后方的难民，都要经过老隆。

自1940年上半年开始，归国华侨陆续增多。时东江护侨事务所拟成立东江华侨合作社，该社成立后，各出入旅客均得免费住宿，且便于管理保护各华侨。同年7月，省赈济会成立港澳侨胞归粤各护送站，有鲨鱼涌、淡水、河源、惠州、龙川等处，各站成立护送队、医疗队，

在沿线为归侨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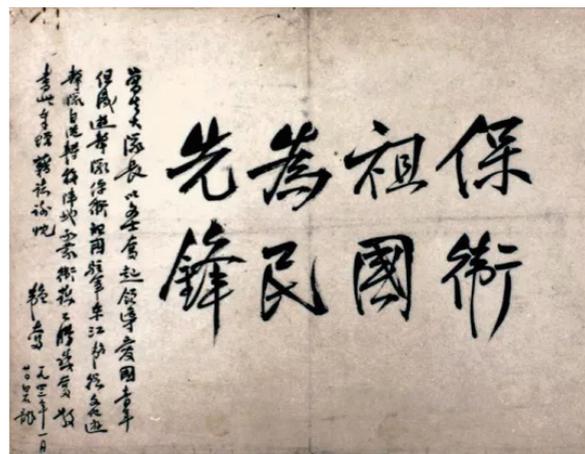
活跃在老隆商行的“生意人”

地处东江抗日大后方的老隆，抗战期间很是热闹，粤东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凸显，商业繁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防止遭人破坏，老隆镇内国民党军警密布，关卡林立，特务常出没于茶楼、酒肆、旅馆之间，并以防止日本间谍混入内地为名，设立“港九难侨登记处”，一面审查从港九回来的人员，一面增添并加强水陆关卡检查的特务。

连贯住在老隆镇郊农村里，协助他工作的主要是东江后方特委书记梁威林领导的地下党。此外，还有原在香港和乔冠华一起主办“香港中国通讯社”的胡一声（中共党员）、郑展等。香港沦陷后，他们脱险到达东江游击队前线基地白石龙。由于他们都是梅县人，又有归侨身份，游击队领导曾生派他们回家乡以做生意为名开展统战工作。

这两条营救路线的运送工作，困难重重。抵达老隆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有的经兴梅、大埔转往闽西南，有的因身份暴露暂时留下隐蔽，待以后再转送，但多数人则由老隆经韶关到桂林。老隆至韶关这一线，主要是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以“争取中间势力”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商行所发展的社会关系，秘密完成掩护接送任务。

老隆福建会馆旁有两间商行，“义孚行”和河唇街的“侨兴行”，这两处商行既是办事处又是联络点，连贯常住这里。特别是“侨兴行”，与国民党朝野官员、



1942年1月，邹韬奋从香港脱险后，在白石龙村题词：“保卫祖国，为民先锋”

城乡士绅建立了一张很好的“关系网”，在粤、桂、湘等省均设有办事处或商号，且自身有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老隆、梅县之间，这为疏散护送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另外，老隆还有家商行叫“香港汽车材料行老隆分行”，老板也是和地下党有联系的统战人士。

文化名人从惠州乘船到了老隆，就由交通员带着到这两间商行，找连贯和郑展，以接待香港股东逃难家属的名义安排食宿。文化名人们都持有地下党用钱搞到的“难民证”（均为假名），再加上又与商行有联系，一般不会引起怀疑。

但是，鉴于国民党特务缉捕很紧，文化名人到老隆后也不能久留，多数人最多住一两晚即乘连贯等通过商行联系的车辆，前往韶关转往桂林；少部分人则在胡一声等人护送下，经兴宁、梅县、大埔等地前往闽西南，再辗转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如黄药眠、郑书祥等几十人就是从这条路线走的）。



1949年6月1日，龙川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县委、县政府设在老隆

因时局紧张，离开老隆后，这些文化名人的旅途也不顺利。法学家张友渔从惠阳坐船到老隆，连贯在老隆旅馆接待，雇了几辆贩私盐的汽车，送他们去曲江。中途，听说前边查私盐查得很紧，盐贩子不敢走了，又折回老隆，但连贯已离开旅馆，找不到人了，张友渔很着急。待了一些时候，听说可以走了，汽车才又开出去，最后才到达曲江。

茅盾化名孙家禄，与张铁生等一大批文化人士在1942年元宵节乘木船到达老隆；次日，以“义侨”身份搭上一辆去曲江的军用卡车。茅盾是个倔老头，到老隆后，却不肯隐蔽。连贯再三劝说，他仍执意冒险要走，连贯没办法，只好派人护送他乘汽车到韶关，途经连平忠信，在广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忠信站招待所住了一夜，每人领得义侨证明一张，生活补助费18元。3月9日，茅盾等乘火车到达桂林，此时距他们离开香港正好两个月。

此外，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其家人、柳亚子和女儿柳无垢等，混杂在难民中，乘机帆船离开香港到了海丰。国民党中央委员罗翼群（兴宁人）获悉，亲自驱车到海丰迎接。几经周折，一行人才从海丰经兴宁、五华抵达老隆“侨兴行”。征得柳亚子同意，连贯在龙川党组织协助下，把柳亚子父女俩护送至兴宁山村石马乡。

在返回内陆途中，柳亚子两抵老隆，第一回“碰上顶子”了。按计划，是连贯在老隆等他们，将他们送往

韶关，结果那几天连贯因处境不佳，避往他处了。他们在老隆待了几天，决定又返回兴宁，再由兴宁转梅县暂住。结果，连贯亲自赶来接柳亚子一行，乘车赴兴宁，再转老隆，许多熟人都在老隆等着他。在“侨兴行”的安排下，柳亚子和故旧欢聚一堂。“这一帮人，把我们捧凤凰似的捧了几天，吃很好的酒菜，住很清洁的旅馆，所以倒是不觉得旅途的困顿。”（柳亚子《两抵老隆》）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地下交通员从惠州送来了两位先生，其中一位消瘦的脸上戴着眼镜，难民证上的名字叫“李尚清”，是香港某商行股东。连贯告诉郑展，这就是邹韬奋，另一位是胡绳。当天，邹、胡二人被安排在“义孚行”住下。第二天，连贯让郑展联系去韶关的车，让胡绳先走了，把邹韬奋安排到梅县陈炳传家中暂住。韶关国民党一家报纸在“时人行踪”栏登了一则消息：“邹韬奋原在东江游击队，后因日军进攻，闻已



邹韬奋用过的公文包（龙川县博物馆 / 供图）



2022年8月，重修前的老隆福建会馆内景（黄赞福 / 摄）

离队住在东江乡间。”他在东江一带的踪迹被国民党当局获悉。

雪上加霜的是，1942年6月初的一天，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郭泉被捕叛变，中共粤北省委遭到破坏。这时，文化名人的护送任务已近尾声。郑展立即从“义孚行”迁到“香港汽车材料行老隆分行”，继续以做生意为掩护，与护送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的地下交通员接头。不久，从香港营救出来的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基本中转完毕，郑展随即根据连贯指示，以“侨兴行”伙计陈炳传的名义，到梅县潜伏下来，一直到9月下旬才找到机会，将邹韬奋安全护送离开。

老隆成了营救与护送文化名人脱险的重要转运站

这次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从发起到完成任务，历时逾半年。据不完全统计，

经老隆护送至韶关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有300多人，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张铁生、张友渔、胡绳、千家驹、廖沫沙、胡风、丁聪、陈策、李佰球、陈汝棠、邓文钊、上官德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等。

多年后，曾作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老隆福建会馆，成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9年10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重要史料和大革命时期当地其他革命史料的陈列室。从香港到内地的大后方，整个营救文化人士的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老隆镇亦同时被赋予了一系列良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效应。茅盾曾称“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为“抗日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老隆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者，伴随着文化精英的名字以及大营救中所传达的文化信息而历久弥新。✎

徐蕙仪：徒步六百里，护千名孤儿避烽火

文◎周 煥

70多年前，河源曾在抗战烽火中为1100余名战争难童提供了一个可以撑起一张课桌的“避风港”，其中，有一位河源女性，更是为抚育这些难童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她就是河源首位女留学生徐蕙仪。

难童的好妈妈

“现在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战灾儿童，其中有的是为了我们祖国的独立自由而牺牲的战士的遗孤，有的是被空袭炸死父母的子女，有



徐蕙仪

的是流离失所并被饥饿和疾病夺去生命的难民的后代。另外，还有成百万的儿童，虽然他们的父母还活着，但有的是战斗在前线的战士，有的是被日本侵略者赶出家园的难民。”1939年3月，宋庆龄发表了一篇文章《救济战灾儿童》。文章中说：“全国孤儿救济总会进行了艰巨的救济孤儿的工作……以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保存下来，并成为未来自由的人。”

本着这样的信念，救济抗战难童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陕西三原、广西、四川都在建设这样的孤儿院。

1938年底，李汉魂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其夫人吴菊芳被任命为广东省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主席。在吴菊芳的努力和省赈济委员会、省妇女会的支持下，1939年8月，在战时省会韶关的曲江沙园村建立了广东儿童教养院。他们派出抢救队，深入沦陷区，闯过重重关卡，将一批批难童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由于解救的难童越来越多，儿童教养院规模不断扩大，陆续在粤北各地建立起7个分院和2个小学部。儿童教养院的学生总数达7000余人，教师600余人。为了适应儿童教养院毕业生升学需要，1940年9月起陆续创办了江村师范学校及北江农工职业学校。

源城下角徐屋人徐蕙仪，是儿童教养院第七分院负责人。她是原河源县第一位女留学生，不仅是河源妇女运动的先行者，还是关爱、保护儿童的先驱。

1940年，刚刚经历丧夫之痛的徐蕙仪，

赶赴乐昌罗家渡担任保育院院长。保育院里都是从沦陷区解救出来的年龄在10岁以下的幼儿。1941年，沙园三分院改为七分院，徐蕙仪任主任，同事和朋友们因此称其为“徐七”。

沙园前临武江，江边建有厨房、宿舍、大礼堂、大操场、仓库、图书馆、工场、小农场，还有儿童邮局、儿童银行，江心沙有医务所，医务所有门诊部和留医部。这些建筑都用杉皮作屋顶，竹篴作墙，但配套齐全，是难童们学习、生活、劳动、训练和体育活动的好场所。七分院有5个教导区，每个教导区有学生200人，分为4个班，教师8人。第一、第二教导区属高年级，第三、第四教导区是中年级，第五教导区是低年级。

1942年，沙园七分院新来了近百名从台山、开平侨乡解救出来的难童，个个骨瘦如柴，面无血色，长期挨饿，不少濒临垂死状态。

看着这些难童，徐蕙仪和工作人员含泪为孩子们更换衣服、理发沐浴、检查身体，抚慰他们深受创伤的幼小心灵。

徐蕙仪决定，先对孩子们进行医治，等到他们恢复健康，再编入各教导区的班级。她多次前往韶关的医药卫生机构，寻求更多的医药支援。她经常到医务所去了解病童的治疗情况，巡视病房，像慈母一样，给病弱儿童更多的关爱。

恢复健康的难童，经过测验之后，按学历程度编入各教导区的各年级上课。

香港沦陷后，海外侨胞捐赠钱物的渠道断绝，救济机构的经费更加困难，生活更加艰苦，孩子们生癞疮，患皮肤病、疟疾和夜盲症的增多。徐蕙仪忧心如焚，



从日寇占领区解救回来的难童

一面和医生护士商讨医治方法，一面去寻访民间验方、草药，用锅底灰蒸猪肝治疗夜盲症，取得了较好疗效。

中年丧偶的徐蕙仪没有再婚，她将一腔母爱都倾注到了难童身上。在沙园七分院，老师们上课时是先生，下课后是家长，与学生同住、同吃、同劳动。平时，中年级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去犁市粮仓挑米，上山砍柴割草，开垦河滩耕地种瓜菜。空袭警报响时，老师带领学生疏散。晚上给孩子们查看床铺，为孩子们挂蚊帐、盖被子。徐蕙仪和教师与学生都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几十年后，学生们回忆起徐蕙仪和老师们，都眼眶含泪，怀念他们共同的“妈妈”。

对教职工，徐蕙仪也是关怀备至。1944年，她为5对青年教师举办了简朴而隆重热闹的集体婚礼，并亲自做主婚人。这种大胆的移风易俗的举动，在当时作为战时省会的韶关影响很大。在徐蕙仪的支持下，七分院还邀请了著名作家巴金和部分知名音乐家来演讲、演出。

千名难童徒步 300 公里河源避难

抗战时期，广州及省内许多地方被日

军侵占，大批知识分子不愿被日寇奴役，纷纷离开已成沦陷区的家乡，到后方去，一部分到河源当了教师，一部分到韶关进入儿童教养院当教师。

1944年底至1945年初，为了打通粤汉铁路，日军对粤北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从南北两面夹攻曲江。韶关在1945年1月中旬开始大疏散，省政府所属机关团体决定东迁龙川县，儿童教养院系统所属院校也一同迁往龙川。

对此，吴菊芳指示，尽量保证每个学生的安全，不让一个学生受冻挨饿。选择小路，避开交通线，如大家都选定了相同路线，要避免中途挤塞，尽量减少沿途给养的困难。

儿童教养院总院派出人员在大坑口、翁源、连平、和平等县沿途路口分别设站，疏散队伍。

数千人的徒步行军，其中绝大部分还是需要保护的少年儿童，最小的只有七八岁，还有病弱儿童、教职员家属和即将分娩的女教师，其艰苦程度自不必说。徐蕙仪所在的第七分院，人数众多，有1100余人，学生年龄幼小，走公路易被敌人追上。按照部署路线，七分院取道经曲江以东的枫湾、隘子、坝子，翻越九连山到连平后再往忠信，目的地是上莞。七分院撤离的路程大约是300公里。他们走小路和山路，远离公路与城镇，以避免日寇的空袭和追杀。徐蕙仪带领七分院师生于1945年1月中旬到达枫湾。

为了保证全院师生都能顺利、平安到达河源，作为七分院总指挥的徐蕙仪，决定将全院师生分为3个队，分批行军。第一队是先行队，队长带领一区队学生负责打前站，为全院的大队伍探路、借宿、购粮等，到达上莞后要筹措全院的粮食、柴火。第二批是全院师生，其中有各年级中的病弱学生、2个临

产的老师和在沙园刚产下婴儿不久的产妇符令娴老师。第三批是后行队，由教师陈广浩负责带领一区队学生，任务之一是暂留枫湾，等待由韶关船运公物来后，将物资运上岸并藏好；任务之二是帮助和照顾3名孕产妇老师和病弱同学行军。

徐蕙仪因是河源人，又是院主任，她决定打前站，亲率先遣小组前往河源筹备1100多人的安置工作。

1945年1月27日，日军侵占韶关后，枫湾危在旦夕，留在那里的病童处境十分危险。已走到连平县的徐蕙仪，在连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严兆龄、陈广浩、黄衡光3位老师率领一批学生，赴枫湾对病童进行营救。

2月15日，3位老师日夜兼程赶往枫湾。2月19日，枫湾的师生开始疏散。其中，符令娴刚生下一个婴儿，本该是被照顾的对象，但她却不断地给大家打气，照顾其他孩童。他们穿不暖，只带了炒米做干粮，渴了就吃雪吃冰，饭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御寒，幸而途中得到山民的帮助，这才得以逃到山下密林中。2月20日，救护人员带着他们撤离险境，历尽艰辛，最后走到了河源上莞。

九连山脉地处粤赣边境，最高峰有1254米。正当枫湾的师生历险时，七分院的领队带着孩子们和教职员工，也在取道江西三南（虔南、龙南、定南）艰难地前进。

九连山接连九县，崇山峻岭绵延不断。他们行军时正值隆冬，寒风刺骨，山路崎岖，队伍每前进一步，都要花相当大的气力。队伍从广东境内的南麓登山，翻山费时一整天。到达北坡时，天正下雪，被称作鱼眼雪的雪粒打在身上，雪水还从脖子流到背上，冷得人直发抖。直到傍晚，才到达北坡山麓江西境内。力行中学和江村师范学校的学生也是攀

越了九连山进行疏散，历尽了艰险。

儿童教养院总院及各校的师生都在这一时期陆续到达和平、龙川等地。六分院师生抵达和平县，分别在彭寨、林寨、古寨复课。江村师范到了彭寨，借用公和街的几间店铺做校舍，每间店铺的楼上为宿舍，楼下做课室。不久，搬到彭寨中心小学上课。北江简易师范学校在龙川县鹤市欧江村借用金兰书院复课，力行中学驻鹤市一所小学。2月，总院由连平抵龙川县设址办公，4月迁平远县城，7月迁大柘。不久，力行中学、江村师范、北江简易师范学校200多名学生参加了青年军，奔赴抗日前线。

书声琅琅的上莞

徐蕙仪带领的七分院师生，也离开了连平，经忠信到达河源上莞乡，住进了院部借用的土围子、旧祠堂和民房。师生们努力修葺房舍，作为课室、宿舍与厨房。

在上莞，没有凄厉的警报，没有隆隆的炮火，没有随时丢掉生命的危险。大家安定下来后，开始复课。徐蕙仪安抚师生的心，恢复教学秩序。七分院的歌咏队也活跃了起来，在老师的指导下，经过短期训练，参加了河源县师范学校、中小学校学生大联赛，获得了冠、亚军的好成绩。

奔波途中，在供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徐蕙仪毅然收留了10多名陷于绝境的儿童。到上莞后，她又吸收了一批失学穷家子女到七分院插班免费附读，并赠送课本、文具。

在动荡的局势中，儿童教养院的经

费、粮食、医药、物资都极其紧缺，徐蕙仪举步维艰地当好了这1100多人的“家”。她经常奔走于河源、梅县、平远之间，得到了地方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帮助，解决了很多问题。

纯朴的上莞人很是同情这些逃难而来的孤儿，慷慨地借出床板、家具、用具给他们使用，还在过节时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

但在1945年6月，日寇进犯河源，龙川局势又紧张了起来，刚安顿下来的5所院校，又面临极大威胁，总院命令各院校立即就地疏散。省政府也从龙川迁往平远县大柘，力行中学迁往梅县，六分院原迁平远，途中忽闻形势好转，又返回彭寨。江村师范疏散到贝墩，一周后返回彭寨。

各校虽在动荡不定的形势中不能获得较长时间安定，然而他们在漫天烽火中，依然弦歌不辍，有饭吃时，必有书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到上莞，师生们欣喜若狂又哭又笑，唱歌、敲击手边的口盅、面盆，放鞭炮，组成队伍从这个村游行到那个村，尽情狂欢。直到半夜，儿童教养院的师生还在兴奋地畅



1947年，徐蕙仪出席广东省妇女会第一期家政班结业典礼

谈，憧憬着回到广州、回到家乡，尽享太平盛世的幸福日子。一位教授在彭寨地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上，朗读了他改写杜甫名句的诗句：“即从彭寨穿东水，便下惠州向广州。”

暂驻河源，南归广州

1945年11月，徐蕙仪在河源县政府的协助下，将广东儿童教养院第七分院从上莞迁到河源县城黄家祠。

在上莞生活了将近1年的师生们，依依不舍地与结下深厚情谊的乡亲们告别。

在河源县城家乡，徐蕙仪一面安排师生正常上课，一面派人到广州筹备搬迁事项，同时组织师生加紧排练大型多幕话剧《国家至上》，以作答谢演出。

1946年元旦，河源县城庆祝抗战后第一个没有炸弹枪炮声的新年。曾在儿童教养院当教师，后来曾任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的张云记得，在中山公园戏台上，七分院师生排演的话剧《国家至上》演出了，尽管服装、道具、布景都十分简陋，但演员们表演投入，情感真挚，打动了观众，多次谢幕后，观众掌声才渐渐平息。

1月底，河源的一支船队满载着七分院的师生员工，顺着东江，驶向惠州、增城，南归广州。

已于1945年七八月间接替吴菊芳任省儿童教养院院长之职的徐蕙仪，除了要尽心尽力照看七分院外，还有整个儿童教养院系统。1945年9月起，疏散到东江各地的院校，陆续向广州复员，江师、北职由省教育厅安排，总院、六分院和七分院，由新任总院院长徐蕙仪率领，力行中学由吴菊芳指挥。这几所学校学生人数有3000人，教职工300多人。



1948年，吴菊芳在广州力行中学大会上训话，徐蕙仪（左）侍立于旁

回广州的路线，是由东江顺流而下，先步行或乘船到龙川老隆，再由老隆乘船或转船，经河源、惠州、东莞石龙，然后在石龙乘火车到广州，或直接转船到广州。

东江之上，满载学子的船队浩浩荡荡。然而，七分院回去的水路并不太平，当行至河源与惠州之间的河面上时，突遭土匪袭击，机枪从岸上往船队扫射，企图抢劫，幸得复员部队还击，才使七分院安全通行。七分院到达广州后，顺利入驻结构精美的古建筑群——广州南岸环翠园。

吴菊芳在1994年撰文回忆，省儿童教养院及各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总数在两三万人之间，散居于海内外，大多事业有成。

安定下来的徐蕙仪，任力行中学代校长、校长，后移居香港，任永康中学和永康小学校长。1987年，徐蕙仪于香港逝世，享年81岁。✎

黄麟书：广东现代教育奠基人

文◎兰 皖

龙川子弟“海归”初登教坛

黄麟书，名林祥，亦名凌翔，字麟书，以字行，别号橛园。清光绪十九年（1893）九月二十二日生于河源龙川县金鱼乡（今黄布镇）蕨冈（亦名马江，今名马岗）上兴园。

6岁那年，黄麟书开始在家族私塾接受启蒙。光绪三十二年（1906），龙川金鱼乡始设新式学堂，14岁的黄麟书获得了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进入了由金兰书院改设的金鱼约文明学堂。

由私塾到新式学堂，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极大转折点，黄麟书以少年子弟之龄亲历了这个剧变的时代。或许基于此，他认识到教育于个人、于地方、于国家的重要性，在往后的岁月中，他一直将教育作为最重要的事业着力推行。

然而黄麟书在金鱼约文明学堂并没有待多久，当年暑期，他因母亲张太夫人去世而辍学，翌年进入通衢的明新学堂读书。16岁，黄麟书师从钟玉成学习国文。

1909年春，黄麟书赴广州求学，1913年毕业于广州公立教忠师范学校。

十七八岁时，黄麟书还在广州读书，便与同乡拜访了住在珠光里的乡贤黄镜繁。看着年少英俊好学的黄麟书，曾任龙川民选县长的黄镜繁非常喜欢，说：“你

和我家阿紫，是龙川后起之秀啊。”这位“阿紫”，就是黄镜繁的幼子黄强，后来成为龙川极有名的贤达。

不久，黄麟书赴日本东京留学，接受了另一种全新的教育体系。黄麟书留学日本期间，正值日本的大正时代，日本经济飞速增长，在教育、艺术等方面涌现出各



河源客家文化公园内的黄麟书像



青年时期的黄麟书

种思潮。从龙川乡村出来的黄麟书，多方观察日本的现状与变化。他逐渐意识到，唯有教育，才能提升国民素质，才能改变清末以来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

1917年，24岁的黄麟书从东京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返国，于次年任龙川县立中学学监。

在走上教育岗位最初的那几年，他除了在龙川任教外，还到海丰县立中学、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任教员、学监、教育长等职，随后又回到龙川县立中学任教务主任。

1927—1929年，黄麟书进入军营，任广州黄埔军校、燕塘军校政治教官（时任校长为陈济棠）等职。

1925年秋，国民革命军东征第三纵队队长程潜进军龙川，授命地方人士组织新政府，黄麟书被公推为龙川县县长。1927年冬，他任第十一师少校秘书，师长为陈济棠。1930年夏，调任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民众运动委员会科长，不久后任组织部秘书。时任委员和部长为陈济棠。

在和陈济棠共事的日子，黄麟书的人品与工作能力都被陈济棠看在眼里，异日将有大用。

奠定广东教育基础

1931年陈济棠全面掌握广东的军政大权后，十分注重广东的地方建设，教育是他最重视的项目之一。他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广东省第三次教育会议上说：“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永久的事业……一国之内，如不尊重学者，试问学术从何进步？文化从何增高？国将从何而立？”

陈济棠于1932年秋正式颁行40万字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教育便列于民政与财政二者之后。因为对教育十分重视，陈济棠在考虑省教育厅厅长人选时也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选择了共事多年的黄麟书。

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1929—1936年，即民间所称的“陈济棠时代”，是当时广东教育发展得最快最好的时期，先后由许崇清、金曾澄、谢瀛洲、黄麟书出任省教育厅厅长。

《广东三年施政计划》记录，到1935年，全省教育经费高达2054万元（1913—1920年，教育经费只有三四十万元），占全省经费预算的41%。

1940年1月至1945年8月，黄麟书再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教育厅厅长。时任广东

省政府主席为李汉魂。

在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期间，黄麟书非常重视小学教育。他认为：“初等教育为国民普遍之基本训练，实于教育进程中最基本之阶段。东西洋各国，莫不锐意义务教育，其重要由此可知。”

黄麟书在《茂名县政季刊》刊载的《二十三年度广东教育概况》一文中提到，1934年广东省有小学校63700所，小学教员61670人，有小學生1252520人。虽然当时广东的教育事业较其他省份发达，但身为省教育厅厅长的黄麟书很清醒地认识到：“然全省人口为三千五百万，失学儿童之数，尚倍于现有就学儿童之数。”因此，他想方设法多建学校，增加学位，增加经费给贫困学校。

在河源市源城区档案馆中，藏有一册《河源县某区私立某校初级小学校第一年级某班参考书目录》（参考模板，因此没有学校名字），科目有：国语、社会（含卫生、公民、历史、地理）、自然、园艺、算术、图画、手工、乐歌、体育、童子军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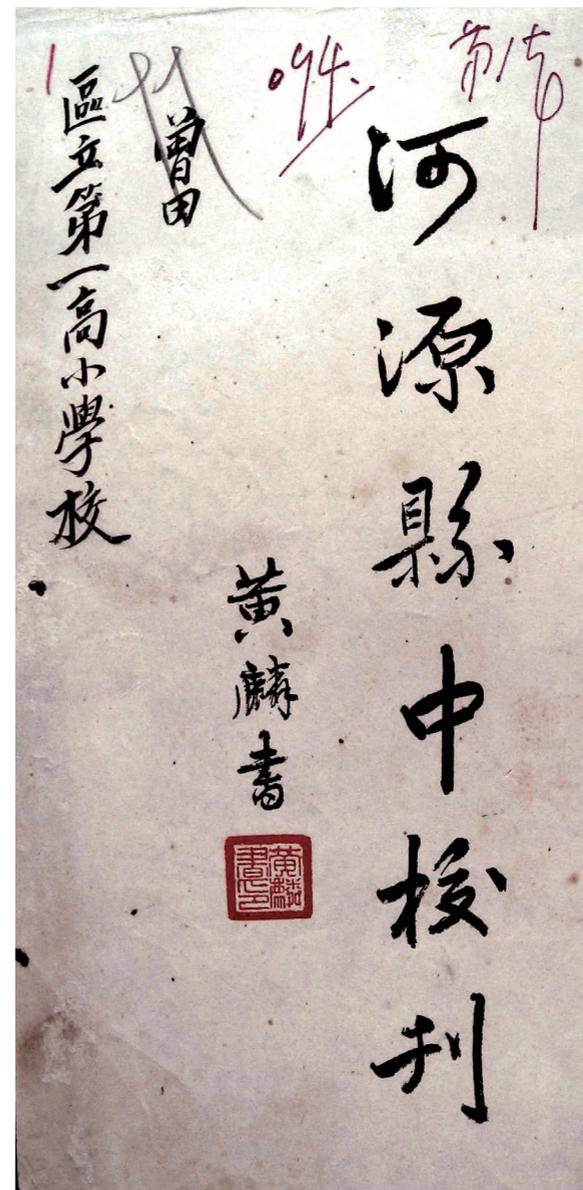
1935年，一份河源县立中学的转学证明（该生年龄17岁），则显示中学要学的科目有：公民、童军、卫生、国文、英语、数学、博物、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劳作、图画、音乐等。

黄麟书认为，对学生的培养，还要注重精神气质的训练，使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民族观、国家观、世界观，形成合理的为人处世态度；要注重学生体格的训练，使学生体魄坚强，能自卫并卫国，培养公勇合作的精神；要进行科学训练、生产劳动训练、特殊教学及后

方服务训练，让学生具备从事后方服务及协助军事推进的能力。

创设师范学校，提升师资水平

学生素养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与老师



黄麟书题：“河源县中校刊”

教学水平有关。

黄麟书任省教育厅厅长期间，将师范学校和师资培养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全省分为10个学区，每个学区均设有省立初高中，并至少设立中学一所、省立师范一所。

1935年秋，老隆师范（今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开学。老隆师范是由原龙川县立简易师范改造建立的，由省库拨给开办费1万元，临时设备费3万元，每月拨给经费1000元。1937年，位于老隆的学校新大楼建成。

为加强与培养全省教育师资，黄麟书先后创办省立江村师范、长沙师范（开平县）、老隆师范（龙川县）、梅州女子师范，改高州女子师范、雷州师范、钦州师范为省立师范学校，并重建广州女子师范学校。1946年，黄麟书又参与创办私立广州珠海中学兼任董事长。1947年，与林翼中等人创办了广州私立珠海大学（1949年迁香港，今香港珠海学院），成为继广东私立国民大学、广州大学、中华文化学院后广东第四所私立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对师范生有补贴，本省师范学生向来免除学杂费，还补助伙食费，每生发给6元，后因物价上涨，改发9元，以资鼓励。“有了这样优厚的待遇，毕业后自应照章服务。”黄麟书勉励说。

1940年，广东举办国民教育师资短期训练班，河源、龙川等也开办了训练班。

在查阅源城民国档案时，不时会发现黄麟书署名的文件。黄麟书还经常到全省各地去视察教育，为当地学校解决困难。

创办职业教育，培养实用型人才

社会的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除保证一部分优秀学子继续在高等学府深造外，

还需培养专业顶尖人才。黄麟书很重视发展专科和职业教育，以培养当时社会急需的实用型、技术型、应用型人才，例如熟练工人、工程师等。

在黄麟书的主持下，广东全省开设职业学校。1934年，广东省教育厅开始“调查各地职业状况，决定应办何种职业教育，应办何种职业学校并设法培养何种职业师资。限制现有的职业学校不得改办中学。高等职业学校由教育厅分区筹设”。

1935年，黄麟书在省教育厅施政报告中提到，这年，创设了汕头水产职业学校，先办渔捞科；另一所是郁云联立初级农业学校，有林场2000余亩。

在职业教育方面，有省教育厅直接兴办的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农业学校和第一职业学校。

在任期间，黄麟书先后创办了广东省立体育专科、海事专科、肇庆工专、喜泉农职、英德北江农专、兴宁工职、大埔高陂瓷职等各类专科、职业学校，并改办汕头商船、汕尾水产等职业、专科学校，涉及工业、农业、海事、商船、水产、陶瓷、体育等领域。他还办私立仲恺农职、执信中学、仲元中学改为广东省立学校，创办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

1935—1936年，黄麟书主持了3次留学生考试，录取了西洋（英美德荷加）、东洋（日本）留学公费专门生各10名，学习纺织、兵器制造、飞机制造、造船、水利、渔业等知识。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大多在国立大学任教授或任职于工业机构。

1933年冬，黄麟书创办香港德明中学；1954年冬，黄麟书在台北创办台北明德中学，任董事长，后任德明书院（学院）院长3年；

1947年秋创办广州珠海大学，为创办人之一，以董事兼校长20年；兼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南方商业专科学校校长各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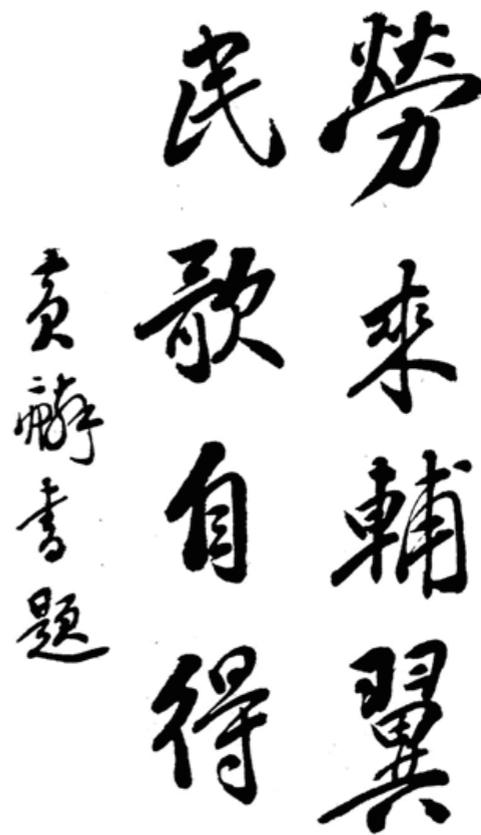
“尚学问，有著述”

1935—1949年，黄麟书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监察委员及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会委员、教育委员会委员、考试委员会委员等职。

1944年1月，国民政府以“著有勋劳”授予黄麟书五等景星勋章。1945年11月，国民政府又以其在抗战期间的著有勋绩，特为其颁发胜利勋章。1949年3月，他奉聘为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旅居香港，创办“香港孙中山纪念图书馆”并出任董事长；1951年，任香港中国文化协会主席。

黄麟书百岁高龄时，回忆百年人生，认为自己“尚学问，有著述”。他曾任香港中国文化协会主席、主任委员20年以上；创办香港孙中山纪念图书馆，为董事长10年；树立“故秦南海尉任君墓碑”；著有《孙中山先生人口论说明》《秦皇长城考》《唐代诗人塞防思想》《宋代边塞诗钞》《明代广东六边才合谱》《家学录》《边塞研究》《边塞研究续集》《松园文存》《橛园杂著》《白马书屋存稿》等著作。

黄麟书毕生不辍研究中国边塞长城。1959年，67岁的他出版了《秦皇长城考》，1972年修正稿出版，1991年第三版出版。



黄麟书的书法作品

台湾学者章群的《黄著〈秦皇长城考〉评介》一文说，该著一是正前人之误者三十，发古书书例者一；二是于古地名及沿革，多所考证；三是以长城兴废或郡县建省，系尔时史事，补缺存佚，可谓以地系事。“盖发覆钩沉，功夫极细密。前贤所未决者，自兹成定论。”

与此同时，黄麟书还长期担任香港客家社团组织——香港崇正总会会长，积极鼓励客家乡亲回乡投资兴办企业，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97年12月，黄麟书病逝于香港，享年105岁。✎

谋国之忠不居人后

——记和平籍著名爱国人士徐傅霖

文◎周 焕

清朝时，河源和平下车出了个“一门三进士”的徐氏家族，这个家族有个叫徐傅霖的人，在民国时期大放异彩：早年留学日本，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拒绝袁世凯的收买，办报反袁，被通缉后亡命日本；因反对孙中山改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退出中华革命党；因曾在旧桂系军阀把持的广东护法军政府任职，一度被孙中山判处无期徒刑。

被袁世凯悬红20万元的河源人

徐傅霖的父亲名徐鸣珂（玉堂公），母亲是和平的颍川陈氏健庵公之季女。徐傅霖在5个兄弟姐妹中排行居末，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3岁丧父，时年仅29岁的母亲艰辛地将几个儿女抚育成人。下车徐氏系耕读世家，藏书极富，加上有名师指点，徐傅霖博览群书，学问日增。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徐傅霖18虚岁，补廪生、拔贡，入读惠州丰湖书院。不久，在陈竹溪、陈襄廷等邑人资助下，他人读京师法政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粤。时广东咨议局选举议员，徐傅霖获选，主张严禁烟赌。

在日本留学期间，孙中山曾几次造访徐傅霖。同盟会成立后，徐傅霖即加入。辛亥革命组建军政府后，孙中山自欧美返国，徐

傅霖被选为粤省代表，与17省代表集于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肇建，改用公历。

此后，徐傅霖辅佐孙中山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1912年，广东临时议会推选徐傅霖、杨永泰、司徒颖、卢信四人为国会临时参议员赴南京开会，故徐傅霖得以参加中华民国开国大典，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清帝退位，袁世凯继任大总统，迁都北



徐傅霖（摄于1910年）

京，国会设参、众两院，徐傅霖被选为众议员，并辅助孙中山策动国民党员竞选众、参两院议员，国民党籍者都当选。1913年，第一次国会在北京召开，徐傅霖再次当选众议员，对北京袁世凯政府“善后大借款”，极力反对。

袁世凯的气焰越发高涨，恶行日著，徐傅霖对此非常厌恶，便离开北京，南下上海，集资创办《中华新报》，他公开反对帝制，拥护共和，以笔为刀，刺向袁世凯。袁世凯悬红20万元通缉徐傅霖，徐傅霖因此亡命日本，益加反对帝制。

反对更改五色旗，退出中华革命党

在日本避祸期间，年轻的徐傅霖没有生活来源，遂以“庄周”“梦蝶”为笔名，翻译外国著作售予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以此谋生。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令党员盖指纹，徐傅霖颇不以为然；又改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徐傅霖认为五色代表五族，象征共和，不宜更改，一再力争，但孙中山坚持己见。力争不获，徐傅霖遂与黄兴、张耀曾等退出中华革命党。

1915年，妄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唆使党羽，试图罗致徐傅霖入幕。梁士诒派人带袁世凯的信函和现金20万元，到日本游说徐傅霖，徐傅霖严词斥之。袁世凯恼羞成怒，知徐事母至孝，竟暗中指使其爪牙逮捕其在和平县乡间的眷属，幸赖胡汉民多方设法维护，家人才得以幸免于难。

袁世凯一命呜呼后，黎元洪依法以

副座“入继大统”，恢复国会，徐傅霖得以回国，仍为众议院议员，以功授二等大绶嘉禾勋章，其兄雨三公亦以功授三等大绶嘉禾勋章。

在黎元洪出任总统的事情上，徐傅霖“依法”有所表态，与张继等组织“宪法商榷会”，反驳北京段祺瑞政府所依之袁世凯所定《中华民国约法》《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反对他们要黎元洪“代行”而非“接任”总统之职的做法。

“劝进”积极分子龙济光被袁世凯授“一等伯”之爵，督粤3年，“与民为仇，苛税万端，秕政百出”，且纵兵“杀人为乐”，“死刑之条，择肥而定”，致粤民“动足投陷阱，举手触网罗，不知命在何时，相将坐以待尽”。徐傅霖带着一批粤籍国会议员，向北京黎元洪大总统、段祺瑞副总统发去电文，请求速罢龙济光之职，称“大总统纵推爱济光，与其视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1916年9月底，徐傅霖以众议员的身份，与邹鲁等相继弹劾有复辟图谋的张勋。

1917年，徐傅霖在北京与张耀曾（曾担任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发起组织政治学会，世人称为政学系，入会者多一时名宿，后成国民党内三大派系之一。

名记者张季鸾誉其“清操可佩”

1918年，护法事起（即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所护之法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徐傅霖响应孙中山号召，与国会议员集体南下，云集广州，成立南方护法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

元帅。岑春煊排挤孙中山，任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把持广东军政，徐傅霖与后来成为蒋介石首席智囊的杨永泰，是京师法政学堂的同学，向来和桂系有交往，杨永泰以粤财政厅厅长升任省长，徐傅霖以粤高等审判厅厅长升任司法部长兼代大理院院长。徐傅霖任职3年，声誉隆著，乃至有“徐青天”之美誉。

在徐傅霖任职期间，中国的现代司法改革才刚刚开始，徐傅霖整顿法治，争取司法独立，制定司法规范，对桂系军阀所犯罪行，亦执法不阿。

1920年，陈炯明率粤军援闽，得志。徐傅霖与陈炯明有旧，昔年曾同在丰湖书院求学，故粤闽发生纠纷时，他奔走调解。粤军回师驱逐桂系军阀后，军政府瓦解，徐傅霖去职，但仍留在广州。亲友们劝徐傅霖赶紧

出去躲躲，毕竟他在桂系任了司法部部长等职。但徐傅霖认为自己出于公心，并没有做不当的事，不肯随其他人迁往港澳。

孙中山认为徐傅霖“助桂为逆”，以“内乱罪”判处他无期徒刑，此事惊动舆论，激起公愤。国民党诸显要以及广州七十二行商会都向孙中山申诉，同时，得陈炯明、邓铿等居中调解，徐傅霖被特赦出狱。

1923年10月，曹锟为取代黎元洪，准备通过贿选坐上总统宝座。向来清刚耿介的徐傅霖，与沈钧儒等拒贿议员在上海《中华新报》公开发表宣言，反对贿选。名记者张季鸾为文誉其为“清操可佩”。

返京后，1923—1926年，徐傅霖在北京为众议院议员，得暇便着手著述。其间，不少军阀大佬前来招募他人其麾下，包括段祺瑞、冯玉祥、吴佩孚、张作霖等，以高等顾问之职相招，徐傅霖均不赴，最终完成了《天坛宪法》。

1927年夏，北伐胜利，北洋政府瓦解，国民党实行“训政”。徐傅霖始终认为一党治国与天下为公之旨不合，潜不出仕。不久，他与张君勱等筹组国家社会党。这年，徐傅霖数度婉辞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的襄政邀请，南归省亲，

编订族谱，筹资兴学。

处江湖之远，尽老成谋国之忠

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寇侵华日急，国家外患重重，徐傅霖即南下抵沪，住在威海卫路中社与当时在野的名流筹商政府御侮大计，大家公推他起草建议给当时的中央政府，并同许将共赴国难。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居于上海的徐傅霖虽是一介书生，却不顾个人安危，在战事中奔走尽力。他与温宗尧等人协助政府，飞乌挽粟，救死扶伤，设民间勤务于广肇公济会，配合冯玉祥等人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十九路军保家卫国。此战，鏖兵33天，日寇目的终未得逞。停战后，徐傅霖与温宗尧、熊希龄、诸辅成、彭允彝等，共组国难救济会，编印国难救济半月刊。

1933年，陈炯明病逝于香港，身后萧条，徐傅霖特地为陈炯明发起募捐，使之归葬惠州西湖丰山。

1934年，张君勱邀请徐傅霖等参与组建国家社会党，同年10月，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徐傅霖任副主席，主办《国家社会报》，兼任社长。

徐傅霖从事司法工作期间，因风骨峻嶒，耿介刚直，推问缜密，判事审慎，克己崇法，人皆悦服，有“包拯”“海瑞”之称，因此，几任掌粤长官到任后，都邀请他出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及其他职务，但他都不愿出仕。

1934年和1935年，徐傅霖在广州与张君勱、张东荪、陈玉崑创办学海书院。其时，陈济棠主粤，曾一再商请徐傅霖

出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未就。此后仍坚持请他出任高等法院院长、高等顾问等职。

拒当伪粤省长，困居星岛阁楼四载

1938年，抗战军兴，当时的各民主党派一致团结对外，时国民政府设国民参政会，徐傅霖被推为第一届参政员，带着儿子徐炳堃，由穗乘粤汉火车赴汉口出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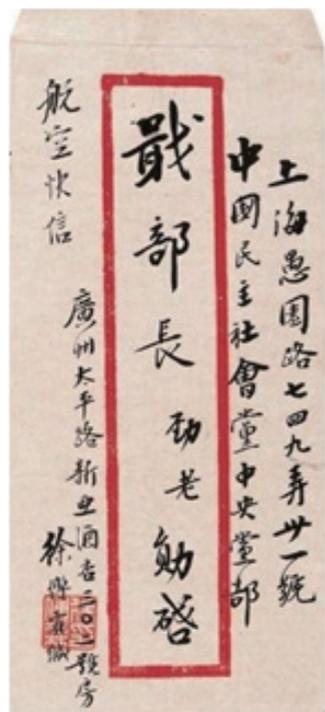
1938年10月，日寇从大亚湾登陆，惠城、广州相继沦陷，徐傅霖避居澳门，到处走访，并撰文呼吁海外侨胞协助政府长期抗战。他在香港发动惠属同乡会劝募救济，与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领导的“南洋筹赈会”、黄伯才领导的“南洋惠属救乡委员会”联系，得到积极响应，募捐得到大批款项和物资救济难民，并派出代表团返乡调查。

1939年，徐傅霖到香港创办《国家社会报》。是年，徐傅霖胞兄雨三公逝世，因抗战大业所系，他未能前往奔丧，只能天涯洒涕以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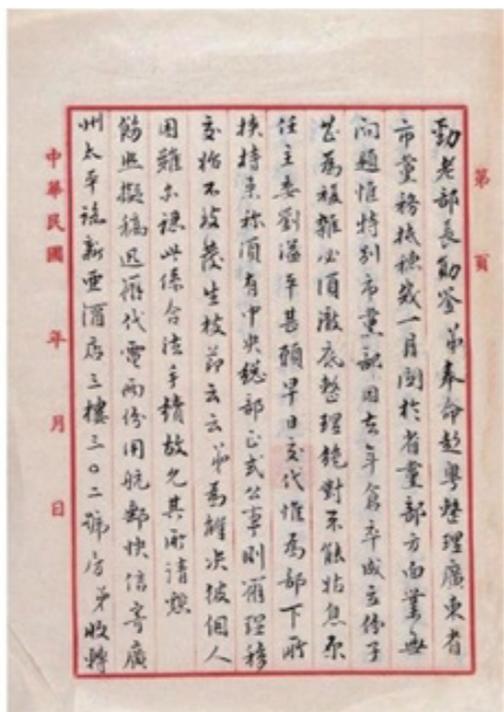
1940年2月，日本人神田正雄拿着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信函，婉请徐傅霖出任汪伪政府广东省省长，并以扇面求徐傅霖题字。徐傅霖作色曰：“余手无寸铁，日本何须借重？”神田曰：“君名满中国，可谓领袖人物。”徐笑答：“余以抗日著名，能降日乎？”神田惭退。翌日，徐傅霖书两绝于扇面：

东邻有女久窥臣，道是徐公美果真。愿与结成秦晋好，自伤髭发白如银。

老夫少妇本非宜，况我糟糠尚有妻。



徐傅霖信札



见说外黄多赘婿，长为奴役不能辞。

过了几天，神田复访徐傅霖寓所，见了崩面，满脸通红而出。当时香港有不少报纸报道了此事，有标题曰：“城北徐公，大义凛然。”

1940年11月，徐傅霖由香港乘轮船至新加坡，呼吁当地侨胞参军助饷，应者云集。不料，形势急转直下，不到一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日军得其政府训令，知徐傅霖正在星岛，搜捕甚急。幸得当地华侨领袖全力掩护，他才得以脱险，此后一直困居狭窄的阁楼之中，足不下楼四载有余，形同坐牢，93岁的老母亲寿终于和平乡间时，他也不能回乡奔丧。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徐傅霖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并在英国政府帮助下，搭乘英国军用机，与英国高级军官及外籍新闻记者多名结伴离星，飞吉隆坡、槟榔屿、棉兰、巨港、椰加达、万隆、泗水、帝汶，再飞回新德里、加尔各答、曼谷、百囊奔、西贡、河内、海防到达香港，再由港飞渝。得到徐傅霖平安归国的消息，国民政府慰问备至，国家社会党留渝同仁亦联欢祝贺。不久，徐傅霖再由渝飞沪处理事务，12月赴港。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家社会党与伍宪子等所主持之中国民主宪政党合并，改称中国民主社会党，徐傅霖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1947年，徐傅霖出任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国民政府委员、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8月，由南京赴沪，出席中国民主社会党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仍膺选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是年，国民政府

授勋，徐傅霖获一等云麾勋章。

1949年春，徐傅霖被聘为广东省政府高等顾问。10月，广州解放，徐傅霖迁居香港。

1958年1月12日，徐傅霖病逝于台北，享年80岁。

徐傅霖的桑梓情

徐傅霖长年在外，对家乡念念在兹。他于1916—1919年，在广州与惠州同乡贤达合力建成惠州会馆（时和平、河源、龙川等地俱为惠州十属之一）。会馆建筑雄伟，门前有八根石柱，横额“惠州会馆”金字招牌很是引人注目。但1921年起，此处长期成为驻军之地。

徐傅霖在北平居住最久，平时有空，经常驱车到位于北平城南草厂七条胡同的惠州会馆访问，与同乡话旧。逢年过节尤其是农历新年时，他必一早就到会馆参加团拜。1935年和1936年，徐傅霖曾与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主任秘书的苏理平（惠州人）筹建上海市惠州同乡会，可惜不久抗战全面爆发，未能成立；后来，又在重庆、南京欲筹建惠州同乡会，因抗战、内战诸因不克有成。1949年流寓台湾后，徐傅霖与河源曾西盛、李悦义、潘衍兴，龙川黄麟书及潘克、周昭琼等同乡，同心合力建立了台北市惠州同乡会。

徐傅霖夫人何桂珍，是邑庠生何章生长女，和平下车镇杨梅塘村人。晚岁礼佛，乐善好施。养子炳荣早故，生子炳堃随侍在侧，是日本东京商科大学研究生，曾任台湾“行政院”经济专员；女儿添兰，幼年立志终身不嫁，随侍母亲居乡礼佛；有孙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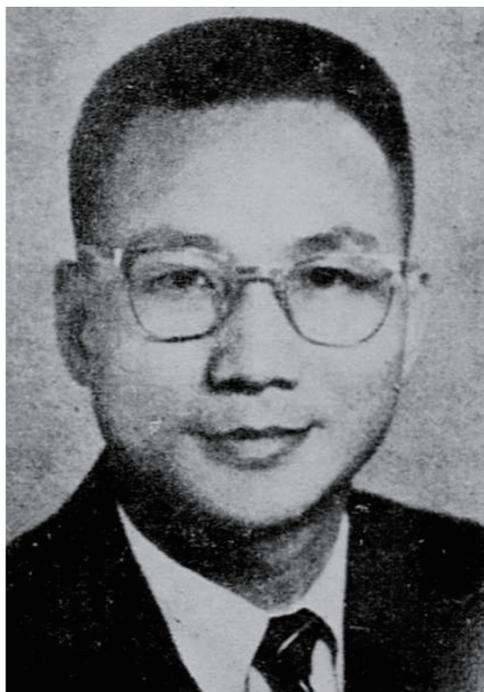
徐傅霖著有《中国法制史》《刑事诉讼法》《梦岩诗文集》。

黄石华：全球客家精神领袖

文◎周 煊

少年艰辛图奋强

1919年，黄石华出生于河源龙川县黄布镇金鱼村。龙川金鱼乡黄氏家族出过不少风云人物，黄石华的祖父黄昌瑚曾参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他的父亲黄文是国民党上校军官，参加过北伐，一直戎马倥偬，极少回乡。1922年，黄石华3岁时，父亲病逝，归葬龙川。黄石华的族兄黄麟书，是中国著名教育家、广东现代教育奠基人。



黄石华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和家族中，黄石华从小深受熏陶，刻苦读书。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经济拮据，他的哥哥不得不辍学，黄石华却坚持要读书，中学时经常撰文发表，以获取一些稿费以资学业。他在当时著名的全国性刊物《中学生》《东方》《生活周刊》发表文章。他还曾给主持《生活周刊》的邹韬奋写过信，讲述自己的贫穷和艰难，希望得到邹韬奋的鼓励。邹韬奋很快给他回信，鼓励他坚持写作，日后定必有所作为。

黄石华常以一句座右铭“常思家国兴亡责，莫负艰难百战身”自勉。因为家里穷，黄石华没少受经济条件比他好的少年欺侮，他有一次气不过，提刀要与他们拼命，是年迈的祖父阻止了他，告诉他，硬气不是用在与人争强斗狠上的，而要用在为国家作贡献上来。从此，他便志存高远，决心做出一番事业来。

黄石华19岁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追随乡贤张鹤文、张克明等从事抗战救亡活动，成立金鱼乡抗日救国会，黄石华任会长。

1937年，黄石华高中毕业，毕业会考成绩为全省第三；1938年，他去重庆报考中央政治大学，为了读书，他趴在载满货物的运货车顶端，熬到重庆，并以全国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进了免费的中央政治大学，攻读地政专业。从这年起，

他便离开家乡远去外地。

在黄石华20岁到30岁这段大好年华中，他非常努力和上进：24岁任中央部会科长，草拟中央扶植自耕农条例，指导重庆北碚扶植自耕农实验区；25岁任甘肃省地政局科长，主持完成甘肃湟惠渠扶植自耕农实验区；26岁在粤创办申原棉织厂、民生职业学校、西华中学；29岁当选国民大会代表。

加入崇正总会

1949年，30岁的黄石华赴港定居。初到香港，黄石华便应聘到《星岛日报》当记者。在香港，黄石华加入了香港最有名的客家人社团——香港崇正总会。崇正总会成立于1920年9月29日，原名旅港崇正工商总会，1926年正式改名为“崇正总会”，崇正总会不仅是全香港客家人士团结之象征，因地理环境使然，亦是全世界客家人士之联络中心，在美国、英国、荷兰、古巴、澳大利亚、日本、越南等国设有分会。在崇正总会，黄石华遇到了很多当时的社会名流，包括崇正总会的创办人之一、南洋巨商胡文虎，抗日名将张发奎、薛岳，以及黄石华过去担任“国大”代表时的一些同仁。

在崇正总会，黄石华做起事来特别卖力和投入，他的能力慢慢展现出来，香港崇正总会会长张发奎决定重用、提拔他。1968年，黄石华出任香港崇正总会理事长，全力投入建成12层崇正大厦的工作。

崇正总会会址，早期是租赁永乐西街146号三楼为会所，因不敷应用，于1922年4月改租德辅道中250号至252号四楼为会所。1928年，在跑马地摩利臣山道48号至68号地段投建崇正会馆，1930年1月5日落成。自

会馆落成后，崇正总会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创立数间义学。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香港地狭人多，市区多为高层建筑。1967年，崇正总会决议将崇正会馆改建为崇正大厦。1968年，黄石华被公推为该会第22届理事长，牵头崇正大厦的建设。黄石华夫妇慷慨出资280万港元并举办募款活动。经历种种风波与困难，崇正大厦终于在1971年被崇正总会接收。这是黄石华努力的一个成果。

1998年，黄石华发起成立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致力于兴学育才、捐资助学。他还担任崇正总会永远会长兼理事长及崇正中小学校监督十余年，任内完成崇正大厦及中小学建校工作。

除了崇正总会的工作，黄石华还创办公司，他是一位热心社会公益的大实业家，做了大量实事、好事，忠爱国家民族，在香港名重一时。根据有关资料，黄石华在港曾担任多个工商机构福利社团名誉会长、会长等职：先后曾任《星岛日报》编辑，《商业日报》副总经理兼采访主任，《自由报》督印人，安生堂药厂暨置业公司负责人，集成图书公司董事执行经理，大华出版有限公司董事执行经理，华特出版香港公司总经理，华英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世华联合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治强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保良局总理，中华厂商联合会常务会董兼宣传部副部长、部长，香港制药总商会监督，九龙总商会常务理事兼海外联络部主任，中国国术体育总会永远会长，新兴国术会会长，孙中山纪念会会长，中山医院赞助人，香港华侨总会会长，香港社团首长会议总会会长，香港中区、李郑屋村等三十五区街坊会会长，龙川同乡会创办人兼会长、理事长，国立政

治大学香港校友会创办人、理事长、副会长。

厘清“客从何处来”，支持客家研究

香港崇正总会有个重要的工作是考证源流，非常重视客家和客家人的学术研究，曾邀请诸如罗香林这样的著名学者入会开展研究。其初期工作，以编纂同人系谱为最艰巨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盖系谱所以辨析本系迁徙源流与学术道艺，及衣冠文物，所以崇正先报本，团结同人，发扬志业，启示将来，关系之巨，全系人士所共喻也。”因此，“自创议筹设总会以至总会分部工作，皆以考证源流为要端”。“编纂同人系谱，其最切要者，在于源流一门，以能追索我同人世系源流，即可共悉我同声者，为神明华胄。”

黄石华亦是学人出身，对客家的历史、源流也作了比较深刻的研究。他指出：“对客家民系，应该运用科学方法和观点，对中华民族客家族群的历史、源流、组织、现状和未来发展规律，及社会、经济、语言、文字、民俗、文化以及族群心理、感情、意识的发生演变作系统的研究，指出这族群发展的规律，并以科学方法预测其未来趋势。同时，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角度，作全面的、多方位的客家族群与整个汉民族及中华大传统的关系研究，分析客家人族群性在人类文化学上的意义，进而以科学论证客家族群对中华民族与世界人类所作的贡献与影响。”

黄石华认为，客家学是近年来的新生事物。客家学应该是以民族学理论为基础、融汇众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的学科，与民族学相比，客家学具有更多独有的特征，是内容更丰富的学科。他强调：“为建立客家学，必须作整体有计划性的资料搜集。这是建立客家学最起的工作。”因此，他倡导成立国际客家学研究基金会。

黄石华还成立相关机构来推进客家学研究，先是成立崇正之友会，1992年又成立香港创建学会和国际客家学会。他力促两岸和平发展与统一，1992年7月，他联合台湾同仁在台北召开第一届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大会，以后各届均没落下。1996年，受邀第一次率领香港崇正总会代表团到北京访问，回港后又立即组团访台，传达有关信息。1997年12月，香港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成立，1998年9月又成立了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

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几乎不参加任何组织的活动，但他却在1992年接受黄石华的邀请，联合港台两地诸如严耕望、全汉升、金耀基、张希哲、梅可望等知名学者，发起创立香港创建学会，其宗旨和任务就是为两岸和平发展建言献策。

1998年9月27日，“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成立，黄石华出任总执行长。该会自成立以来，已分别在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香港、深圳等国家和地区轮流召开全球客家社团领袖、会员大会，通过全球客家人集思广益，对促进彼此交流，加深彼此了解，并在推动全



黄石华塑像

球客家学研究和发扬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影响力甚广。

“世客会”创始人

1971年，崇正总会成立50周年之际，崇正大厦建成投入使用。黄石华想起崇正总会的宗旨中有“联络海内外客属人士”一条，于是向会长张发奎提出，可利用这个时机，举办一次客属恳亲大会。

提议被通过之后，黄石华夫妇不辞劳苦自费前往东南亚诸国和日本、美国、加拿大等，与当地客家华社领袖联系，邀请当地客属团体参会。在他的努力下，一共有4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属团体代表参加这次大会。

“世界客属第一次恳亲大会”就这样在香港成功举办了。这是第一次把这样多的客家人会聚在一起。在那之后，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客家人联合起来，在黄石华的鼓励下，挂

牌成立自己的客属团体。这为往后在全球各地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奠定基础，渐渐地成为全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社团联谊和交流活动。

2010年，第23届世客会在河源举办，参加该届世客会的客属社团184个，客属代表和特邀嘉宾共约6000人，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15个省（区、市）。一大批客家知名人士、

教育文化科技界精英、客家文化研究专家、实力雄厚的企业家参会；大会规格之高、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均创历届世客会之最。

已逾90岁高龄的黄石华返乡参会。他欣慰地说：“河源这一届世客会非常成功，得益于河源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全市人民的支持。这是河源人的骄傲。每一届世客会，都有进步。但想不到河源承办的世客会为客家历史、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黄石华一直致力于团结全球客家族群，经常奔走于港澳台、东南亚和全球有客家人的地区，访问相关国家和地区政治界、商业界和民间客家领袖。他不遗余力地支持有利于祖国发展的事业，加强两岸互信沟通，推广客家学研究等。

2007年，在马来西亚沙巴亚庇客联大会千人大会上，黄石华获颁“全球客家精神领袖”荣誉。^[1]

忆银梅初级中学的创立

文◎谢任民

我的故乡河源市连平县陂头镇，乃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镇。陂头镇位于粤东，与粤北接壤，是东江与北江分水的地方。那里的亲人乡邻，那里的山水田园，50多年来，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闪现、萦绕。如果不是身在太平洋彼岸加拿大多伦多，天长路远，相隔万里；如果不是因为我年过八十，腿脚不便，我是要回家乡认认真真走一走，仔仔细细看一看的。

我的儿子振汉在加拿大新时代电视台做主播兼监制。2004年3月，他带“枫叶寻根旅行团”回祖国大陆，录制“枫叶寻根”专题片，趁机叫两个在加拿大出生，从未回过故乡的孙子统华、统豪参团。让他们回去代表祖父祖母，看望问候家乡的亲人乡邻。我还特别嘱咐儿子，要他去我曾参与创办并教过书的银梅初级中学，多拍些照片回来，让我看看，以释乡思，以慰乡情。

振汉回来，把在银梅初级中学拍的录像放给我和太太看。银梅初级中学已改名为陂头中学。50多年前的旧容貌几乎看不到了。后来建

的教室、宿舍、图书馆、电脑室、实验室、办公楼，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学生1100多人，教职工70多人。规模大多了，校园扩大了，也漂亮多了。乡中子弟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学校，太令人高兴了！

乡中的亲邻知道我曾参与银梅初级中学的创建工作，多次要我回忆创建的经过，因为现在知道那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作为参与创建的其中一员，有责任说一说那段历史。

1944年夏天，我在位于广东战时省会韶关黄田坝上饶的广州大学读书。那时，德国、意大利在盟军打击下，连连惨败。日本法西斯在亚洲却仍作垂死挣



陂头中学航拍（王春雨/摄）

扎，力图打通粤汉线，控制华中，进一步侵占全中国。韶关市民纷纷疏散，学生逃亡。我跟随疏散逃亡人流，经大塘、青化、坝子，步行四日，回到老家。在外头做事或读书的同乡也陆续回到老家避难。

慧中叔公、君豪叔、煜椿叔他们先后回到老家。我们这几个人，年龄相仿，志趣也较相投，文化教育程度相近，共同话题较多。有一次，谈到乡中子弟读中学的困难。那时，陂头只有一所设有五六年级的高级小学。校址在街中保生堂药材店和俊源布店附近。这所高级小学是由三间铺位改建而成的，属于民间组织的产业。从前科举时代，有宾兴、文会、印金三个教育基金性质的民间组织。共所资产，皆由谢姓族人捐献，专门用来帮助和奖励族中文人投考秀才举人。科举制度废除后，三个组织的资产全部作为开办陂头高级小学的费用。众人推选光庭伯为校董会主席。光庭伯去世后，经过改选，由我父亲立庭继任。校董会聘连平县城有名的才子江任之任校长。江任之走后，聘请族人文凤接替。陂头小学的毕业生只有几十人，毕业之后能继续升学读初中的就更少了，真可谓凤毛麟角。20世纪30年代，与我一同到连平县城读中学的，寥寥可数，先后不过数十人。

陂头子弟要读初中，只能去县城入读连平中学，或者下翁源，入读南浦中学、三华中学。去县城要走六七十里路，下南浦也有30里路。路远，交通不便，无车可乘，非寄宿不可，而寄宿学校开销大，一学期，至省至俭，也要500稻谷。这对很多农家来说，是不堪重负的，不少农家连为寄宿学校孩子置备一床棉被毡被、一顶蚊帐、一张草席这样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也无能为力。只能“望

校兴叹”，回家耕田种地了。

家乡不办中学，乡人文化教育程度提升不了，出不了人才，乡人生活改善不了，乡村落后，发展不起来，如此恶性循环。

我们亲身体会到民贫国弱、内乱外侮的痛苦，也深知乡中父老对于开办中学的渴望，越是议论，心气越高，越觉得开办中学，解决乡中子弟读书的困难，为子孙后代做件好事，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中学非办不可！

空谈是办不成中学的，须要切实做事。我们郑重其事地开起会来。办中学顺民意合民心，可谓水到渠成。全陂头老百姓没有不赞成的。慧中叔公当时是县政府驻陂头指导员。撤销区公所以后，县指导员奉县政府直接委派，具体指导陂头东乡、西乡和贵东乡工作。慧中叔公手上有点权力，可以提出一些筹款举措。县政府的县长邓飞鹏是静生叔公的好友，也支持创建中学的工作。迴澜庙打醮，在庙旁搞了个“四点金”屋基，正适合做学校。宾光、文会、印金三个组织还有些资产，可移过来作中学基金。这么一说，万事俱备，大家信心十足，认为中学是可以建起来的。

陂头，旧名连平银梅区。银梅这名字，高贵、文雅，大家一致同意，校名就叫银梅初级中学。

为加速筹建工作，我们成立了教育促进会。会址在原区公所侧的当铺旧址，命名为“梅园”。乡人推举慧中叔公、仲平叔和我三人负责筹备工作。慧中叔公有地位、有魄力，热心乡中公益事业，精力充沛，办事干脆爽快。另外，他的胞兄静生叔公德高望重，在家乡影响很大，可谓一呼百应。仲平叔，八合楼人，家庭殷实富裕，是东乡大户。仲平叔较会理财，办具体事比我们有经验。至于

我，家在西乡永兴围，围大屋大，人口多。我父亲是陂头小学校董会主席，乡人会给我们一点面子，办事会更顺利。既得乡中父老信任，我们三个人就干了起来。没有工薪，吃自家的饭，做众人的事。慧中叔公负责筹划、决策；仲平叔负责财务；我负责规划安排，上下联系，左右协调，具体部署。

筹集经费，是建校中至为重要也是至为困难的事。根据建校规模预算，至少要1500担谷子。所有工程、材料全由陈鸿承包。经费来源：

一、把陂头小学基金全部转作银梅初级中学基金。

二、1945年东乡、西乡地税，加收两成。此举得乡人同意。只此一举，一年加收稻谷刚好够建校开支。

三、发售谷券。当时通货膨胀，钞票迅速贬值。我们发行了200担谷券。谷券分1斤、2斤、5斤、10斤、20斤5种。谷券可在陂头境内流通，按市价购置商品。满50斤，可以兑换稻谷。民众一时称便。此事，由我和方梯、锦魁三人负责管理。

四、出售彩票。人们都有以小搏大、经少搏多的心理。教育促进会出售彩票。卖完彩票后，择街日在区公所门口当众开奖，兑现奖金，由此又赚到一部分建校资金。

五、以宿舍冠名权，发动各房各族和富家大户认捐。谁认捐30担谷以上，就在学生宿舍门框上嵌一横麻石，刻上“某某宿舍”以作永久纪念，如“云崖公宿舍”“东池公宿舍”“仲平宿舍”。两侧十几二十间学生平房宿舍冠名，所得稻谷有五六百担。

六、因陋就简，利用迴澜庙空房做厨房和师生饭堂，节约开支。

1945年春，建校工作开始，要求当年建成，第二年春投入使用。那年夏天，省里委任慧中叔公为连平县三民主义青年团主任，他到县城公干。他原来担任的驻陂头指导员一职，县里委任我接替。我和仲平叔继续开展筹建工作。仲平叔负责建校事宜，我把重点放在当年秋季的开学准备工作，其中，聘请校长、教师迫在眉睫。其时，翁源文士李心钧正在南浦中学做校长。此人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英文皆了得，为人正派，治校有方，师德颇佳，在师生中极有威望。乡人皆有意请他。我与他早年曾在第五政治大队共同从事抗日工作，彼此了解，关系融洽，感情甚笃。我和他接洽，诚邀他到银梅初级中学执教，主持学校工作。他在陂头有很多亲戚，向来与陂头有亲缘友谊。他本人也有意转换环境，专心培育英才。所以，他欣然接受聘请。后又聘请刘启能、李衡阳等几位翁源籍教师来校执教，还接纳君豪叔介绍的吕健生，聘他当教导主任。后来我们才知



银梅初级中学门楼原貌



1946年冬至1947年初，书法家于右任题写校名：连平县私立银梅初级中学

道，吕健生是中共地下党员。

1945年秋，银梅初级中学开始招收初一、初二两个班学生。新校未建好，暂在崖公祠上课。有八九十名学生，其中有二三十人是从翁源来的。1946年春，师生搬入新校上课。1946年秋，就有初一、初二、初三3个年级了。

1946年冬至1947年初，静生叔公通过屈武请了鼎鼎有名的大书法家于右任题写校名：连平县私立银梅初级中学。于书风流潇洒，从容大气，竖行，刻于木板上，蓝底，白字。校牌悬挂于校门旁柱上。小小的乡间中学有了于老先生题写的校牌，顿时增光不少。

银梅中学建成，陂头没有中学的历史从此结束了。1947年夏天，翁源县急需李心钧

校长回去出任县参议长。他辞去校长职务，推荐龙仙石子下人刘发能接替。刘校长治校也颇有手段，敬业精神又佳，亦深孚众望。他力邀我到校协助，我也乐于为家乡教育略尽绵薄之力，于是到校上课，做专职老师。

当时，我的岳母在澳门经商，多次要求我们去澳门。1949年秋，岳母又频频催促我前往协助经商，且不许推辞、不许拖延。无奈之下我只好将银梅初级中学的一切事宜转交方梯兄负责处理，携妻带子去了澳门。

眨眼间，五六十年过去了。往事如烟如烟，历史又似山似铁。

银梅初级中学校园里那几株我亲手栽种的梅花，如今，枝干更老壮了吧？开得更茂盛了吧？花香更远溢了吧？

美丽侨乡黄塘镇

文◎利东（《河源乡情报》记者）

黄塘，一个无数海外亲人灌溉心血、甜蜜牵挂的美丽侨乡。它位于紫金县西北部，东连紫城镇，西接柏埔镇，南毗义容镇，北邻东源县康禾、黄田镇。主要资源有木、竹、松脂、蜂蜜、油茶、紫胶和石灰石、大理石及铜、钨、锡等矿产，柏埔河横贯中部，水资源充沛，拥有国家激流后备人才基地——黄塘镇激流回旋基地，系广东省激流回旋项目的重要训练基地之一。全镇面积230平方公里，人口约5万。黄塘镇有归侨侨眷10107人，港澳台眷属11822人，海外华人华侨28462人，香港同胞2830人，澳门同胞90人，台湾同胞262人。华人华侨主要分布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黄塘籍海外华人华侨或回乡投资办厂，或慷慨解囊捐助家乡公益事业，回馈桑梓，为黄塘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百年家族“侨史”

在紫金县黄塘镇居住的，有很多是归侨侨眷。比如，从腊石村美丽的乡间别墅走出来的黄观灵，他的一生，就和“侨”字纠缠在一起。

说起百年前的历史，老人犹自唏嘘。

黄观灵说，大约百年前，家乡生活艰难，日子难以为继，黄观灵的祖父黄桂添迫于无奈，狠心卖掉了自己的大女儿筹得盘缠，然后，拖家带口，走路到了临江镇，坐船到惠州，又步行到深圳宝安，经过蛇口，千辛万苦辗转到了马来西亚。后来，一个姑姑和三个叔叔又陆续在那边出生。

20世纪50年代，东南亚革命风起云涌。1951年，他父亲黄运华因为支持进步青年的活动，为当时的马来西亚政府所不容，被迫带着他和母亲以及哥哥姐姐，一家五口回到了黄塘腊石老家。

“离家几十年，乍一回来，真是什么都没有啊！”黄观灵这样回忆。所幸的是，父亲有文化，又有文艺特长，当过老师和紫金山歌剧团导演，还当过农场场长。1957年，因惦念儿子在国内生活艰难，祖父黄桂添也曾回国来看望他们，并且卖掉部分产业，携款回来给他们买盖房的材料。

黄观灵的生活经历则相对顺遂，他当兵、入党、工作，在村大队工作了三十几年，2004年退休。如今，他住上了漂亮的别墅，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2014年，黄观灵那饱经沧桑的父亲去世，享年90岁。

而马来西亚那边的亲人，逐渐成为



黄塘，一个无数海外亲人灌溉心血、甜蜜牵挂的美丽侨乡

甜蜜的牵挂。2000年后，两边开始频繁来往，与姑姑叔叔、表弟表妹堂弟堂妹们，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老人还记得“神六”上天那年（2005年）的春节，他用电话向身在马来西亚的叔叔拜年，80多岁的叔叔在电话那头激动地说：“国家强大了，我们真高兴，唐山（海外华人习惯把中国称为唐山）好，我们华侨才好啊！”

河源首个村级侨联

黄观灵的故事，是腊石村无数归侨侨眷的缩影。

作为归侨侨眷最为集中的村落，黄塘镇腊石村交通便利，位置优越，村落在和缓的山坡慢慢铺开，民居错落随意，鸡犬相闻。500多位腊石村村民中，逾七成村民为归侨侨眷，家家户户几乎都和“侨”字沾点边。20世纪初，村民叶石在马来西亚开矿场，生意做

大了，许多村民都投奔过去，慢慢在那边开枝散叶，这便是腊石村侨眷多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腊石人到邮局排队拿汇款（海外寄来）都是一景。当时，汽车在农村还是稀罕物的时候，曾有腊石华侨捐赠了3台丰田小汽车给黄塘镇委、腊石村委会、镇卫生院，一时引起轰动。

腊石还是一个明星村，2008年12月，该村成立了河源市首个村级侨联组织，是全市的先进典型。村委会隔着省道对面，就是腊石侨联的所在地。多年来，腊石侨联热情接待寻根问祖、回乡探亲、旅游观光的海外侨胞，充分发挥了侨联联系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为腊石村的经济建设牵线搭桥。为振兴故乡的经济建设，海外侨胞作了很大的贡献，经常慷慨出资赞助家乡的公益事业。无论是赈灾扶贫、设立基金会，还是造桥修路、回乡投资，处处可见到热心侨胞回报故土的拳拳心意。✎

异国他乡多磨难 赤子归根爱国情

文◎罗国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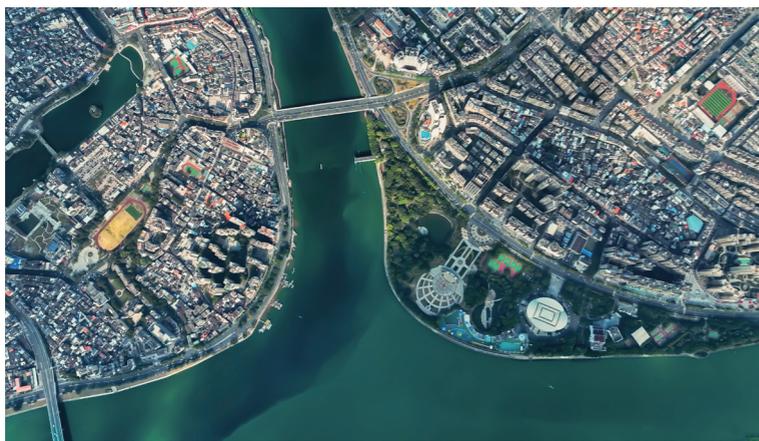
我老家在河源市龙川县紫市镇，此地是著名侨乡。1949年之前，这里很多人因贫穷不得不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我的家族与南洋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3年，我的祖父罗纪德被“卖猪仔”到南洋，后辗转到英属北婆罗洲吉达埠（今马来西亚沙巴州古达）附近的一个烟岛。祖父年老时，被烟岛老板以送归唐山养老为名，推进大海，横死他乡。我的伯父、父亲、姑姑、堂叔等也先后到南洋谋生。现在马来西亚沙巴州丹南、根地咬、亚庇的中华义山还先后安葬着我的伯父、堂叔、堂嫂、姐夫、姐姐等人的遗骨，他们长眠于异国他乡。

我出生在马来西亚，虽然返回祖国已60多年，但想起我家在南洋的辛酸史仍思绪难平。1934年，我父亲罗贵谦为生活所逼，携全家老少到英属北婆罗洲亚庇丹南埠开荒种地。他离开了旧中国这个“苦海”，到了南洋又进了另一个“苦海”。为求生存，父母到南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搭建房子和开荒。他们用竹木竖起当墙，用树叶、茅草当瓦，所谓房其实就是茅草棚，刮大风、下暴雨时，住处到处漏水。更为艰苦的是开荒，父母开的“荒”是原始森林，丹南的原始森林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树叶茂密，遮天盖日，地面空旷，没有小树，落叶足有四五十厘米厚；树干笔直，一般的树

直径都有五六十厘米，高二三十米，大的树直径有一二米，这些树盘根错节，很难将树根挖干净。所谓开荒，就是先把这些大大小小的树砍倒，晒干，然后轮番放火，直至全部烧掉，最后用锄头开出耕地。开荒时，父母不知流了多少汗水，双手磨出一层又一层老茧，砍刀、锯子、锄头换了一把又一把。在好不容易才开垦出来的耕地上，种上水稻、玉米、黄豆等农作物。丹南地处赤道，气候炎热。他们每天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在田间劳作。收获季节，为了尽快将农产品送到粮食收购商手里，他们通常半夜就到田间收割或采摘，一直做到天亮，白天稍微休息一下又出工。沉重的压力和长年的劳累，刚迈入不惑之年的父亲发头就全白了，母亲也比同龄人显得苍老。

经过七八年的艰苦创业，全家人的生活逐渐有了好转，未料祸从天降，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入侵南洋，全家人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军来到南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很多华侨惨遭杀害，我的一个表兄就是死在日军的屠刀下。那时，日寇的飞机整天在华侨居住的地方狂轰滥炸，家人因藏在防空洞里才逃过一劫。日本对南洋进行经济封锁，自由贸易中断，华侨又不敢到田里种庄稼，藏起来的粮食吃完了，



在河源新老市区交界处，新丰江、东江在此交汇

只好吃野菜、野果，一家人差点活活饿死。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全家人逐步过上安稳的日子，但北婆罗洲又恢复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华侨始终过着受人奴役的孤苦伶仃的生活。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消息传到海外，南洋华侨奔走相告，一片欢腾。1950年春，父亲就开始筹集路费，并到当地移民局申请回国，直到1952年春才得到批准。当年4月，我家和邻近的几家人一起踏上了回国的路程，从丹新南巴岸坐火车到亚庇（今马来西亚沙巴州首府），再从亚庇坐船途经新加坡到香港。荷枪实弹的香港警察护送我们这批归国华侨，到深圳罗湖桥进行交接。过了罗湖桥，我们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第一次看到了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庄严的祖国国徽，我们是多么的激动，多么的自豪！海外赤子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到了阔别18年的故土，适逢土地改革运动还在进行中，我家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和房屋，从此翻身做主人。父亲回到家乡后，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是竹头神乡（今紫市镇）侨务工作的

负责人，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热心为本乡的归侨、侨眷服务。1958年，《龙川日报》曾登载过他爱国爱乡、乐于奉献的事迹。父母一生勤劳节俭，善良诚实，他们传承着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即使砸锅卖铁也要供儿女读书。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三兄弟分别考上北京大学、中山

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三个姐姐也读上了省中专或高中，当时在紫市镇被传为佳话。

全家人从马来西亚返回祖国，转眼间已62年。家人分布在各行各业中，孩子们在父辈的影响下，从小立志成才，报效祖国。我从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后，从事中学教育38个春秋，曾先后被评为南粤优秀历史教师、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模范教师。2000—2010年当选河源市侨联委员（第三、第四届），曾被评为河源市侨联系统先进个人。

追溯父母的足迹，追忆南洋的往事，看今天家族喜人的业绩和家人幸福美满的生活，真是返国前后两重天。我们这些历经沧桑的归国华侨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我们归侨扬眉吐气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归侨和谐幸福的今天。我们由衷地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伟大的祖国。我们及子孙后代会传承先辈的优良传统，承担起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作贡献的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广东侨联纪事

文◎粤乔宣

五月 · May

5月7日，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参加广东公共外交协会第八期“广东公共外交论坛”。

5月7日，谢惠蓉副主席在机关会见多伦多花都同乡会会长吴文光一行和加拿大魁北克省中山同乡会会长黄善康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5月8日至10日，陈农灏秘书长赴山东日照参加全国侨联系统志愿服务工作经验交流活动。

5月9日，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参加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暨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会。

5月10日，谢惠蓉副主席在机关会见省侨联海外委员、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会长刘志荣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5月11日，李丰主席、陈农灏秘书长在广州出席暨南大学第十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5月13日，省侨联在广州首次召开发挥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作用经验交流会，全省21个地市侨联、39个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相关负责同志约100人参加会议。李丰主席出席会议并讲话，戴文威副主席主持会议。

5月14日，曹堪宏二级巡视员、陈农

灏秘书长在机关会见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和志耘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5月15日，李丰主席在机关会见香港理工大学珠三角校友会广州分会会长周洽强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5月16日，李丰主席、谢惠蓉副主席在机关会见西班牙王国广东（粤港澳）同乡总会会长朱润清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5月16日，李丰主席、陈农灏秘书长赴东莞出席第六期“侨爱南粤·法治沙龙”暨《民法典》宣讲活动。

5月16日，曹堪宏二级巡视员和澳大利亚新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彭小仕赴肇庆走访考察。

5月17日，陈农灏秘书长在广州出席“粤科发布”推动香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行动大会。

5月21日，戴文威副主席带队赴江门开展宣传工作专题调研。

5月22日，李丰主席、林克凤二级巡视员在机关会见澳大利亚华人联谊会荣誉会长刁振谋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5月22日，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参加省委统战部有关涉侨单位海外青年华商工作座谈会。

5月22日，曹堪宏二级巡视员赴深圳出席2024第六届“智荟深圳·海外专才深圳行”活动开幕式。

5月22日至23日，戴文威副主席赴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调研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并开展慰问活动。

5月23日，李丰主席、林克风二级巡视员在机关会见汕尾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吕海虹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5月23日，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参加省政协党纪学习专题辅导报告会。

5月23日至25日，中国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程学源赴广州出席“广东省高等院校暨科研院所侨联联盟”成立活动，并开展工作调研。李丰主席、谢惠蓉副主席、陈农灏秘书长等参加有关调研活动。

5月24日，“广东省高等院校暨科研院所侨联联盟”成立活动在中山大学举行。中国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程学源出席活动并讲话。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侨联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陈迈、联谊联络部部长桑宝山，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国亚萍，省委教育工委组织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廖荣辉，联盟第一届理事会30多家理事单位高校、科研院所侨联及所在单位有关领导，部分地级以上市侨联相关负责同志等130多人出席活动。李丰主席出席活动并致辞，谢惠蓉副主席参加活动，陈农灏秘书长主持活动。

5月25日，曹堪宏二级巡视员赴茂名出席茂名市侨商联合会成立一周年活动。

5月26日，李丰主席、陈农灏秘书长赴中山出席“2024年广东国际侨界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

5月27日，省侨联举行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

精神，认真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扎实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各项工作，示范带动侨联全体党员干部更好学纪、知纪、明纪、守纪，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为奋力推动新征程广东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李丰主席主持会议并讲话，戴文威、谢惠蓉副主席，陈农灏秘书长，庄有林二级巡视员作交流发言。曹堪宏、林克风二级巡视员，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四级调研员以上党员干部，各业务主管社团党支部书记参加学习会。

5月28日，戴文威副主席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交流外宣工作。

5月28日至30日，李丰主席、陈农灏秘书长赴清远、韶关参加2024（第十期）创业中华·华商南粤行——走进韶关、清远活动。

5月29日，林克风二级巡视员赴惠州市侨资企业调研。

5月29日至30日，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走访省侨界政协委员。

5月30日，戴文威副主席出席第十一届广州侨文化日活动。

5月31日，李丰主席在机关会见瑙鲁华商会会长颜景聪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六月 · Jun

6月3日，李丰主席、谢惠蓉副主席在机关会见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李瑞华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6月4日，李丰主席、陈农灏秘书长在机关会见马来西亚广东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陈治年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6月5日，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走访广东财

经大学。

6月5日，陈农灏秘书长到粤科集团金融大厦出席广东国际侨界创新创业大赛第三次工作推进会。

6月5日至7日，谢惠蓉副主席赴惠州、东莞参加省政协关于广东省企业“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专题调研活动。

6月6日，由中国侨联指导、广东省侨联主办的“追梦中华·改革开放创新的广东侨乡”2024海外华文媒体广东采访行在广州启动。中国侨联兼职副主席、广东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李丰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广东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戴文威主持启动仪式。

6月7日，李丰主席在广州参加省委金融工作会议。

6月7日，李丰主席、陈农灏秘书长在广州会见美国国际华人科技工商协会主席李大西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6月12日，李丰主席、林克风二级巡视员在机关会见澳大利亚国际武术学院院长陈有南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6月13日，李丰主席出席东莞市侨商联合会第一届监事会就职典礼并讲话。

6月13日至14日，全省推进“侨胞之家”建设工作交流活动在珠海举行，来自21个地级以上市侨联领导、基层侨联具体负责同志，“侨胞之家”负责人代表，以及新疆、西藏兄弟单位侨联代表共130多人参加活动。中国侨联基层建设部部长张毅出席活动并讲话。李丰主席出席活动并讲话，陈农灏秘书长主持活动。

6月14日，李丰主席在机关会见暨南大学广东侨联国际校友会会长马炳良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6月14日至16日，中国侨联基层建设部部长张毅赴湛江开展工作调研，曹堪宏二级巡视员参加调研活动。

6月14日至18日，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万立骏到广州出席中国化学会第34届学术年会。李丰主席，戴文威、谢惠蓉副主席，陈农灏秘书长等陪同参加有关活动。

6月17日，李丰主席、谢惠蓉副主席在机关会见印尼华裔总会执行会长黄印华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6月17日，省侨联召开党纪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省纪委监委驻省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陈钟鹏作警示教育专题辅导报告。李丰主席、谢惠蓉副主席，陈农灏秘书长，曹堪宏、林克风二级巡视员，以及机关和下属事业单位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会议。

6月17日，全省侨联系统第七期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在茂名开班，并同步在省侨联举办2024年度省侨联机关、下属事业单位党员干部集中研学活动。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李丰，党组成员、副主席谢惠蓉，党组成员、秘书长陈农灏，二级巡视员林克风在省侨联出席开班式，党组成员、副主席、机关党委书记戴文威出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中共茂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卫华出席开班式并致辞。省侨联二级巡视员、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庄有林主持开班式。来自全省侨联系统基层党组织书记、省侨联机关和下属事业单位党员干部等150余人参加。

6月18日，李丰主席在广州参加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二十二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

6月18日至20日，陈农灏秘书长率广东省侨商侨青企业家代表团赴云南昆明出席第20届“侨联五洲 七彩云南”东盟华商会。

6月19日，李丰主席以“严守六大纪律，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侨联干部队伍”为主题，向省侨联机关、下属事业单位全体党员干部以及全省侨联系统第七期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学员讲授党纪学习教育专题纪律党课。

6月19日，曹堪宏二级巡视员赴肇庆出席“艺术为桥 同心筑梦”著名华人艺术家区本书画作品展开幕式。

6月19日至20日，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参加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6月20日，李丰主席在广州走访法国番禺富善社广东代表处。

6月21日，省侨联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到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板桥村联合开展以“党建引领凝聚力，和美乡村新风尚”为主题的党日活动。李丰主席，戴文威、谢惠蓉副主席，曹堪宏二级巡视员，以及机关和下属事业单位全体党员干部等参加活动。

6月21日，省侨联常委陈愈强向省侨界仁爱基金会捐赠100万元，用于支持开展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侨界义务植树活动。李丰主席，戴文威、谢惠蓉副主席，陈农灏秘书长等出席捐赠仪式。

6月21日，谢惠蓉副主席在机关会见印尼西爪哇省华文教育协调机构主席刘一江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6月21日，陈农灏秘书长在广州出席广东侨创联盟一届二次理事长会议。

6月22日，李丰主席出席“侨助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侨界同心植树（中山）活动”。

6月24日，谢惠蓉副主席赴佛山参加省政

协关于广东省企业“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专题调研活动。

6月24日，陈农灏秘书长在机关会见法国东莞商会会长蔡强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6月24日至25日，戴文威副主席赴梅州出席2024“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开营仪式，并慰问受灾侨界群众。

6月25日，李丰主席在广州出席2024年第一次省“五侨”联席会议。

6月25日，谢惠蓉副主席出席江门侨媛会成立大会暨就职活动。

6月26日，戴文威副主席、陈农灏秘书长在机关会见中山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刘志巍一行，并举行座谈交流。

6月26日，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参加省侨联联谊联络部党支部与广府人联谊会党支部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联学共建活动。

6月26日，陈农灏秘书长参加2025年全省预算编制工作布置会暨培训班。

6月26日，陈农灏秘书长出席江门欧美同学会成立大会。

6月27日至28日，戴文威副主席赴深圳出席新时代侨联文化工作创新发展座谈会。

6月28日，谢惠蓉副主席出席委内瑞拉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中国—委内瑞拉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

6月28日至7月4日，曹堪宏二级巡视员率团访问柬埔寨、越南。访问期间，开展侨情调研，慰问华侨华人，拜访华侨华人社团，走访华商企业，宣介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与两国有关华社和机构代表、省侨联海外顾问和委员等座谈交流。

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由省侨联领导分别带队赴全省21个地市，开展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侨界义务植树活动。📍

28家海外华文媒体记者荟萃广东侨乡

文◎祝顺祥 图◎子言

2024年6月6日至12日，由中国侨联指导，广东省侨联主办的“追梦中华·改革开放创新的广东侨乡”2024海外华文媒体广东采访走进广州、江门。来自美国、德国、柬埔寨、埃及、新西兰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28家海外华文媒体，以及5家涉侨中央媒体和5家省内主流媒体开展了为期7天的侨乡之行，现场体验新一轮广东改革开放、创新创业创造的活力，亲身感受南粤大地中国式现代化广东新篇章。

启动篇

6月6日，2024海外华文媒体广东采访行在广州启动。中国侨联兼职副主席，广东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李丰，广东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戴文威，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副主任邓鸿，广州市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童慧等领导出席启动仪式。

李丰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海外华文媒体是中国联通世界的独特纽带和桥梁，是中国梦的传播者、阐释者和践行者，也是推动广东改革发

展的重要力量。希望海外华文媒体发扬优良传统，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了解广东。也期待大家多宣传广东侨乡文化和岭南文化，促进广东对外人文交流，让广大海外侨胞看到、听到更多来自祖（籍）国和广东的消息和声音，促使更多海外侨胞到广东旅游观光、经贸交流，参与广东现代化建设。

马来西亚海内外传媒集团主席续炳义代表海外华文媒体发言。他说，讲中国故事，传中国声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海外华文媒体人的责任和义务，“传播海内外，筑我华夏魂”是海外华文媒体人的初心。他表示，愿以赤子之心和专业品格，用清晰、理性、真切、客观、公正的声音沟通海内外，联动五湖四海，链接你和我；用相机记录广东的经典瞬间；用手中的笔书写广东的感人故事；用脚步丈量广东这片神奇的土地。

广东省大湾区办秘书处四级调研员彭超分享大湾区的发展机遇，并邀请大家到大湾区实地采访、考察、交流，亲身体验大湾区的新精彩，对外讲好大湾区的故事，共享新机遇，共创美好明天。

创新篇

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提出：“广东具

备了坚实的产业科技创新基础和创新优势，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7年全国第一，全省上下形成强烈共识：高质量发展是广东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出路，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创新驱动发展。”6月7日至8日，采访团走进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广汽研究院、广州呼吸健康产业孵化器、励丰文化产业园和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实地感知广东高质量发展的万千气象。

广汽研究院研发人员超6000人，拥有专利约1.86万件，发明占比约41%，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评价中连续位列汽车行业前茅。在采访过程中，香港中外新闻社总编辑韦燕对广汽工作人员提到的两组数据印象深刻。“一是工作人员提到53秒能够下线一辆车，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是零碳工厂。”韦燕说，“我走过很多地方采访，零碳工厂、零碳企业就目前来看，是比较少见的。”日本《东瀛新视野》总编辑蒙令华看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感到非常钦佩。他说：“现场工作人员提到广汽的部分技术已反哺给合资企业，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亮点。中国的民族品牌，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能够走在世界前列，且获得认可，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海外华文媒体采访团参观广汽研究院

广州呼吸健康产业孵化器致力于呼吸医学生命健康领域的创新与转化，依托广州医科大学、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端国家级科研院所，创新性搭建及成功打造了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整的产业转化平台与产学研体系，实现了产学研结合及成果孵化，被授予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产学研分中心/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产学研基地。采访团对广州呼吸健康产业孵化器在呼吸健康产业领域的创新能力和产业集聚效应表示高度赞赏，亲身感受和见证了钟南山团队多项研究成果“落地”。

缅甸《金凤凰报》编辑熊智明对广东这片热土上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印象深刻。他了解到，由广东省侨联、中山市人民政府、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联合主办的2024年广东国际侨界创新创业大赛，引起海内外侨界热烈反响，正在接受报名中。他说：“海外华文媒体可以发挥自身优势，让更多对广东发展有兴趣的人才了解最新项目和相关政策，帮助他们抓住发展机遇。”

绿美篇

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是“百千万工程”重要内容之一，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为助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广东省侨联整合各方资源，在全省21个地级市陆续开展“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侨界义务植树活动”，掀起侨助“百千万工程”的绿色热潮。

6月8日，广东省侨联、五邑大学、江门市侨联等联合在江门举办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侨界义务植树活动。广东省侨联党组成员、



海外华文媒体采访团见证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侨界义务植树活动

副主席戴文威，五邑大学校长张运华，江门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林春晖等出席种树活动，28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见证并一起挥锹植树。

戴文威在致辞中表示，本次义务植树活动将成为侨胞、港澳同胞参与绿色生态建设的永久见证。他希望社会各界传承绿色文明，保护生态环境，倡导低碳环保，身体力行参与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奏响生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据了解，江门是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目前江门的森林面积、覆盖率、蓄积量位居粤港澳大湾区前三位。著名侨校五邑大学的校园绿化也是驰名远近美名远扬，校园内层林叠翠、绿树成荫，是推进绿美江门生态建设的“桥头堡”，也是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示范点”。

龙舟篇

岭南一带水网密布，自古就有龙舟竞渡的风俗，其中，赛龙舟（礼乐龙舟）、端午节（古劳三夹腾龙）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各地围绕龙舟文化策划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大家感受龙舟魅力。



采访团到江门观看2024全国龙舟大联动“嘉士利杯”江门（开平）国际龙舟邀请赛

6月10日，采访团一行来到江门观看2024全国龙舟大联动“嘉士利杯”江门（开平）国际龙舟邀请赛，现场感受群龙竞渡、劈波斩浪的热闹与精彩。

美国《华人》杂志社副社长魏炯才一路走来，快门不断，他说：“龙舟节活动让我感受到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体会到震撼人心的龙舟精神，更体验到了奋斗的快乐与收获的成就感。如今龙舟文化在海内外广为传播，我们作为媒体人要架起沟通海内外的桥梁，做中外文化交流的民间使者，让更多的海外侨胞、海外友人了解广东、了解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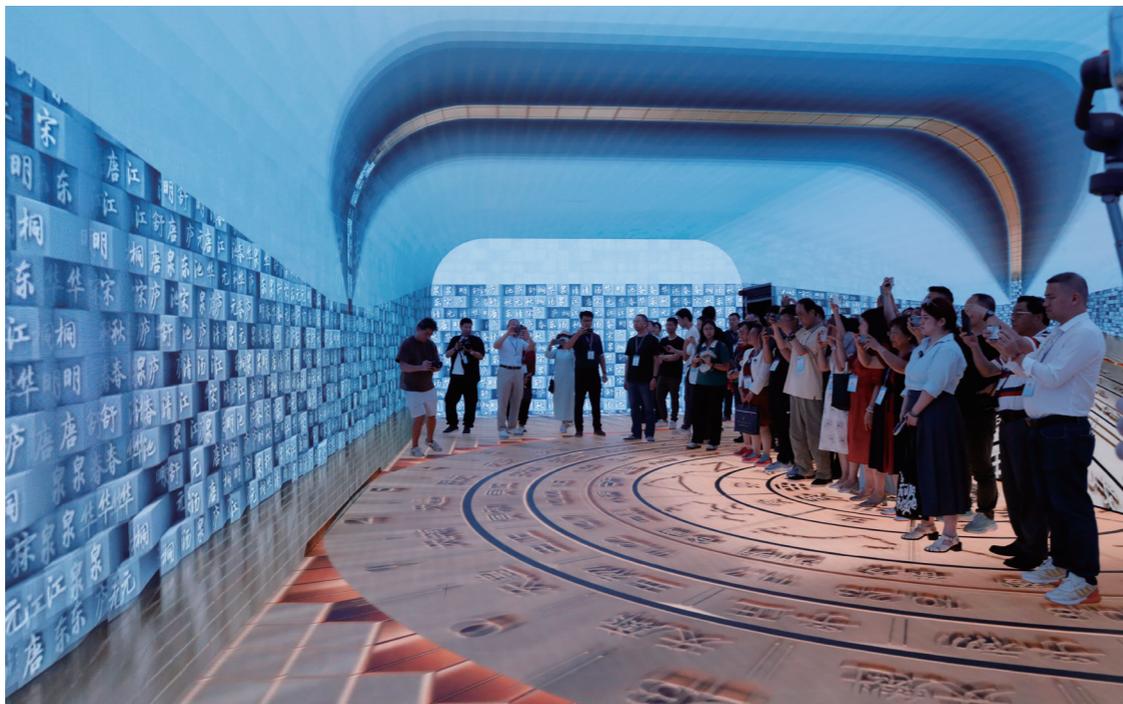
“虽然在海外生活多年，每次看到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活动，我的心里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激动和自豪！”葡萄牙葡新国传集团总编黎安琪说道。“这次现场观看龙舟赛让我

深深体会到了海外华侨为什么如此热爱和执着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儿女，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应该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

文化篇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目前全省共有39个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其中江门市有8个，此次采访团走访了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广东厨艺技工学校、开平市塘口镇和恩平市冯如故里牛江镇等5个文化交流基地，把最具特色的侨乡文化推向世界。

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是江门市打造华侨



海外华文媒体采访团在励丰文化产业园感受《活字印刷》沉浸式数字影片



海外华文媒体采访广东厨艺技工学校培养的杰出学员代表“世界厨王”伍海峰先生

华人文化交流合作国家平台的重要载体，每年接待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外国友人近10万人次。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开展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活动，组织境内外学生到五邑地区游学，建成五邑大学侨文化展示馆，推动成立省级“侨乡文化（江门）生态保护实验区”。塘口镇依托侨乡文化、世遗文化、碉楼文化，挖掘碉楼建筑与村落故事，着力打造以世遗文化、华侨文化为底色的文旅小镇，打造江门（塘口）江澳青年文创小镇建设，并被列入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文化产业园区建设项目。牛江镇建设恩平拉美华侨华人展馆，举办“拉美文化”咖啡美食嘉年华，开展美丽侨村建设。

6月11日下午，采访团走进广东厨艺技工学校。28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见证了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揭牌。当

日，广东烹饪协会、香港饮食业职工总会、澳门餐饮行业协会、澳门美食同业联合商会等与广东厨艺技工学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书。学校还举办了侨乡特色菜研发中心开展菜式研发、品鉴交流活动，邀请了学校培养的杰出学员代表——“世界厨王”伍海峰先生回校交流。

广东厨艺技工学校办学30多年来，累计为美国、加拿大、英国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输出优秀学员超过5万人，为弘扬中华餐饮文化作出积极贡献。他们凭借在学校习得的精湛厨艺，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众多国家的餐饮界崭露头角，不仅赢得了当地食客的喜爱，也让中华美食的魅力在海外得到广泛传播。学校还充分依托海外华文媒体，与美国中餐联盟等签订合作协议，讲好粤菜故事，宣传侨乡文化。📍

穿越尘封的往事

——恩平拉美华侨华人展览馆参访有感

文◎楼亚沙（墨西哥《视界拉美》驻上海总代表）

6月11日，我跟随2024海外华文媒体广东采访行的同行们一起走进改革开放创新的广东侨乡恩平，参观位于牛江镇的恩平拉美华侨华人展览馆。

当我跨过展览馆门槛时，抬头就看到一幅“恩平人在拉美”的地图，隐约间可窥见图中那个年代的华人华侨在遥远的拉美生活的场景，让我顿时有了一种年代的沧桑感。我徜徉其间，仿佛穿梭在时光走廊，又仿佛在翻阅一部历史书。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配上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解说词，将那些先辈们的故事一一呈现在我的眼前：100多年前，恩平先侨为生活所迫，离乡背井，远渡重洋，踏上了拉美这块土地，像一粒粒生命力极强的种子散落在墨西哥、委内瑞拉、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古巴、巴拿马、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他们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并成为江门、广东乃至中国与拉美地区之间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

展览馆通过上下两层的布展，用感人的文字、生动的图片记录了几代恩平侨胞的奋斗故事。展览分为移民大势、拉美剪影、念祖爱乡、文化传承、褒扬纪念等部分，展出图片150余张，并运用图文结合、场景复原、多媒体展示等手法，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恩平籍侨胞在拉丁美洲的艰苦创业历程，展现了他们爱国爱家的赤子情怀以及兴办实业、热心公益、在海外渐入佳境的历史；同时也让

我们看到那些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同胞，以饱满的赤子情怀，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以及新中国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鼎力支持祖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如今的拉美华侨华人正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用他们的坚韧和付出，赢得了拉美居住国政府的肯定和当地人民的赞誉。

忽然，墙上的一幅图片和解说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介绍说，墨西哥尤卡坦半岛有华侨中文学校，生源大部分为恩平籍侨胞子女；墨西哥在20世纪就有中华会馆、华侨工商会、华侨协会等。这里较详细地说明：在美墨边境城市墨西哥蒂华纳的华侨协会成立于1918年，原名华侨团体，1928年更名为华侨工商会，1933年恢复华侨团体名称，1936年改称酒湾拿华侨协会，2003年12月更名为蒂华纳华侨协会。恩平籍著名侨领梁权暖曾担任协会主席，现任主席是恩平籍华人梁活辉。

是啊，我怎么忘记了呢？墨西哥也是一个华侨华人较多的国度，来自江门五邑的历代侨胞几乎占了20世纪墨西哥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20世纪初，美国曾经兴起一场大规模的排华运动，发动打砸抢杀戮华工等血腥强盗行径。墨西哥紧邻美国，墨西哥的华人和华商企业都受到了“排华运动”的严重波及。

我曾到访过墨西哥北部科阿韦拉州的托

雷翁市。那年适逢当地政府和华人社团在组织纪念华人到墨西哥100周年纪念活动。据在托雷翁公证处当老板的墨西哥朋友介绍，托雷翁市中心的老街（人称历史中心）就像中国国内的小镇，当时我还没有这个概念和意识，这次参访了开平的赤坎古镇，让我眼界大开，赤坎与托雷翁市中心的建筑风格是何其相似！那些沿街骑楼、旅店、洗衣店、铛铛车、小火车、洋行、咖吧、酒肆、茶馆、邮局、小教堂等，简直就是翻版！但是究竟是谁复制了谁，这就说不清了，大概兼而有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吧！

我在托雷翁了解到，据说在西班牙殖民时期，有一艘叫做马尼拉大帆船的运输船，在菲律宾马尼拉和墨西哥海港阿卡普尔科之间的贸易航线上定期往返穿梭。而在这艘船上工作的中国船员就是最早进入墨西哥的华人。由于当时各大洲之间交流十分稀少，到17世纪后，在墨西哥首府墨西哥城才出现几个中国银匠和剃头师傅。到19世纪初，旅居墨西哥的华人也依然寥寥无几，直到19世纪末，由于时任墨西哥总统迪亚斯实行了鼓励外国投资和移民垦殖的政策，特别是在1899年和清政府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后，各种便利的条件让本来就有勇闯江湖传统的华人陆续涌入墨西哥。

进入墨西哥的华人最初主要在铁路、农庄和银矿靠体力为生，或以洗衣为业，积累了一些做生意的本钱之后，便转而从日用百货的批发和零售的生意，成为当地最早致富的群体。扎根落户之后，他们便开始组织“中华商会”，同时扩充人脉，和美国各地的华商保持着良好的

商业信贷联系。短短十年，在墨西哥工作生活的华人便超过1.3万人，最高峰时人数近2.8万人，其中在托雷翁的华人最引人关注。因为这里的华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商业成就。

当时的托雷翁有华人600余人，他们与在国内时一样，和平守法，辛勤劳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同时不断积累着财富，买地买房。不过，他们并没有满足于经营餐馆、旅店、洗衣房、杂货店等小生意，他们还筹资注册成立了一家资金雄厚的华资银行，并在城内修建了一条有轨电车线路。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城郊开垦了大规模的蔬菜种植园，乃



塔城全景



墨西哥华工

至当地蔬菜市场的批发和零售基本上被华人垄断。应该说，华人对托雷翁的影响既是多方面的，又是深远的，他们对该城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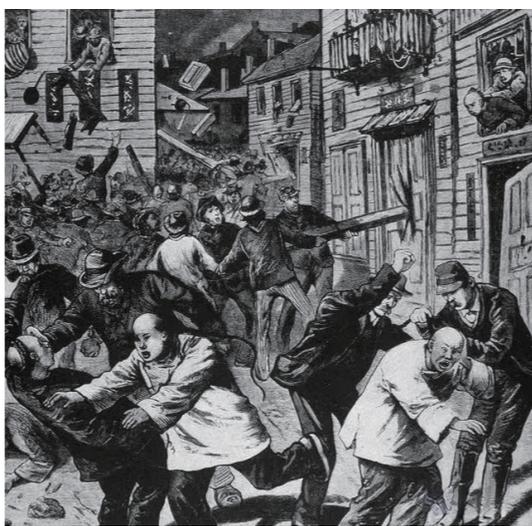
托雷翁华人的勤奋和富裕引起了当地墨西哥人的嫉恨和不满。1911年5月，马德罗领导的反政府武装就出现在托雷翁近郊。当时统治墨西哥的是迪亚斯总统。托雷翁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交通枢纽城市，占领托雷翁是反政府武装马德罗军占领整个墨西哥北部地区的关键一战。5月13日凌晨，近5000名反政府武装四面包围了托雷翁，和人数只有800人的联邦政府军展开激战。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晚上，在马德罗军的轮番猛攻之下，15日凌晨，联邦政府军趁夜撤离托雷翁。随后，马德罗的军队开进这座无人戒备的城市。跟随马德罗军进城的还有一群暴民，他们大都来自托雷翁附近地区，他们像蝗虫一样突然出现在塔城的大街小巷，将贪婪狠毒之手伸向中国商户。

当狂乱抢夺的暴民和反政府武装涌入华人经营的银行大厅时，他们杀人杀红了眼，非常血腥。与此同时，一小队墨西哥骑兵到托雷翁近郊华人的蔬菜种植园，把正在劳作的中国菜农驱赶到附近的一个屠宰场，进行集体枪杀。在这场暴乱中，303名华人丧生，华人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华资银行遭到重创。

这一惨案在墨西哥历史上被称为“托雷翁事件”或“托雷翁大屠杀”，也是被墨西哥人视为其历史上耻辱的一页。100多年之后的2021年，墨西哥时任总统洛佩斯在出席活动时代表墨西哥政府承担责任和过错，向受害者家人致歉，同时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承诺，墨西哥永远不会允许“种族主义、歧视以及仇外心理”的存在。



托雷翁惨案中被毁的建筑



托雷翁惨案冰山一角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个惨痛的历史现实，再一次提醒人们：祖国的强大，才是海外侨胞最好的护身符；没有实力是要挨打的，如今面对曾经受过的屈辱，我们可以讨要说法；面对强硬势力，中国也取得了世界话语权，无论走到哪里，我们要牢记，祖国是海内外华侨华人强有力的靠山。一方面，我们为祖国骄傲，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华侨华人也要和居住国的政府和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要像先辈们一样，在两国关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从广东侨乡“行”，看中国世界“行”

文◎陈 林（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社长）

我是山东人，定居海外20余年让我有了一颗“广东胃”，每周至少要吃一次广式早茶，不然总觉得生活缺了点什么。跟广东人交流也总会让自己的思维开阔不少，我觉得广东人是非常务实的，也是能吃苦的，中华民族的特点在广东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广东以其自有的风格影响着世界，中国在上世界很“行”，与广东华侨华人的奋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走进广东侨乡，更能一探究竟。

广东侨文化，世界瞧中国

2002年，我到法国求学，然而初到异国的兴奋很快就被“中国胃”和“中国习惯”打败，我无比思念中国的美食，以及汉字、汉语。法语弥漫的世界里，法棍包围的早餐中，我开始寻觅，哪里有中国城，哪里有中餐，哪里能找到中国的痕迹。

在巴黎生活过的华侨华人应该对Tang Fr è res（陈氏商场）不陌生，这是中国相关食品、用品在巴黎最多的地方，我们喜欢叫这里“中超”（即中国超市），创办人陈氏兄弟的祖籍是广东普宁。在这里，正宗的广式叉烧、虎皮肉都能找到，还能买到我祖籍地烟台的特产——龙口粉丝！别提多亲切了。虽然大部分食材和我本身的饮食习惯略有不同，但

中国味道足以激活我的每一个细胞，更不要说在异国他乡看到亲切的中文。

我的父亲是二胡和小提琴教育家、音乐家，我的二胡造诣不深，却也足以上台表演，在广东民乐的小曲小调中完全可以演奏自如，因此很快和位于巴黎13区的广肇会馆的元老们混熟，成为协会里宣传中国文化的主要力量，我逐渐开始习惯广东饮食，熟悉广东文化。我与广肇会馆合作，成立了飞腾艺术团，表演中国传统的舞龙舞狮、民族乐器、民间舞蹈等，深受当地人的喜欢。我们弘扬的不仅仅是广东的艺术，更让当地人喜欢上中国传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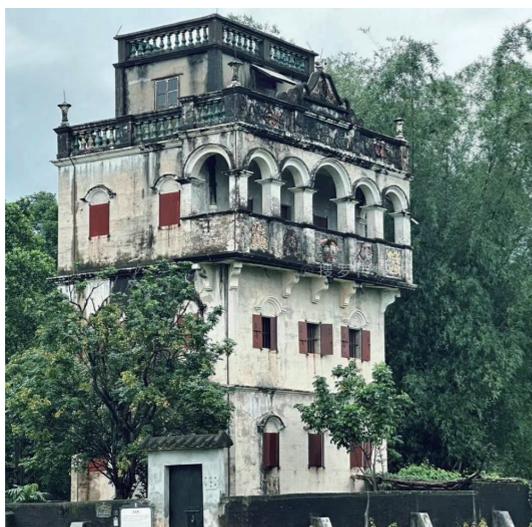
我在巴黎生活了近十年，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多年，时至今日，我生活和走过的国家有几十个。可以说，我看到的各国各地的广东侨文化，正是世界看中国的一个角度。

追梦来侨乡，仿佛回家乡

每隔一段时间吃一次广式早茶，早已成为我必不可少的饮食习惯。走进广东侨乡，品尝到地道的广式美食，我仿佛回到了家乡。广式美食不仅给我带来美味，还融合了我在海外生活的酸甜苦辣，我在海外生活的点点滴滴。广东美食，是华侨华人生活的回味。

看着餐桌上地道的糯米鸡、萝卜糕、豉汁排骨、肠粉等等，真让人无限满足。广式美食能覆盖到世界大部分有华人的地方，足以证明广东文化的魅力。

在江门，我看到当地独特的碉楼，融汇了全世界不同地区的风格，反映了广东侨民对世界文化的理解和吸收。他们融会贯通，不仅应用了西方建筑的结构学，让其坚固耐



江门碉楼是世界文化交流的印记



赤坎华侨古镇一景

用；又将中国建筑中的飞檐翘角嵌入其中，设计瞭望台、画中国壁画、雕刻窗花和木雕等。这些古老的建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老宅，而是世界文化交流的印记。

对于海外华侨华人来说，文化交融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怀念，触碰记忆的不仅仅是祖（籍）国，还有那些在海外生活的时刻。看到赤坎古镇的那一刻，我感觉世界的融合都集中在这里，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建筑表象，而是一种海外华侨华人生活过的痕迹。没有在海外生活过的人看到的也许只是一种新奇事物，而在海外生活过的人看到的是一种回忆。

传承侨历史，展望新未来

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侨乡不仅融汇了历史，更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在组织走访的高科技企业中，我们真正感受到了遥遥领先的力量。

在广汽研究院参观期间，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先进的技术，无人驾驶技术的展示，更是令人赞叹不已。纯电动汽车在广州的发展和普及，像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从2019年4月投产到2023年12月，时过四年零八个月实现了累计下线超100万辆的目标，成为全球产销最快、突破百万辆的汽车品牌，2023年实现“零碳工厂”并获评世界经济论坛唯一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

广东侨民在海外的生活中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此同时，其与时俱进的世界格局，又让广东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断升级、不断发展，在历史的道路上，开创出先进的未来。此次广东侨乡之行，值得说的不胜枚举，有机会你也来广东走一走、看一看，从广东侨乡“行”，看中国世界“行”！

跨越时空与山海，邂逅千古梁先生

文◎王淑华（尼日利亚《西非统一商报》编辑）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中学教室内，108名文科学生起立背诵这首《少年中国说》，学生们心潮澎湃、眼含热泪，整齐而有力的声音响彻校园。而我，就是那108个少年里的其中一个。

从那个时刻起，我似乎才对“祖国”这个词有了真正的理解：是血脉相连，更是责任与担当。很多年以后，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奔波于海外，在感谢祖国给予强大民族自信的同时，也以中华儿女的身份在向海外友人讲述着中国文化璀璨、日益繁荣的故事。尤其是每每想起中学时代的那个午后，想起梁启超的那篇寄语中国少年的爱国主义启蒙大作，便心潮澎湃，那首《少年中国说》不自觉地浮现于脑海，久久回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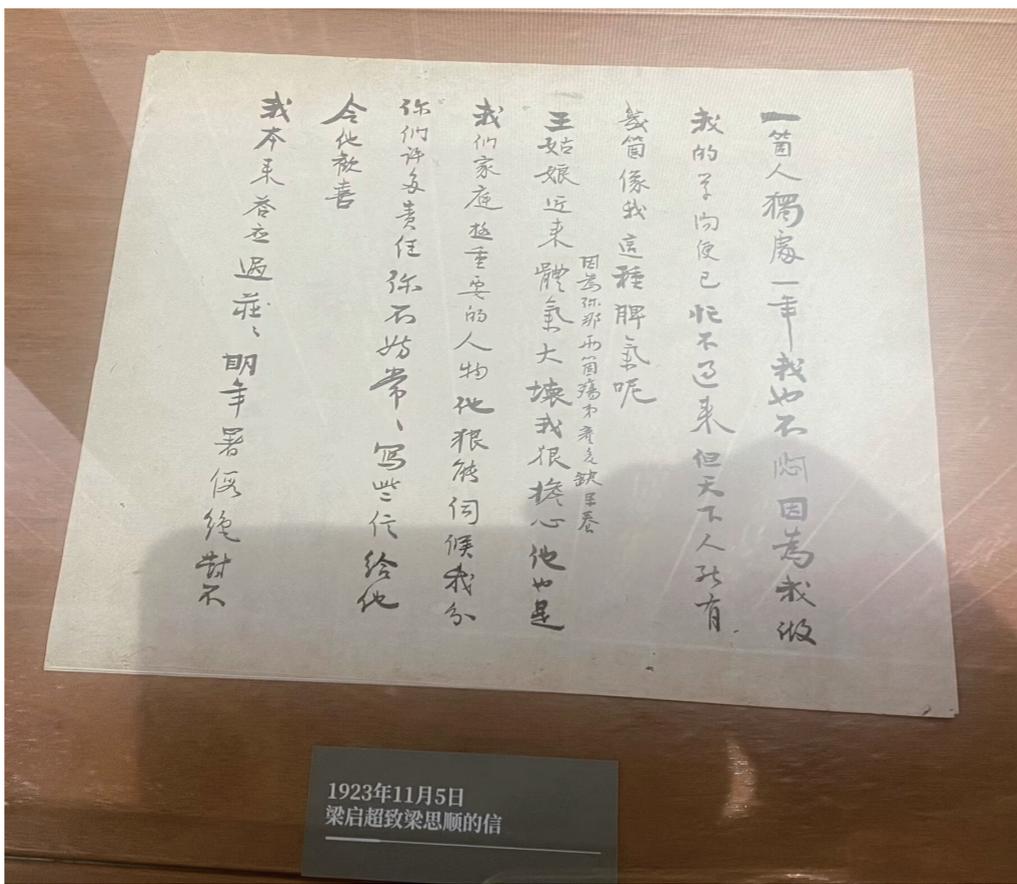
梁启超先生雕塑与他的《少年中国说》

今年盛夏之初，我受广东省侨联的邀请，与来自不同国家的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一起走进广东江门，并怀着万分敬仰的心情来到梁启超的故居。当我站在故居门口，仰望着矗立于山水间的梁启超塑像，久久不愿挪开目光，仿佛与先生一起穿越时空，回到那个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岁月。

梁启超故居建于晚清，由故居、怡堂书室、回廊等建筑组成，建筑面积有400多平方米。故居有一正厅、一偏厅、一饭厅、二耳房，两厅前各有一天井，偏厅侧有梯级直达其顶部小楼亭书房，在故居正厅门楣上悬挂了一梁启超为自己立的“一等嘉禾章中卿銜少卿 司法总长参政院参政”牌匾。1996年，梁启超故居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梁启超故居纪念馆于2001年建成，它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大师莫伯治主持设计，建筑面积达1600平方米，建筑形式中西合璧，既有晚清岭南侨乡建筑韵味，更隐现天津饮冰室风格。2022年，新会区聘请清华大学团队对梁启超故居纪念馆进行升级改造，布置

了“强国梦 中华情”梁启超生平事迹专题展，该展览面积约1600平方米，由“序厅”“少年才俊 新会骄子”“初涉政坛 救亡图存”“漂泊异乡 心系家国”“再造共和 反对复辟”等5个部分组成。

童年时期的梁启超聪明过人，才思敏捷，深得其祖父的喜爱。他在5岁时就习得四书五经，8岁学为文，9岁缀千言，12岁便考中秀才。梁启超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大力支持五四运动，推动了政界和文学界的进步。梁启超在文学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曾倡导文体改良的“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为文坛作出了杰出贡献。梁启超还是资产阶



1923年11月5日梁启超致梁思顺的信

级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也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参与主办的报纸有《万国公报》《时务报》等，在那个年代影响极其深远，其编辑出版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报刊从业人员，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媒体人，梁启超在报纸传播界的成就深深影响着我。在我看来，在那个特殊年代，梁先生通过办报引领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在寻找救国图存的道路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报刊陈述当前中国被列强环伺的危险局势，愤怒地谴责了列强的种种恶劣行径，发出了建设一个强盛、独立的新中国的号召，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抵御侵略、振兴中华的爱国激情。在那个万民迷茫而混乱的年代，梁启超还向国人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维新报刊就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西学和西方情况，热情宣扬资产阶级新文化，使广大知识分子的头脑为之一震，思想得到解放。

时局的动荡与经历的折磨，使梁启超最终决定投身教育，培养出了军事家蔡锷、蒋百里，思想与社会活动家张君勱、张东荪，教育家范源濂等。1914年11月5日，41岁的梁启超应邀到清华大学给学子们作题为《君子》的演讲，引用《周易》中乾坤二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随后，清华大学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写进了校规，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为清华大学校训。清华大学在1917年修建大礼堂时，将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刻在巨型校徽上并镶嵌在舞台正额，以激励后学。除了这些教育成就外，他的9个子女也是一个时代的传奇与佳话，“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尤其是长子梁思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贡献了毕生的心血。

在纪念馆里，陈列着几封梁启超亲笔手写的家书，刚劲有力的字体，诉说着他对留学海外子女的牵挂与思念，然而更多的是叮嘱他们要心怀祖国，回报祖国。同行的海外华媒代表们在纪念馆的整个参访中，跟着讲解员的解说，认真聆听。来自菲律宾的华裔年轻记者动情地说：“我从小在国外长大，很少有条件去学习中国的历史，但是了解梁启超后，我会更加深爱我的祖国。我也会向那些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讲述这些伟人的故事，吾辈当自强，定不负梁先生的期望！”

此次江门之行收获颇丰。作为中国侨乡，江门人杰地灵，底蕴深厚。有明代大儒陈白沙、维新先驱梁启超、“中国航空之父”冯如……这些闪亮的名字点缀着江门的漫长历史长河。据不完全统计，祖籍江门的院士有34位之多，数量位居全国地级市前列。江门不仅人才辈出，更是风景如画，开平碉楼、赤坎古镇、天然温泉镇等旅游区都是旅游打卡的必去之地。同时江门也是投资胜地，开放而完善的营商环境使江门成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

江门，不虚此行！江门故事，会继续讲下去！

梦中又见父亲

文◎黄璋尊

飞机落地，看到陌生的环境，听到陌生的语言，我知道已经到达此次旅游的目的地——泰国。这个名字，对于我们潮州人来说，既陌生又熟悉。据历史记载，从南宋末年开始，就已经有潮州人漂洋过海去泰国。出去的人管家乡叫“唐山”，家乡人管出去的人叫“番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们这里每个村落80%的人家都有“番客”。可以说，泰国和潮州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泰国的发展建设离不开潮州人，而潮州人也以艰辛的付出挣钱回家养活家里老小。就我的家族来说，从祖辈到父辈都长期在泰国打拼，同时，也在那里终老。客死他国，在我们村里不是罕事。

泰国是父亲的第二故乡，但是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寄托思念的地方，我对它的感觉很复杂。旅游团下榻在曼谷。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母亲说起“曼谷”这个名字，它往往伴随父亲的消息出现。到我读书识字以后，家里收到父亲从曼谷寄来汇款，写回信的事，就非我莫属，同时，隔壁邻居要写回信也常常找我代笔。“曼谷”二字在我笔下不知写过多少遍。如今，我已七十多岁，却才第一次到这个地方，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我想起我的祖父辈都在这里生活过，我就是靠着父亲在这里挣的血汗钱成长的，而我，对这个地方却知之甚少。我住在酒店最高层的七楼，眺望、眺望……哪里是我祖父辈曾经漂泊栖身的住地呢？哪里是他们魂之何处呢？我呆呆地凭窗眺望，寻觅着，良久，我才清

醒过来。唉！祖父的尊容相貌如何，我从来没有见过，纵使相逢也不识呀！他的身世经历也是如烟如雾，唯一的记忆是听祖母“祥林嫂”般唠叨：“你阿公早早就死了，是从曼谷回来的船上生病，被抛下大海、抛下大海……”

有幸的是我曾见过父亲一面。我是被母亲裹在襁褓里从曼谷带回潮州的，此后几十年父亲都没有回过故乡，直到我40岁那年，他才回来了一次，我们得以第一次相见。那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成立了“侨联”“侨办”，落实了华侨政策，很多华侨欣然归来团聚，不少赚了钱的华侨还投资国内各项事业，报效祖国。那时父亲已迈入耄耋之年，他没有赚到大钱，他是跟着华侨团回来的，他只想在有生之年回来看看家乡、看看儿子——我母亲当时已经去世，没能等到他回来。在潮州，有一种约定俗成，叫“撞马头”，指的是长期在外的华侨回国后，走进家门，家中的直系亲属不能马上出面迎接，而是要先躲到门后或房里回避一会儿，才能出来相见，否则，以后彼此将会互相怨恨，长久不得和睦。现在想想，这种特殊的见面方式，或许是家乡人“近乡情怯”的一种解释吧。可是，第一次见父亲，因为其特殊的情境，我竟然破坏了这个乡俗。

在离开泰国的前一夜，我做了一个梦：在人来人往的机场，我右手高举着一块厚纸板，上面用红墨水写着父亲的名字——黄华



黄璋尊，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曾任《梧州日报》副刊部主任。在《散文》《人民日报》《文学报》等报刊发表散文、随笔50余万字，著有随笔集《苦净斋随笔》。

澜，红墨水映出一片红光。我左手则拿着一张大大的照片，是父亲寄来的，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老人的照片。就这样，我一直站在出口处，踮起脚尖焦急地等着。终于，一个老人慢慢地走了过来，用惊奇、审视的目光盯着我手上的纸板和照片，然后又定定地看着我，好一阵子，他才用潮州话叫了一声我的乳名。知道这老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竟然惊慌失措。我

不懂得叫父亲，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叫过父亲，只是嗫嚅地“哦”了一声。老人见状立刻放下手中的行李，把我紧紧拉住，哭了起来，我也跟着哭了……哭着哭着，我醒了过来，原来是一场梦。不，这不是一场梦，这是真实的记忆，是那年在广州白云机场接父亲回国的情景。积蓄了几十年的强烈感情，让我和父亲都破坏了“撞马头”的乡俗，但是，我想，在天上的母亲看到这一幕，也会欣慰地原谅我们父子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却没料到也是最后一次，父亲最终客死曼谷，这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到现在却来入梦。我抹着泪想，也许是父亲亡灵有知，来我梦里相见，以慰儿子缅怀之心吧。

旅游结束的时候，飞机在泰国的天空一点点上升，直至冲进云霄，再也看不到脚下的人间。我感念这一次行程，因为它得以让我在梦中，真正地见到了父亲，真实地触到了他的热泪和温度。✎

美心美壶

文◎陈子光

美壶，应该具有美的灵魂。作为一位造壶者，应该赋予壶这样的美。

紫砂壶从传统的实用泡茶器皿，逐渐发展到既实用，又具有把玩和欣赏价值的艺术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应该就是其美学价值。

就紫砂壶的传统造型而言，“西施乳壶”形似乳房，因为人类出生后，都需要母亲哺乳才能成长，那是人们对美的最原始的情愫。“鱼化龙壶”造型构思巧妙，鱼、龙、云的装饰与壶身浑然一体。明末紫砂艺人陈仲美就是“鱼化龙壶”的创造者。中国家长普遍希望子女像鲤鱼一样跃过龙门，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梅花报春壶”以梅花报春为题，在挺秀饱满的壶身上，生动地刻画了梅花不畏风霜严寒之英姿，端丽稳重，精致传神。此壶的设计者朱可心为民初年紫砂壶名师。“提璧壶”的壶盖面因形似一古雅玉璧而得名，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高庄和紫砂壶大师顾景舟合作设计并制作的经典之作。玩壶如玩玉，玉有五德：“仁、义、礼、智、信”，提起这“五德”，与其说人养壶，不如说壶养人。互为濡养，才不失美壶之美。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技艺贵在继承与发扬。但同时也要注重文化内涵的塑造，以及生活情趣的表达，由此而生的紫砂壶不仅能够泡茶，还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

《百家姓壶》是我继“百茶百壶”之后，历时五年创造完成的一百个壶，主要以中华姓氏文化为主题来创作的创意紫砂壶。例如

“李姓壶”，其背景是传说中上古帝王颡项之后理微，在商纣王时任理官，因执法如山，忤逆商纣王的旨意，招来杀身之祸。妻契和氏携幼子利贞出逃，饥渴交加，奄奄一息时，遇到一棵结满李子的李子树，于是摘下李子来充饥，才得以生存。周文王时启用理微之子利贞为官，于是开枝散叶。理利贞为感李子救命之恩，改理为李姓，尊为李氏得姓始祖。故“李姓壶”造型似一颗圆圆的李子。

“郝姓壶”创意源于“郝隆晒肚”。郝隆是东晋时期的名士，生性诙谐。他年轻时无书不读，有博学之名。每逢农历七月七日，富裕人家就会把家中的金银细软、绫罗绸缎放在院子里暴晒，以防发霉。郝隆比较胖，便仰卧在太阳下，露出胖肚子来晒。有人问：“家家都在晒珠宝、金银细软，你为何晒肚子？”郝隆幽默地说：“我没有什么金银细软，只有肚子里的书，所以也出来晒一晒嘛！”所以壶钮雕塑的是郝隆正乐呵呵地躺着晒肚子的形象。壶面刻：“郝隆晒肚，与人比财富，不如与人比德”。

“叶姓壶”以一片茶叶为壶盖钮，创意理念是：一壶好茶，不是一片茶叶泡出的功劳，而是因为有无数片茶叶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能量和芬芳。寓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茶叶勇于付出、默默利他、不争名利的高贵品质。

作为龙的传人，能够这样默默去做、去奉献，就是值得尊敬的人。所以壶把似一个



陈子光，深圳艺术家。1987年就读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其陶瓷艺术作品多次在海内外展出，深受好评。作品《轮回》获得2008法国巴黎卢浮宫国际画展特等奖。作品《顾渚紫笋茶壶》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作品《上善若水》荣获“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作品《百家姓壶》之陈姓、汤姓、张姓壶荣获“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作品《百家姓壶》之刘姓壶荣获“工艺美术飞花奖”金奖。作品入展《2008上海国际陶艺家邀请展》。2009年在深圳举办个人艺术展《陶语·禅意》。编著电影《正青春》获2010年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大型陶浮雕作品《财富演绎》荣获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博览会创意设计大奖。2016年荣获国际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夸赞的大拇指。

艺术作品可以陶冶性情，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其次才是随着市场和时间的推移，产生增值的收藏价值。而艺术的创作过程是漫长而寂寞的，这就需要艺术创作者耐得住寂寞，才守得住清雅。当“众鸟高飞尽”时，依然“孤云独自闲”，才能够“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

只有耐住寂寞，才能守住芳华。只有淡泊名利，才能内心平静，宠辱不惊，有所作为。守得住清贫，才能真正对自己所热爱的艺术专注持久，不怨天尤人，不妄自菲薄，不见异思迁，向着既定的目标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最终才会有所收获。因此可以说，美好的东西都是源于美好的心灵，而美好的心灵，又都是从寂寞和淡泊

名利中衍生出来。

人的生命有限，而追求无止境。一个人要学会强大到无我，才能心无旁骛达到至高境界。无我之后，什么事物也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你对它们的看法和体验。无我之后，不论你居于尘俗还是庙堂，你明白，你清晰，你不再有任何困惑。你看到的一切事物，安然、寂静、美好，花开花落，一切都在完美地回归寂灭，没有一点留恋，没有一丝不甘。

无我的人无比安静，但无比地光明。无我而活着的人，就像一支蜡烛，它燃烧着，发着光，照耀着这个世界。然而，它不说“我在照耀”。无我的人就像一朵鲜花，带给人美丽，但是它不会说“我给予了您美丽芬芳”。

美壶美心，无我处，才能暗浮香。✿

东华禅寺的五十六座篆刻美石

文◎左 夫（高级编辑，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

2023年夏末秋初时节，粤北大地风和日丽。应东华禅寺主持万行法师邀请，我们从广州出发，驱车三小时到达韶关市翁源县东华山风景区。坐落于这片绿水青山中的东华禅寺，迎来一件盛事——心经篆刻碑林落成。

进入寺院法堂，万行法师合掌相迎。他形体敦实，须眉浓密，脸颊宽厚，炯炯有神的眼光中透出几分慈祥。入座后大家随意交谈，万行法师语速沉稳，字正腔圆，其声与其形略显反差。经他介绍，我对东华禅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东华禅寺始建于公元502年，原名灵鹫寺。公元661年，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继承五祖衣钵后南归，经此寺而隐修，改灵鹫寺为东华禅寺，唐宋鼎盛，毁于明清。

1997年，已闭关四年的万行法师，来到东华山又闭关潜修三年。在而立之年出关后，他决定恢复东华禅寺，再续禅宗香火。如今的东华禅寺有四大法宝：爱国文化、祈福文化、农禅文化、孝亲报恩文化。

2022年，万行法师与广州篆刻书法家张瑞麟结缘，决定以张瑞麟篆刻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印章，刻在从全国各地精选来的观赏奇石上，在东华禅寺的龙凤广场上建造心经碑林，以弘扬中华文化，这是全国首创，开天下之先河。心经印章共56方，相应刻凿于56座观赏奇石上，一印一石，有大有小，有粗有细，有方有圆，有正有斜，疏密相宜，

错落其间。也寓意中华56个民族团结和睦，国泰民安。以奇石之形态，佐以经句，金石之言，观石悟道。

万行法师以身作则，引导僧人及信众信教先爱国，学佛先做人，修道先发心，寺院上空五星红旗长年迎风飘扬。中央电视台曾采访万行法师，宣扬其弘扬佛法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的精神。宗教文化出版社、华夏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现代出版社等先后出版了万行法师的《心中月》《降伏其心》《善用其心》《其心无往》等著作。

这次粤北之行，张瑞麟全程同行。

张瑞麟儿时受父辈开蒙，学习书法，临摹法帖，几十年如一日，打下坚实的书法基础后，进而探讨篆籀，先从散氏盘、克鼎等金文临摹开始，再进行篆籀创作，修炼到精致古拙，清新自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系列篆刻作品集，表现了其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篆刻设计布局仿佛有古人的羽扇纶巾的飘逸和似巧似拙的潇洒，折射出的审美取向、技艺特点、艺术境界，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气息。

张瑞麟不仅坚守传统，更敢于创新，他尝试把篆刻艺术融入佛门。他的心经系列篆刻作品得到了西安法门寺、四川广德寺和广东弘法寺等的好评，并列入收藏。

张瑞麟对中华传统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以独特的视角和精湛的技艺，赋予每一方



张瑞麟，广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广州市鹅潭诗书画会艺术指导。其代表作是“三百千”和朱子家训。《三字经》套印共380方，《百家姓》套印共120方，《千字文》套印共250方，朱子家训套印共108方。其中《千字文》篆刻套印由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

印章以灵魂，他的篆刻作品不仅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更流淌着现代艺术的血液。他的篆刻艺术宛如一部浩瀚的历史长卷，将诗、书、画的美学与雕刻的精髓融为一体。每一方印都承载着他对艺术的独到见解、情感注入和理解诠释。

在他手中，这一门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老文化正焕发出新的光彩，使后人传承古代智慧和美学。

参观篆刻碑林，众人皆流连忘返。大家在万行法师的提议下，围拢着碑石合影留念。秋阳下，山风阵阵，暖意浓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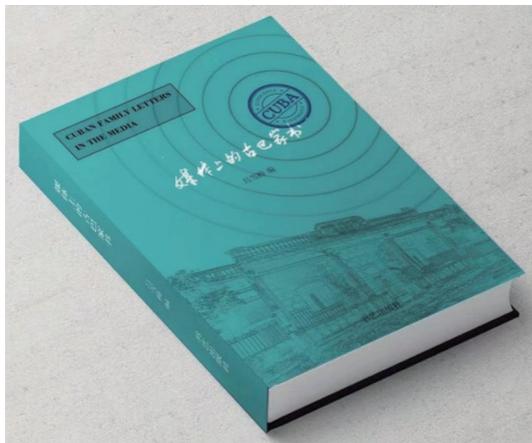
《媒体上的古巴家书》： 民间家书整理出版并走向大众的典范

文◎张 丁（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

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的“海外飞鸿”版块，有一个展柜格外引人注目，陈列其中的除了家书、人物照片和故事简介外，还有四本图书。仔细一看，这四本著作均为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是什么图书一版再版呢？原来这是黄卓才编写的关于父亲黄宝世（古巴华侨）家书的故事。这本书融史料性、故事性、可读性于一体，受到出版社的欢迎和读者的赞誉，从而一版再版，并且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漂洋过海，走向海外更多的读者。

说起这本书成功的原因，一方面是黄宝世家书本身的魅力，另一方面则是黄卓才精彩的创作。

就黄宝世家书本身来说，乍看似乎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无论是内容还是书写，都



《媒体上的古巴家书》

和一般的华侨家书没有多少区别。但细看则会发现有所不同，会被古巴的“神秘面纱”所吸引，会为华侨华人的特殊境遇而感叹。书信作者下笔时惜墨如金，每封信文字不多，行文善用短句，表述干净，不拖泥带水，言简意赅。信虽短，信息量却很大，所要表达的内容很丰富，既有对当地形势、生活状况的描述，也有对祖国的关注、家人的牵挂，侨汇和回国时间是所有家书的主题。总的感觉是，黄宝世的家书符合“纸短情长”的特征，读后让人回味无穷。

就家书背景的解读和故事的创作而言，在于黄卓才高超的构思、编排和写作艺术。首先，突出家书，以家书为根本。他把家书原文和原图单独展示，相互对照，所录文字严格忠实原件，不作改动，尽可能保持家书的历史原貌和真实性。其次，围绕家书展开叙述，从家书说开去，每章有一个中心，单独构成一个小故事，最后各章连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大故事，“填补了古巴当代华侨史的空白”（《中国作家》第二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评语）。黄卓才的文笔十分优美，使该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他深谙写作技巧，多使用叙事、白描等手法，客观中立，娓娓道来，讲述故事，抒发情感。比如他对中山和坦洲美食的描写，生动鲜活，透露出苦涩日子里的些许快乐时光。

“文化大革命”时期，黄卓才被暂停教

职，过了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他索性在校园附近开荒种菜，春种夏耘，浇水施肥，“到了夏天，一个个金黄金黄的大南瓜就静静躺在葵扇般的叶子底下。此时，我和妻子、儿子、女儿把南瓜抱回家去，那种欣喜难以言喻”。1969年11月，黄卓才被调往偏远的坦洲中学，妻子同时被调往坦洲卫生院，这样一家人搬到了坦洲，他还把姨母接到这里同住，以尽孝心。“坦洲水乡真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除了盛产大米、蔗糖之外，还有无数品种的河鲜和海鲜，价钱低廉，任你享用。姨母最爱吃家乡少见的禾虫，这里一桶桶、一艇艇，多得卖不完、吃不了，农民只好拿去作肥料。周末，我跟学生去钓鱼虾，不到半天就满载而归。”黄卓才感叹道：“在物资紧缺的年代，城里人排长队也买不到多少鱼肉，这里却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福地！”

一个华侨家庭的日常生活，经过黄卓才的描写，跃然纸上，读来津津有味。这就是文字的魅力。孤悬海外的黄宝世最关心的就是远在祖国的亲人的生活。1968年正月初二，他写道：“听闻中国‘文化大革命’有些阻碍，我更加不安，见字千祈详细报告为要。”黄宝世收到儿子黄卓才1970年7月6日的来信，知道儿子调到坦洲中学工作，家也搬到了那里，因此在9月1日的回信中表达了对姨母的关心，专门叮嘱要拿出20元侨汇给姨母。可见，黄卓才不惜笔墨描述在坦洲的生活，既是对于家书的解读，又何尝不是给父亲的汇报呢？

本来，这些家书是黄卓才的私人档案，可是他没有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的私产

秘藏起来，而是完全公开与大家分享，表现了他的远大视野和广阔胸怀。他不仅把父亲的家书故事写成了书，公开出版，而且主动向相关博物馆捐赠家书，努力参与各种展览，积极配合媒体广泛宣传，讲述家书背后的故事，弘扬老一辈华侨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

我于2005年发起“抢救民间家书”文化项目，目的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利用那些埋藏在民间的家书。十几年来，项目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截至2023年底，仅全国项目组就收集到各界朋友捐赠的家书7万余封，设立了两个家书常设展，举办了12个临时展，出版家书10余种20多册，申报家书科研项目3个，发表家书研究文章100余篇。更重要的是，民间家书的价值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散落的家书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整理与利用。黄卓才围绕家书所做的一切即是其中的重要成果。

回首黄卓才与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的结缘，应该追溯到2005年。当年项目启动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黄卓才看到了，可能触发了他的家书情怀，于是开始整理保存了几十年的家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新作迭出，硕果累累，成为民间家书编研传播的典范。

2006年《古巴华侨家书故事》出版后，黄卓才第一时间就给项目组寄来了签名本。我详细拜读之后，深感震撼，连连叫好，没想到普通华侨家书的故事在先生的笔下是如此地动人！由此也使我们在一封小小家书的价值刮目相看。从此，我们邮件往还，联系不辍。

2012年，我们筹备博物馆的常设展

览“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时，黄卓才给我们寄来了四封家书，包括父亲黄宝世1962年4月28日和1965年4月27日寄自古巴大萨瓜市的航空邮筒和航空信，以及他的儿子——国际著名生物学家黄雅凡博士分别于1989年和1996年从加拿大写给父母的家书。我们把黄宝世的家书和照片，连同黄卓才撰写的家书故事图书一起设了专柜，展柜上方的镜框里就是黄雅凡的家书和照片，祖孙三代，上下呼应，呈现出一个华侨家庭长达百年的家风传承，带给观众强烈的震撼，也成为华侨家书展区的一大亮点。

2013年6月，侨批（银信）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尤其在粤闽侨乡，侨批（银信）的收藏、展览、研究、宣传热度不断上升。黄宝世家书作为古巴华侨银信也迎来了高光时刻，不断受邀参加各种展览，黄卓才也频繁接受各家媒体的采访，以亲历者的身份深情讲述古巴华侨家书的感人故事。

许多研究者往往把侨批（银信）仅看作侨文化的载体，所有的讨论几乎都局限在华侨、侨汇、侨信、侨乡等侨文化领域。当然，这并没有错。侨批（银信）对于侨文化研究的重大价值自不待言，同时还应该把它放到更广的领域来认识。比如，侨批（银信）实际上就是华侨家书，是历代华侨华人从海外寄给亲人的家书，只不过比其他的家书多了汇款功能，因此华侨家书也是中华家书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员，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卓才较早看到了这一点，他突破了“侨”的局限，把自己的银信放到整个家书文化的范畴来看待，积极与我们联络、互动。

2020年，黄卓才把父亲1937年修建的永隆村老宅重新翻修，冠名“宝世楼”，然后把北京和广州等地展览过的父亲家书家风故事展

板移植进来，布置成了一个小型博物馆。台山市侨务局和市侨联给“宝世楼”挂上了“华侨家庭文化体验馆”的牌匾。与此同时，银信收藏研究专家李柏达自费数十万元修复了四九镇五十墟儒笏村的三益碉楼，建成银信文化主题博物馆。黄卓才在此设立了以自己研究团队命名的侨文化研究基地，团结海内外中青年专家学者，致力于华侨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播。

民间家书的收集、整理、研究、传播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程式可以借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我常常思考：究竟应该如何整理出版民间家书，挖掘传播其背后的文化价值？由于民间家书的作者是普通人，本身不带流量，怎么能够让出版社感兴趣，并让读者认可？确实是一大难题。是原信影印，还是单纯的排列文字？是图文并茂，还是加上背景链接？我们见过许多家书图书就是这种形式的。我们还尝试过前面是家书图文，后面是背后的故事。当然这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有的还不错，但总觉得不太理想，行文生涩，信息量不足，即便勉强出版，读者也不买账，自然影响就小了。

黄卓才编写出版、活化传播父亲家书故事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整理出版民间家书、弘扬家书文化提供了范本和借鉴。拥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家书当事人，应该亲自动手整理、编写自己的家书，参照黄卓才的家书体例，即便照猫画虎，也能编写出既叫好又叫座的家书来；没有写作能力的家书保存者，可以与博物馆联系或把家书捐给博物馆，由专业人士帮助整理汇编成书。在整理出书的基础上，借助各类新闻媒体，充分挖掘家书中的真善美，让一页页发黄的档案、尘封纸墨间的文字活起来，使家书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惠及大众。📖

秋水长天 平川无垠

——蔡秋川《陌上暖阳》序

文◎黄国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风轻秋水阔，云淡楚天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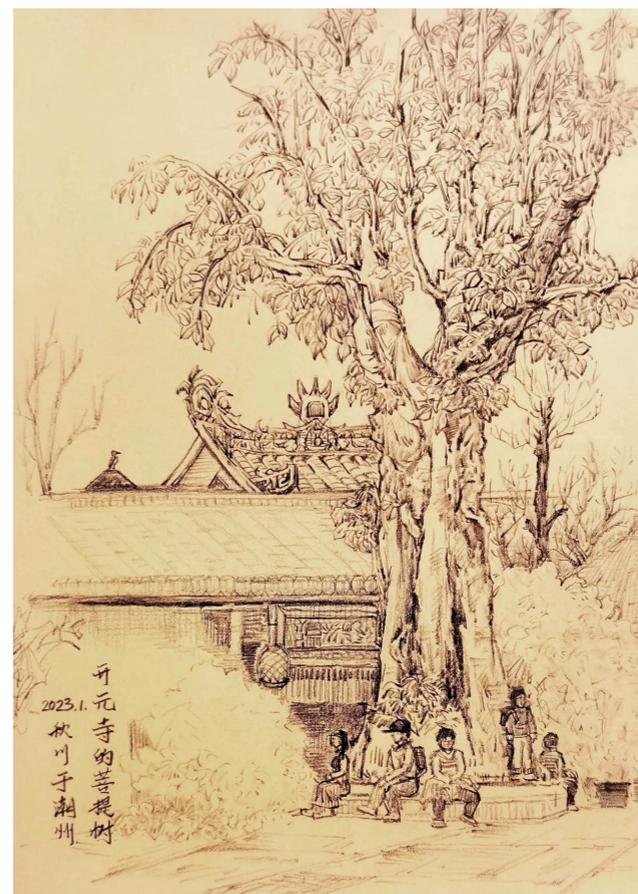
每当读到这些意境开阔辽远的诗句，我就会想起忘年交小友秋川。秋水长天，平川无垠，鸿雁振翅，风光在前。

秋川籍贯潮州，出生在广州。小时候，秋川不会说潮州话，粤语、普通话交换着用。长大了，倒学会了这种难学的方言，且标准正宗。也不知道，她在背后下了多大苦功。毕竟，潮州话难如外语。

秋川也颇像画家前辈林墉，一手画画，一手作文。林墉的散文，清新隽永，画面感极强，把潮州方言提炼成典雅的文学语言。有一段时间，《作品》《家庭》《广州文艺》连续发表林墉的散文，《羊城晚报》副刊《花地》，也为他开辟了“大珠小珠”专栏。那几年，五羊城里，颇有些人人争读、洛阳纸贵的感觉。林墉也曾笑对我说，有一次，他在白云山登山，听到前面两个人在谈论，说有两个林墉，一个画画的，一个写散文的。听

着登山街坊的这些闲谈议论，林墉自己都忍俊不禁。

秋川也是广州美院出身，她就读于油画系，素描、造型、色彩的功底极其扎实。她有一幅人物肖像，十分精彩，端坐的扎头巾的女人，眼睑低垂，安静地



蔡秋川的速写

看着身前膝下那尊老旧的陶罐，意蕴既悠远又传神，让人不由得便进入了画境。

那时我还在潮州文联工作，我对秋川的父亲直言，这幅油画颇有俄罗斯列宾的风格，精妙细腻，太令人喜欢了，我要把它带到潮州进行美术展览。她父亲沉吟了一下，应该是在思考，接着缓缓地说：“还是不要了，这是她的临摹作业，不要拔苗助长。”

这是真正的关爱！

秋川的父亲，也是一位作家、书画家、篆刻家，多年以前，他写过一篇短文《秋川子》，这真是一篇充满亲情的美文：

秋夜。他踏着月色去喝酒，半醉而归，见妻子凸着毫不掩饰的大肚子冲着他问：该为小家伙起个什么名字呢？时已立秋，窗外月色正好。他斜躺在床上，经妻子这么一问，朦胧中忽地冒出了庄子《秋水》篇的开篇两句来：“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妻子却说她从怀上小孩之日起就想着那秋游川江时两岸的景色。他说，那巧极了，孩子的名字就叫秋川吧，日后若是个女的，可称秋川子，如果是条汉子，就叫秋川太郎，妻子觉得有趣，孩子的名字就这么定了下来。

……

秋川会画画，这毋庸置疑，后来，她回潮州，总是马不停蹄，义安路、开元寺、镇海楼、上水门、牌坊街、涵碧楼、岳伯亭，老街旧巷、城楼学宫，画了个遍。她用她的潮州话表达着她内心的欢欣：

“回到潮州日画夜画真快活。”

“义安路的老厝阁楼真好画。”

她带着一个马扎、一块画板、一支炭笔，就在小巷深处、老街阁楼，画得不亦乐乎。

画完了骑楼、老厝，她又把目光转向了

她的大伯、伯母。家里的模特就那么几个，她又走上了街头，贩夫走卒、路人阿姨，也请他添列画屏。

我喜欢她这种不管不顾，只顺着自己的性子做事的执着。事业的成功、事业的精彩，不就是这样忘乎所以地苦出来、拼出来的吗？

秋川的诗文，也开始越写越好。这是一个聪慧、明敏的人更进一步的选择。画坛中能画能写的前辈多着呢，林墉、黄永玉、吴冠中、丰子恺……一位位大家，如雷贯耳，又都是画文双栖。

秋川也想把内心的炽热、内心的情愫、内心的感受、内心的悲喜，尽情地表达出来。有时候，感情、感觉、感慨、感触，是没办法用画笔表达出来的。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散文、新诗，这是与绘画不同的另一种思想、灵魂的表达。

秋川喜欢上了它，于是又一头扎了进去。

我曾经与秋川交流、切磋过很多次，剪裁、取舍、推敲、润色，秋川从善如流。文章不是无情物，文章须经百回改。文心贵直，文句可曲。秋川深谙这个道理，她经得起磨砺，耐得住寂寞。她不厌其烦，听得进意见，一篇篇文章反复修改、反复打磨，很快，她便破土而出，熠熠生辉。

白驹过隙，时序更新，文心初照明月思，笔端流淌秋水词；笔阵战酣蚕食叶，文心磨洗铁沉沙；东风夜放花千树，雏凤清于老凤声。经过几年不断的磨砺，秋川以她的认真和真诚，以她的勤敏和耐性，以她的谦恭和不懈，赢得了很多读者的好评，也赢得了一个个报刊编辑的心。如今，秋川的第一本集子即将公开出版，作为她曾经的第一个责编，我闻讯写几句感言，说说她写作的经历，表达对她的祝福，是为序。✎

《走出印度：加拿大客家人访谈录》： 客家人二次移民的悲欢离合

文◎马 克

2023年，《加拿大商报》副总编辑黄学昆编著的《走出印度：加拿大客家人访谈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被列入“广东华侨史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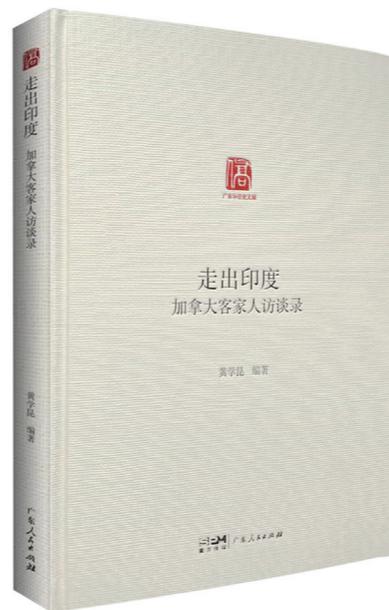
《走出印度：加拿大客家人访谈录》全书共30万字，包含1篇总论、13位具代表性的客家人的深度访问、口述和大量宝贵的历史老相片，以及1个汇总介绍加拿大主要客家人团体的附录，构成了从历史到现实、个体与共性相结合的完整理论体系。书中叙述的每个历史事件，线条脉络清晰，让学术界及世人对从印

度再移民加拿大的客家人这个特殊群体有了更宏观的认识和理解。

该书集中再现了著名侨乡广东和“客家人之都”梅州客家人晚清开始为躲避土匪、军阀战乱而形成的“移民南洋潮”，以及后来被迫再次迁徙的二次移民路线，详尽记录了其中的一支客家人抵达印度后努力融入社会生活，在当地艰苦开拓、办学、经商、工作，传承客家人传统和中华文化的历史，全面讲述了印度唐人街的历史兴衰和客家人为建设华人社区的努力，以及他们几代人经历过的悲欢离合和遭遇过的种族歧视。

该书总论“追寻客家人移居加拿大足迹”全面概述了客家人的旅加历史渊源、全加客家人人口分布和结构、客家人社区发展特点、他们与祖（籍）国及印度原居地的关系现状，并对其中一些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剖析研究。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二次移民加拿大的客家人群体，在印度遭受过巨大的歧视、排挤、迫害和被剥夺社会地位之痛楚，因而比普通华人移民具有更强烈的爱祖（籍）国、爱家乡的情结。

该书为研究从印度到加拿大的客家人移民历史打开了一个窗口，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一个极富价值且有挑战性的课题。✎



《走出印度：加拿大客家人访谈录》

文章千古事

文◎王国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文联副主席）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认为荣耀快乐只是个人自身的事，人生在世再长久终要湮灭，不像文章那样可以永垂不朽。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他同样认为文章是千古事业，关系重大，因此毕生精心为文，语不惊人死不休。英雄所见略同。

确实，古人往事灰飞烟灭，亭台楼阁毁折废弃，雉堞圯毁，秦莽荒秽，“牧童樵叟，歌吟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呻嚅”。什么都没了，唯文章不灭！金陵台没了，可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却流传千古：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富丽堂皇的吴宫已荒草萋萋；风流雅致的晋代名士也空留坟丘。

滕王阁毁了，王勃的《滕王阁序》至今还是我们学习的范文，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力透千年，传颂不绝。

岳阳楼塌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让人耳熟能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有宋以来士大夫的座右铭，激励了一代代文人的家国情怀。

超然台倒了，而《超然台记》却留在了史册。黄冈竹楼朽了，而《黄冈竹楼记》却成为文坛杰作。没有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永州如何

得以家喻户晓。没有崔颢的《登黄鹤楼》，黄鹤楼如何能名闻遐迩！

历朝历代，多少皇帝官员，多少富商巨贾，我们能记住几人？而对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等大文豪，我们却如数家珍，而这些人在他们的朝代也许并不得志，甚至十分落魄，名不见经传。然而，他们从事的是千古文章事业，是跨越时空的伟大事业，而他们又是这一事业中的翘楚，自然能穿越千年，深入人心，广为流传。

很多人之所以成为历史名人，也是因为文章记载之功。一本《史记》，让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名冠古今。一本《三国演义》，让我们记住了多少三国人物的英名！同为历史，我们为什么对某些朝代的人物更为熟悉，比如汉朝，比如唐朝，而对某些朝代的人物相对陌生？比如元朝，比如清朝。这与文章功用密切相关，史传写得好的，人物就有永久的生命力，否则，无人理会，难免行之不远。

有些人，本不属于文人，亦不以文名，偶尔行文，却一鸣惊人。诸葛亮虽以智谋取胜，前后《出师表》却震烁古今，衷心可照日月。刘邦虽不学无术，一首《大风歌》却气势磅礴，令人刮目相看。岳飞虽以功名，《满江红》却披肝沥胆，平添忠义气节、英雄气概。

文章看似柔弱文人之专长，实则风骨之士者伟业。历史的长河大浪淘沙，经典历经千年而不朽，俗文瞬间被淘汰。潜心贯注为文，心无旁骛作诗，也许能超越时人，突破时空。✎

陈寅恪故居

文◎郝俊（青年作家、诗人，供职于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不仅有园林般的蓊郁典雅，还有一个极具诗意的名字——康乐园。名为“康乐”，是因南朝袭封康乐公的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被贬广州时曾居此地而得名，徜徉其中，古木林立，碧草芾茂，如果说满目的苍翠是铺展在这灵性勃发之地的怡人景致，那么，一幢幢古朴的红楼就是康乐园沉积百年而不褪的底色了。

途经格兰堂南，一幢两层高的小红

楼，在浓枝密叶的掩映下显得坚实而有风骨，似乎喻示主人的品格。红楼虽小，寓居大师，这座非比寻常的小楼就是中国现代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先生的故居。这幢楼原名麻金墨屋一号，建于1911年，由美国麻金墨夫人捐建。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从上海乘船抵达广州，到岭南大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随着院校调整，岭南大学部分院系并入中山大学，陈寅



陈寅恪故居外观



故居一楼正厅

恪便移任中山大学教席。1953年夏，陈寅恪一家搬到该楼第二层居住，自此，在这幢楼里度过了极不平常的16年。

故居门前至小院外围有一条水泥路十分醒目，当年学校为照顾晚年几近失明的陈寅恪先生行走方便而特意将路面刷白，这是大师走过的路，也是一条尊师重道的路。面对故居，门右边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题写的牌匾——陈寅恪故居。

进入正厅，中间倚墙放置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半身塑像，先生双唇紧抿，目光深泓，塑像前芝兰清芬，室内高洁素雅。东侧墙面挂着古文字专家陈炜湛以甲骨文手书的陈寅恪先生名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这句话出自陈寅恪先生于1929年为王国维撰写的碑铭——《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以甲骨文书之，更显劲峭古拙，有些字的字形酷似向上托举的手，像是奋力挣脱，又像是决然求索。陈寅恪先生一生持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就是在此碑铭中首次提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言既是评鹭王国维，也是陈寅恪先生自身学术理想的摭怀。

沿着正厅西侧的楼梯上二楼，因为旧式木质楼梯台阶较高，上楼费力，每爬一步，整个楼梯都会轻微震颤而发

出声响，伴着沉闷的脚步声，不像是抵达另一处空间，反而像是恍入一段过往的时光。二楼的陈设基本按先生当年生活时的原貌恢复，这要归功于学校修缮故居时坚持修旧如初的原则。房间布置简单朴素，门窗和地板色泽深沉，犹如无法淡去的记忆，只有从屋顶洒下的柔和灯光才能让时间流淌，让往昔慢慢浮现。先生和夫人的卧室，打扫洁净，家具摆放规整。走到北墙窗户边，可以看到安放于楼下北草坪的陈寅恪先生铜像，先生坐靠藤椅，右手紧握的拐杖就像一个放大的问号，坚定的眼神透出一股抓住问题不放的韧力，其专注的神情，让人觉得先生是因为沉湎于思考而忘了上楼。

走出卧室，穿过客厅，来到宽敞的南面走廊，走廊分为两部分，走廊东部与卧室仅一门之隔，是先生的书房和工作室。走廊西部被先生当作晚年教学的课室，现在仍可见到走廊上的10张带桌板的木椅和墙上的一块小黑板。据中山大学原副校长、陈寅恪先生

的学生胡守为追忆，先生上课时，让人在走廊摆放两排座椅，供学生使用，他自己坐在小黑板下的藤椅上讲课，他的课没有考勤，没有考试，全靠同学们的自觉，那时常来此听课的还有许多教授。先生对待教学十分投入，不管前来听课的学生有多少，始终勤谨敬业，讲到有些特殊名词时，担心学生听不懂，便起身写在黑板上，先生因为目疾，无法视物，有时候黑板上的字迹重叠了都不知道。先生不能用眼，只能用心写。1950年，胡守为选修了陈寅恪先生开设的“唐代乐府”一课，学生仅有他一人，但先生上课照样认真，就连着装这样的细节也是一丝不苟，虽然上课的地点就在家中，但每次上课都穿戴整齐，即使是夏天，也是一袭长袍。正因为先生如此认真治教，才在这不到20平方米的走廊上，为史学界培养了多位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

走廊东部的书房，是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和著书的地方，《论再生缘》《柳如



故居二楼走廊西部

是别传》等重要论著均在此完成。特别是皇皇80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先生以“失明瞎足”的病残之躯，凭借超乎常人的坚定意志，穷搜详考，精推细论，靠自己口述，助手黄萱笔录，以十年之功，完成了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心血之作。黄萱曾感言：“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泣鬼神的气概。”此言绝非过誉，作为助手的黄萱，既是记录者，又是见证者，先生著书之艰辛，自然深知详悉。这部寄情寓志的巨著，文史互证，情理相谐，在治史方法上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先生执“史笔”、存“诗心”，可谓寄托深遥，正如季羨林所言：“陈先生晚年之后之所以费那么大的力量，克服那么大的困难来写《柳如是别传》，绝对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他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对中国文化的感情，都在里面。”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中也表明了自己的心志：“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尤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种忧国情怀不仅体现在这部《柳如是别传》之中，也流

这种忧国情怀不仅体现在这部《柳如是别传》之中，也流

滴于其他诸多诗文的字里行间。文史学者刘梦溪在《陈寅恪的学问为何有力量》一文中写道：“他（陈寅恪）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他的著作里面蕴涵有深沉的家国之情。我很喜欢他1965年写的《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那首诗，其中有两句写的是：‘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这两句诗是陈先生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曲，也是打开他著作宝库的一把钥匙。因为他的精神力量跟他的家国之情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很多诗里都有类似的情结。‘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沉湘总泪流。’‘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他的眼泪都哭干了，是由于深沉的家国之情。这是他一生精神脉络之所出处。”

陈寅恪先生一生著作甚丰，这位通晓十多种文字的旷世之师，在学术界创造的奇迹不计其数，其治学之广令人惊叹，他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古典文学等方面均有独到的贡献。诚然，先生在治学方面得益于非凡的抱负和超常的毅力，其博闻强记的天赋亦不可忽略，哲学家金岳霖曾回忆：“寅恪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 he 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先生宏瞻的学识让人高山仰止，其爱国热忱同样备受尊崇。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并侵占香港，致其沦陷。身居香港的先生当时因学校停课，

生活拮据，度日艰难。日军曾给陈家送过粮食，但先生态度明确，坚决不受。其兄陈隆恪也听闻此事，并以诗相励，其中一句为“正气狂吞贼”。1942年初，先生仍困居港岛，在食不果腹之时，力拒日本人以40万港元托办“东方文化学院”等事。据先生长女陈流求回忆：“春节后不久，有位自称父亲旧日的学生来访，说是奉命请老师到当时的沦陷区广州或上海任教，并拨一笔款项由父亲筹建东方文化学院等。父亲岂肯为正在侵略中国的敌人服务！”先生的爱国之举实乃民族气节的体现，是崇高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个体的精神人格。心理学家荣格说过：“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格。”先生的学说和言行须臾不离民族文化的立场，其学术思想和人格魅力，已铭镂于无数晚生后学的心中。置身故居，眼前这栋古雅的红楼，与其说是年深日久的旧房子，毋宁说是见证大师足迹的文化圣地，为来访者感怀大师提供了一处心灵楼舍。

故居曾经是它的主人的活动寓所，如今斯人已逝，但人去楼未“空”，故居以其独特的感染力，安静地与前来参观的每一位来访者进行“交流”和“对话”。眼前的这栋红楼，是先生的起居治学之所。而如今，从某种意义上讲，陈寅恪故居已经成为中山大学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建筑之一，走进故居，可以了解先生的生平，缅怀先生的事业，可以体悟“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的主张。

我在这个校园工作，这里的一房一舍，早已了然于心，但总有一些建筑，每每目光与其相遇之时，都能感到一种触动内心的力量，比如陈寅恪故居，在我看来，这栋仅有两层楼的建筑就是我们这所学校的风骨。✎

生命无价 拒绝酒驾

· 安全驾驶 珍爱生命 ·





广东侨联工作

联 谊 联 络 品 牌

拓展内外朋友圈，画好最大同心圆，以侨为桥，以情聚谊，共促中外人文交流，增进中外友好合作。

情系

南粤

